

冰冷雨天作品
在这里读懂日本⑤
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再检讨
大泡沫
一切从广场协议开始
俞天任 著
日元升值、楼市泡沫、股市崩盘、
通货膨胀、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日本何以从叫嚣“买下美国”的亢奋中一蹶不振？
中国，能避免日本式悲剧的重演吗？这是个问题
语文出版社

中国，是时候从日本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欧洲人惊讶地发现，
组团横扫欧美的奢侈品店。日本人的千金一掷
夏威夷海滩上到处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
日本人买走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也被索尼拿
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美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难怪美国人惊呼："日本人要买下美国了！"

仅仅五年后，形势逆转——楼市崩盘、股市低迷、通货膨胀、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经济持续衰退已出二十年，仍不见底。瞬间繁华，宛如梦幻。一切竟源于80年代中期一场秘密会议所签署的协议——广场协议。

重新回顾广场协议的历史过程，了解广场协议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有关各国在广场协议达成时所采取的对策中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对理解中国、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所面临的局面会有一定的帮助。事实上，中国当前的处境、中国经济的特征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所面临的问题颇有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走势性命攸关。

中国，的确是时候该从日本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了。



ISBN 978-7-80241-347-4

9 787802 413474 >

定价：28.00元

冰冷雨天作品
在这里读懂日本⑤

大泡沫

俞天任 著

语文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泡沫：一切从广场协议开始／俞天任著．－北京：
语文出版社，2012
ISBN 978-7-80241-347-4

Ⅰ.①大… Ⅱ.①俞… Ⅲ.①经济史－研究－日
本－现代 Ⅳ.①F131.3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835号

DA PAOMO：YIQIE CONG GUANGCHANGXIEYI KAISHI
大泡沫：一切从广场协议开始
俞天任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E-mail：ywp@yw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15印张 150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8000 定价：28.00元

引 子

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心的广场酒店（Hotel the Plaza），美国、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这五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们达成了一个后来以这个酒店名称命名的协议——“广场协议”。

这些西装革履的各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高官显宦们拥有一个和外形很不相称的绰号，叫做“通货黑手党”。这个绰号的由来很有意思。在现代经济中，对通货市场的干预有时能够像军事行动那样对一个实体国家进行打击，所以货币外交的机密程度在所有国家都放在和军事同等的级别，这样那些高官显宦们就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琢磨着这些人是不是又在憋什么坏主意。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使用通货武器对某个国家进行打击又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每天在世界外汇市场上流通的外汇总量达到几千亿美元，超过了绝大多数单个国家所能拥有的外汇通货总量，更不要说可以动用的那部分外汇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不能由哪个具体的人或者具体的国家政府的意志随意控制的地方，究其实质，乃是“通货的价值由市场决定”。

实际运作这个巨大而又抽象的万能市场的，是两三千位职业通货

交易代理商（dealer）。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这些代理商们由衷地喜欢所有的通货，而绝不会厌恶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每天买进卖出各种货币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喜欢或者仇视的情感动机，而只是满足他们得到更多通货的欲望而已。因此，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理由”——给予他们买进卖出行动公证的“理由”，有了理由他们才能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而只有那些被称作“通货黑手党”的各国财政部或央行高官们的行为言行才能提供这些理由。人们常常看到，本来风平浪静的通货市场，往往因为某要人的一句话就化作了血肉横飞的修罗场，这就是“通货黑手党”这个绰号的来由。

所谓的“广场协议”有其正式名称，它叫做：《法国、西德、英国、日本以及美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声明》。虽然占了九页A4纸的纸面，但考虑到周围留下来的空白，实际上真正文字并不多。而且这些不多的文字如同所有的官样文章，是由一些抽象和费解的名词和用法以及美丽而空洞的废话所堆砌起来的，但是，这次即使不是经济学的专家的人，也能立即读出这个声明的主要目的。

这次，交易商们从这十个通货黑手党人的声明里读到的是：“快抛售美元”。因为写得最清楚、最容易理解的就是第十八项：“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们同意汇率应该在调整外贸不平衡方面发挥作用，所以汇率应比迄今为止更好地反映经济实况，他们相信应该采取和强化改善经济现状的统一行动。考虑到经济的现状和可能的变化，他们相信主要非美元通货对美元的汇率应该有秩序地上升。在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做好了紧密合作促进这种发展的准备”。

掮客们无数次地抛售过美元，但这次抛售美元的意义和过去以及将来截然不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干预通货市场。和市场主义者的信仰不同，市场是能够被操纵的，在广场协议之后一段时间，广场协议与会的各国达到了他们在开始时所希望达

到的目标，广场协议成功了。

但是，“广场协议”又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从广场协议五年之后的1990年开始，人们就不断地对广场协议提出了各种疑问。1995年，在广场协议签订十年之际，里根政权时代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接受日本NHK（源自日语罗马字Nippon Hōsō Kyōkai的缩写，日本广播公司）采访时很不高兴地说：“广场协议除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之外什么都不是，贝克干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这个“贝克”就是詹姆斯·贝克三世。里根第一任期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第二任期时的财政部长，后来乔治·布什政权的国务卿。

因为一般的说法是，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飞涨到最后给日本带来了一次巨大的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破灭把日本带入了一条长长的看不见出口的隧道，而美国本身也因为采取了那种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轻率短视的做法，陷入了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而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好像没有人从广场协议中得利。

还有一个大家都没有异议的结论：唯一从广场协议之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变化中得利的国家是中国。这也是最让欧美日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西方看来，简直就是异类。究竟是谁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广场协议的根源真的是美国为了保住自己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大地位而无耻地打压日本吗？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重新回顾广场协议的历史过程，了解广场协议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有关各国在广场协议达成时所采取的对策中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对理解中国、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所面临的局面会有一定的帮助。实际上，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经济的特征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所面临的问题颇有些相似之处，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如出一辙，能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这些年中国人的机运和努力会不会付诸东流。

目　录



1. 领头闹事的是两个老“李”

全世界的工地上都能见到大型挖掘机、大型推土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这些大型工作机械的制造商标一般都用很大的字标在车体上，常见的有“HITACHI”和“KOMATSU”，行内人都知道这是日本的工程机械制造厂家“日立”和“小松”的制造商标。随着韩国在工程机械制造方面实力的增强，现在“HYUNDAI”（现代）的字样也时常见到，但估计肯定有人在第一次看到一个老大的工程机械上标着“CAT”的时候会一下子愣住：“咦，这么笨重的大型工程机械和娇小可爱的‘猫’有什么关系？哪个公司的制造商标这么可爱啊？”

实际上那大型工程机械上标的“CAT”不是猫，而是“Caterpillar”前三个字母的简写。凑巧的是，在古拉丁语中“Caterpillar”还真有“长毛猫”的意思，但这里的“Caterpillar”指的是一家中文译名为“卡特彼勒”的美国工程机械公司。这家公司很有名，非常有名，极为有名，有名到了可以说“没有了这家公司，美国就不可能爬到今天世界霸主的位置”的地步。

大家都知道，推土机、挖掘机和坦克的行走原理都是使用了一种中文叫做“履带”的自携式无限轨道装置，可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知

道这种自携式无限轨道的英文就是“Caterpillar”，表示一种车辆的行走方式使用的居然是一个公司的商号，这家公司和这种行走方式的关联便可想而知了。

不错，卡特彼勒公司就是履带式车辆的老祖宗，采用无限轨道的履带式行进系统是一家叫做赫尔特（HOLT）的拖拉机制造公司在1904年发明的，而卡特彼勒公司就是由赫尔特公司和其他两家拖拉机公司合并而来的。它是全美履带式车辆的最大生产商，自然生产装甲车辆和坦克。当年在太平洋战争中，卡特彼勒公司对日本人打击最大的倒不是他们生产的坦克和装甲车，而是他们生产的工程机械，美国的工程兵因为有了卡特彼勒公司所制造的工程机械而成为一支机械化的工程兵队伍。拙作《浩瀚大洋是赌场》中就有关于那支机械化工程兵对太平洋战争做出了多大贡献的描写，所以，即使说美军在二次大战中的胜利大道是用卡特彼勒推土机推出来的也不为过。

直到太平洋战争，南太平洋威克岛上靠人海战术修机场的日本人才第一次看见那种被称作“bulldozer”、效率比几百个人还高的推土机。但当时国力贫弱的日本除了眼睛发红之外也无能为力，只是知道了这么一个事实：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日本人没有许多东西，其中之一便是被叫做bulldozer的推土机。

战争结束之后，各国都大兴土木重建家园，所以有名的卡特彼勒公司工程机械的销路如花似锦，公司本身也和通用电气、通用设备一起一直名列美国最重要的公司之中。卡特彼勒公司不但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司，也是美国最能挣钱的公司之一，但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悠久、劳苦功高”的美国公司，却在为如何存活下去而伤透脑筋。

1980年，在国际市场上，卡特彼勒公司的工程机械销售额还高达33亿美元，可是三年后的1983年，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17亿美

元，几乎正好少了一半。1980年该公司86000人的雇员规模，三年后也下降到了58000人。

海外市场哪里去了？全被一个叫小松制作所的日本厂家抢去了，现在那个可爱的单词“CAT”不容易看见了，满眼都是那个不知所云的古怪单词“KOMATSU”。

卡特彼勒公司的董事长李·摩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不但个头大、块头大，而且自信心也强大，在他看来，卡特彼勒公司的产品性能和质量是最好的，而他李·摩根的经营管理也是最好的，最好的经营管理公司的最优秀产品肯定是有竞争力的。现在居然没有了竞争力，那肯定是有些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之外的东西在搞怪了。

李·摩根找出了搞怪的原因，他的结论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太低”。李·摩根是在1982年前后开始探讨这个问题的，当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240:1左右。在李·摩根看来，这个汇率应该是180:1，起码是200:1。如果能把汇率调整到那个水平上，李·摩根绝不相信美国人会竞争不过日本人，“当初我们的推土机把他们的帝国都推倒了”。

李·摩根是全美最大的工商院外活动组织“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 Table）”的领导人，他带领着一大批美国商人成天游说美国国会。

李·摩根说：“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降低15%—20%的造价，最方便的方法是解雇雇员，但只要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保持在这么高的水平上，我们就只能按我们的价格来出售产品，我们没有办法和小松制作所竞争。”

当时扯日元美元汇率皮的除了这个李·摩根，还有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李·艾柯卡，就是那个被福特汽车公司解雇后出任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经理，以一美元的年薪带领克莱斯勒公司走出濒临破产的

困境、在商业上击败福特汽车公司从而完成报仇大业，当时风头极劲，甚至有传言说要参选美国总统的那位经营天才。

李·艾柯卡是头孤狼，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日本帮日本人洗脑，指望日本人翻然醒悟，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李·艾柯卡很实际，他首先假设日美在汽车生产上的品质管理、产品性能和生产性方面完全一样，但是日本厂商能够依靠日本的税制优惠和美元汇率的坚挺，以2000美元一辆的价格在美国进行倾销。这就很能够说明汇率方面确实存在问题。

和把全部责任归到日本人身上的李·摩根不同，李·艾柯卡首先就认为，不管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否合理，起码这个责任不在日本人身上，指责日本人是没有道理的。1985年4月，艾柯卡在东京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指出："美元汇率偏高这个问题是美国赤字经济的私生子，只有美国人自己才能解决。"

但这也不是说日本人就可以袖手旁观看热闹，李·艾柯卡告诉日本人："美国人实际上不懂什么叫做'美元坚挺'，那是经济学，没人弄得懂那个倒霉的经济学，所以就算是美元坚挺了，也不会有哪个美国人操起武器去和谁拼命，但是日本人的保护主义最终会让自己走投无路。"

一般来说，人们可能会想：这两个老李这么一说，政府就听了进去，然后找到日本人一拍桌子："提高日元汇率！"再找几个盟国作见证，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广场协议"了？典型的仗势欺人和蛮不讲理。

但实际上不是那样，两个老李在美国日本辛辛苦苦大吵小闹的结果，是根本就没人理他们。

2. 所谓“里根经济学”

当时的美国不可能会有人理他们，因为20世纪80年代前期正是“里根经济学”统治美国的时代。

二次大战之后的美国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领导着同盟国消灭了纳粹和日本两大帝国的美国，再次领导着复兴了的欧洲和日本，开始了和苏维埃帝国的对峙。

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没有任何怀疑，而且美国人似乎也并不想独自享受自由民主的成果。为了消灭邪恶的苏维埃帝国，美国人大方地向欧洲和日本开放了它的市场。确实，当时的美国太强大了，它手里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欧洲和日本的中央银行随时可以以每盎司35美元的比例向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兑换黄金，美元就是黄金，所以叫美元为“美金”的人为数不少，这就是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叫“金本位制度”。

然而，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千年帝国和永不消逝的繁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为西欧日本等各盟国的经济复兴所付出的代价便是这个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实际上也就是美国经济的衰退。

战后，美国产业资本不断大量进入需求力旺盛的西欧日本市场，却给本国本土留下了产业空洞化，早在5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际收支就开始出现了赤字。随着冷战开始，害怕被美国人冻结资产的苏联人开始把其在美国国内的资产转移到了欧洲，这就弄出一个“欧洲美元市场”。这个欧洲美元市场一经出现就受到了热烈欢迎，本来也就是苏联人在英国银行和其他欧洲银行里弄了点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存款，但因为这种欧洲美元有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的控制、能够自由地进行资本交易的好处，这样反过来不但欧洲人开始用，就连中东产油国家卖石油的主儿也有不少跑到欧洲来了，最后因为美国企业在欧洲市场上筹集美元所受到的限制更少，致使美元流出美国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加上从60年代开始的越战，使得美国人已经无法维持金本位了，于是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的交换，放弃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了。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天正好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战胜纪念日。

里根政权的诞生距离美国放弃金本位的所谓“尼克松震撼”的时间并不久远，美国人真的非常希望曾经的二流明星罗纳德·里根能像他在那些廉价的爱国电影里那样，大手一挥就带领着他的国家重新走向辉煌，而围绕着里根政权的那些人也怀着这种希望。

里根他们从民主党手里接下来的是一个彻底的烂摊子，那个倒霉的民主党的天命似乎就是让美国难受，他们发起的越战除了带来巨大的生命和物质财产的牺牲之外，在精神上也几乎让美国分裂；接下来的“好大叔”卡特更是让美国在全世界成了供人讥笑的小丑—— 连落在伊朗人手里的人质都救不出来，还把直升机都全部栽在了沙漠上。

1981年初来到华盛顿的里根们最关心的，就是已经被卡特的民

主党政权弄得不成样子了的美元，身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却因为一跌再跌而没有人愿意要，这也太不给美国人面子了。更加成问题的是，这还不只是一个面子问题，美国的海外债权在逐年减少，而海外债务则在逐年增加，到了1985年，美国已经成为对外纯债务国。指望没有竞争力的美国产业来偿还美国的对外债务是不现实的，要润滑已经锈迹斑斑的美国经济机器，只能指望流向美国的外国资金，这样里根政权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强大的美国必须有强大的美元”。

副总统乔治·布什在一开始就讽刺那个口号是“符咒经济学”，千疮百孔的经济，喊声口号怎么可能就弄好呢？但是就像邓小平的“猫论”一样，只要经济能有起色，咒语就是圣经，更何况里根们也不是光念咒语，他们还是在干事。

里根政府可能是历届美国政府中最右翼的政府，这个特色都反映在第一届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上。里根政府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属于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相信市场、相信市场万能的所谓“芝加哥学派”。这些经济学家采取增加军事开支、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提高银行利率等一大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经济政策，只要眼前日子能过下去，就没必要去考虑他们死后是否会洪水滔天。但是民主党留下来的滞胀还真把“里根经济学”弄得停了下来，当然，异常坚挺的美元也顺带着把美国工矿业和农业赶出了世界市场。

但是，当时美国工农业的那些受害者们实际上并不像现在这么喜欢呼天抢地地发牢骚。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人当然不会像纳粹时期的德国人那样，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优秀，但也拥有足够的自尊心而不会去干“在电视摄像机的面前砸日本汽车”那种没出息的勾当。干那种勾当是快到80年代中期的时候，况且对于那些在摄像机面前挥着榔头砸日本汽车的美国哥们儿来说，他们砸的

并不是汽车，而是“寂寞”。

进入80年代之后，美国制造业和农业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使用政治压力了。以汽车、钢铁和工作机械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能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已经不是问题了，美元异常坚挺的背景实际上是美国产业构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用汽车公司驻华盛顿代表有一段话特别恰当地说明了这种变化：

> 世人到现在还以为以汽车行业为首的制造业能够左右政治，实际上已经不是这样了，金融和服务业现在比我们大得多，他们需要坚挺的美元，消费者们也一样。坚挺的美元能够降低物价，能够进口便宜的外国产品，只要再搞点减税、撒点钱，人人都有好处，所以虽然美元坚挺不符合制造业和工会的利益，但它确实促进了消费和服务。

真的，美元坚挺对健康、美容、金融、保险、不动产、零售、酒店餐饮、旅游运输、法律、媒体、数据通讯等行业都有好处。简单地说，共和党更加代表白领，而民主党更加代表蓝领一些，而强大的美元对白领来说没什么坏处，这就是共和党的里根政权上台之后美元越来越坚挺，但也听不到什么反对声音的原因。



3.舒尔茨的担心

日语管“日元升值”叫“円高”。日本人有个喜欢走极端的毛病，对于日本人来说，日元升值是绝对的坏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比如当年美国宣布放弃金本位的时候，日本是唯一没有关闭外汇市场的国家，愣是在12天内坚持卖日元买美元，想守住那条3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生命线，当然到最后也不可能守住，因为那不是“玉碎”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也只好采取了浮动汇率制。

所以在里根政权的前期，日本人的日子过得非常舒服，因为高居不下的美元，日本人正好大肆发展出口产业。当时在美国财政部和日本大藏省之间也有一个古怪的谈判项目，叫做“日元美元委员会”。不了解来龙去脉的人很容易理解错误，以为从1983年开始美国人就在动日元的什么脑筋了。其实不是那回事，那个“日元美元委员会”是美国人在督促日本加大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步伐—— 你日本人在我们美国市场上挣了不少钱，拿回日本去也是闲着，不如借给我们美国人，还能弄几个利息。这就成天琢磨日本人市场上都有些什么金融商品，这些商品为什么不能进入日本市场呢，日本的银行、保险等市场应该怎么开放等等，并不牵涉到汇率。

当然，日本人也知道这种好日子只能过一时，不能过一世。虽然美国财政部的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不来管日本人，但是有别的人来劝日本人，前面提到过的李·艾柯卡就是一个。艾柯卡的话不听没事，还会有更加重量级的人来说，不对，这次是超重量级的人——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国务卿不就是外长吗？这外交部长怎么狗拿耗子来过问汇率的事了？这里面有几个原因：首先美国国务院就有权管外贸；其次，乔治·舒尔茨除了是一位政治家之外，还是一位经济学家，而且还是芝加哥学派的，他在尼克松政府里就当过财政部长；第三，舒尔茨不像别的那几个人都是在学校教室里混的理论专家，人家在被里根找来当国务卿之前，还当过全美最大的工业建筑公司——贝克特公司的董事长，非常清楚汇率会怎样影响到公司的收益。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美国经济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垮了，起码所谓的“里根经济学”是已经破产了。依靠减税来促进消费、增加生产、扩大景气，这样一来，新征收的税收又可以填上减税的窟窿，从理论上似乎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在新征收的税收还没有到手之前，那些个窟窿怎么填？那可不是课堂里黑板上的公式，那是一时不填都不行的。再说，要实现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有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只有一个很小的政府，但里根政权在削减政府开支方面却没有什么进展，加上扩充军备的开销，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1980年美国贸易收支有260亿美元的赤字，贸易外收支的黑字比这个大，整个算下来还有20亿美元的黑字。但在随后的1980—1985年间，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贸易外黑字幅度又在不断减少，到了1984年，国际收支出现了1020亿美元的赤字。这样发展下去，到1985年会不会出现1400亿美元的赤字？实际上，里根政权一个任期下来的1985财政年度已经扩张到了2100亿美元。

这样的财政赤字是美元高涨的根本原因，里根政权把美国国债发行到了“滥发”的程度，只有依靠高昂的利率才能把债券推销出去，最高利率已经达到了20%，这样全世界的资金都被美国“吸”了过来，美元的汇率就是这样和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经济实力没有了关系，结果就是进口的大量增加，最后出来的就是里根经济学的特征：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这一对“双胞胎”。

这样当然不行，所以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不得不出面逮一下耗子了。1983年9月，舒尔茨在和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会谈的时候，突然冒出一句：“如果我们的财政部和你们的大藏省对汇率问题置之不问的话，我们两家的外交部门来谈谈怎么样？”

这句话在华盛顿和东京引起了一场地震。里根政权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大叫大嚷，恨不能把舒尔茨给撕拉撕拉了。财政部副部长麦克纳玛直接就冲到了国务院去抗议：你们怎么那么有空啊？有工夫操心这些跟你没关系的事，还不如帮五角大楼想个法子把红色苏维埃帝国给直接灭了！

国务院只好对财政部打哈哈，怎么说也是自己的老板吃饱了撑的惹的事嘛：“嘿嘿，这不就是讨论一下外交部门和汇率问题之间有没有联系嘛，我们当然知道汇率这事归两国的财政部门管，我们没那个权力，反正以后我们保证不再多管闲事就是了。”

怎么说国务院和财政部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也连着筋，偶尔吵吵架也翻不了大浪。但是，如果不是一家人的人看到了这个场景，又会怎么样呢？比如说反对党民主党，如果注意到了这个场景会怎么样？

自从1964年大老板肯尼迪被人刺杀以后，民主党一直没有什么出色的人物，好不容易来了卡特，又是一个可以让人随便捏的软面团。里根上台后，民主党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位叫蒙代尔的人，打算在1984年和里根竞选。先别说要提出美元汇率问题来指责里根

破坏美国产业经济，这位蒙代尔干脆就笨到了去相信“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里根要减税来弘扬景气，这位的竞选口号居然是“增税”，广大的美国人民当然是不可欺侮的，蒙代尔理所当然地落选了。于是，里根还是照样胡闹，日本也还是照样胡混。

蒙代尔是猪头并不代表美国民主党全是猪头，有人注意到了舒尔茨的担心，也有人听到了摩根和艾柯卡那两位老李的呼吁，民主党开始行动了。



4．民主党的选举战略

历史就是一连串事件的连续，这些事件可能互相联系，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但在谈历史的时候，有时候就必须从一件毫不相关的事情扯起。

1985年，加州选出的众议员托尼·科埃罗就任民主党选举委员会主席。不少人在谈广场协议的时候会谈到这件事，实际上这个科埃罗和广场协议没有任何关系，他也不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多少话题的重量级政治家，但他就任这件事确实让历史朝另外一个方向运动了起来。

科埃罗就任之后要求民主党的选举机器着眼于一年之后的中间选举，停止民主党以往的胡说八道，从而把宣传口径集中到贸易问题上来，“让贸易成为国政选举的大题目”，这样一来，民主党选举机器就开始炒作起贸易问题来了。一般说来，任何国家的在野党观点都是执政党肯定在卖国，至于到底有没有卖国，则是另一回事。身为执政党怎能不卖国？里根政权当然也应该在卖国，卖国的具体表现就在这个贸易问题上。

有两个叫摩根和艾柯卡的老李成天叫喊美元汇率太高了，他们

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民主党呢？共和党只会卖国，和他们谈简直是与虎谋皮。那个财政部长里甘不就当着李·摩根的面把一沓美元票子摔在桌子上喊道：“这沓票子的价值由谁决定？不是你也不是我，是市场！你知道吗？”天知道，那位部长大人是不是从日本人或者西德人手里拿了日元或马克。老李们应该来找我们民主党，我们现在是反对党，但不会永远是反对党啊，哼，不要狗眼看人低，民主党这就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

于是，从1985年春天开始，华盛顿的国会山上最时髦的词变成了“贸易”，准确地说是“对外贸易”，甭管你是什么党，和人说话不先从“贸易”这个字开始都不好意思开口。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议员都懂贸易经济？没那必要，只要会骂一声“狗养的日本人”就行了，再加一句“狗养的德国人”也没事，那玩意儿政治上正确，没人敢说不是，再者，已经骂了几十年了，说着也顺嘴。

4月份，参议院以全票通过了将日本列入“不公正贸易国”名单，之后的两个月里，在参众两院居然接连提出了好几百个有关贸易的法案，当然其中不少是像《红楼梦》里薛蟠的“一个苍蝇哼哼哼”似的玩意儿，但也有不少是很恐怖并且能够使用的贸易保护或者报复法案，民主党就指望着这个题目能让他们转转运，赢得第二年的中间选举。

其实，民主党都没有必要等那么长时间。1985年8月在德州就来了一次补缺选举，因为原来德州第一选区的众议员被任命为联邦检察官，出了空缺。在宣布这个任命之前，本来执政的共和党肯定是相信自己党的候选人能够继任当选的，没有想过这个选区会让给民主党，再加上这次共和党推荐的候选人埃德·哈格特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美式足球明星，而民主党推出来的则只是毫无吸引力的原州参议员埃德·查普曼，两人一比，高低立见。共和党没有输掉这个选区的道理。

但是阴沟里就是能翻船，到最后民主党的查普曼以51%的得票率微弱赢了这场选举，让共和党彻底石化。

选举刚开始时的舆论调查说明，选民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年金和进口限制两个问题上，对年金问题更加重视些，关心程度达到了92%，至于进口限制和德克萨斯这么个乡下地方到底有多大关系，是那么显而易见，所以关心程度只有76%。

民主党的选举部门讨论了大半天以后，认为在年金问题上要攻击里根政府恐怕不容易，他们注意到，德州第一选区的失业率为9.4%，而当时的全国平均失业率是7%。只要把这多余的2.4%的责任弄到共和党头上就行了，至于到底是不是共和党的责任那并不重要，只要选民们在投票的那几秒钟之内相信是共和党就行了。

在刚开始的一星期，民主党的选举策略并不成功，选民们还是觉得年金和自己的关系更大些，正当民主党快要彻底失望的时候，那个头脑并没有和四肢一样发达的足球明星给了民主党一个机会，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很纳闷地说："里根政府的贸易政策和本选举区的雇佣真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吗？"

是吗？那就让别人来告诉你有些什么关系吧。顿时，因为里根政府的无能而导致那些可恶的日本货泛滥成灾的宣传甚嚣尘上。对啊，在星条旗指引下的美利坚是多伟大的国家啊！当我们都已经在发愁往哪儿卖汽车的时候，那些黄皮猴子们可能连三轮车都还没见过呢——喂喂喂，有谁在太平洋战区待过的？出来给这句话作个证。

就是嘛，所谓"日本的奇迹"是谁创造的？是我们美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关系？离开了美国，日本的奇迹就是个屁。从韩战开始，我们给了他们最优惠的汇率，购买了他们那些质量低劣的军火和军服，派人去教那些笨蛋如何控制产品质量，最重要的是，我们向他们开放了市场，那是他们唯一的市场。没有我们美国，日本人到现

在可能还在修他们的草棚呢！

四十年前我们在太平洋战区流血牺牲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让这些黄皮猴子骑在我们头上？我们为什么要去保护那些黄皮猴子，让俄国人去奴役他们不是更自然些吗？我们在保护着他们不受俄国人的侵略，可是他们却在我们身后偷窃我们。对，是他们，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一个德国人，这两个二战的失败者。

这两个手下败将敢这样做是因为有美国人在怂恿他们，有些美国人鼓励他们以极低的汇率来增加向美国的出口，把我们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抢了去给他们，这就是白宫的罗纳德·里根和他那些喽啰们干的卖国的勾当。选民们，再重新考虑一下你们的选票应该投给谁吧？

一般来说，通过使用大量的“×奸、卖国”的字样向对手进行攻击，鼓舞起廉价的爱国情绪，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是一种相当简单而有效的政治手段，无论听众们被欺骗过多少次，也会再被欺骗一次，这就是民主党赢得德克萨斯州补缺选举的并不神秘的秘诀之所在。



5. 胆战心惊的日本人

美国国内为了贸易问题闹得鸡飞狗跳，在一边看着的日本人是胆战心惊。

一般说来，日本人是绝对反对日元升值的，但凡事都会有例外，这事在那个时候当然也就例外了，唯一的一次。那个时候有些日本人已经开始认为美元过于坚挺，需要加以一定的调整。

最早公开提出这个设想的是曾经担任日本大藏省财务官的细见卓。

“财务官”是个只有大藏省才有的官衔，有点怪里怪气不好理解。实际上财务官就是日本的通货黑手党的老大，英语为“Vice Minis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专管对外事务，这从财务官也被人称为“Mr. Yen（日元先生）”就可以知道。日本一般的省厅衙门的高级官僚们被国会调过去回答问题的情况很多，尤其在国会开会的时候，不知道哪个党的哪位议员突然就召唤哪位高级官僚去作证，不去的话当然是藐视国会，即使在外国出差也不是解释的理由：“知道国会开会还往国外跑，是不是有意躲避？”但有不少时候确实是有十万火急、比那个什么劳什子国会要重要得多的事情等着大藏省去处理，于是就整出来一个“财务官”的顶子，专门负责外交事务，不需要

到国会去听差。说他是大藏省的外交部长也行，是日本的经济外务大臣也行，反正在大藏省的排名仅次于事务次官，算老二。

细见卓当财务官是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取消金本位，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那次日本人奋起玉碎冲锋，想保卫固定汇率，孤军奋战12天的指挥官就是他。从那件事之后，细见卓便开始认真研究起日元汇率到底是高还是低这个问题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消失，日元从360上涨到308，涨幅达到16.88%，当时的日本国内一片哀鸿，大藏大臣水田三喜男因为这件事甚至操劳过度进了医院。

但是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日本人有点太自恋了，308这个几乎让日本人集体自杀的汇率数字在海外国家眼中根本就无所谓，或者不如说日元兑美元的比价太低了。日本国内外的看法差异当然令人惊异，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实是，日本产业根本没有被这个16.88%的货币升值难住，很顺利地走了过来。

细见卓从那十年日本所走过的历程中得出了这么几个结论：

首先，日元升值不像传媒或者政治家所说的那么恐怖；再者，关于日元汇率到底维持在怎样的水平才算合适，回答众说纷纭，没个准头；所以日本人应该抛弃对于汇率的迷信，更加主动地接受更高的日元汇率，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国际经济活动之中，找出一条和世界经济共同繁荣的道路才是正经，成天扯汇率的淡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细见卓当时是AF会的成员，所谓AF就是Advisory Friends（顾问友人）的意思，这是一个中曾根康弘的私人智库，领头的就是原来大本营精英参谋，伊藤忠董事长濑岛龙三，中曾根政府几乎所有的政策最早都出自这个机构。

大约是在中曾根政权刚诞生的1982年年底，细见卓就向中曾根递交了一份很详细的有关日元汇率的报告。这份报告认为，日本的

贸易出超实在太大，政府决不能坐视不管，日本政府应该主动出击，和美国联合起来提高日元汇率之后将其稳定下来，否则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将永远是一个最好的打击对象。

日元到底涨多少才合适，细见也没底，“估计也就一成左右，不会超过两成，肯定在日本企业能够消化的范围内。这是一剂烈药，但不服用不行”，细见的展望是：“日元升值之后日本的出口额降低，进口额增加，贸易不均衡的问题基本上能够得到解决，国民也能够从日元升值中得到实惠。当然出口行业要吃一些苦头，但是日本已经到了不能依靠出口来搞经济的时候了”。

实际上这句“在日本企业能够消化的范围内”是很有问题的，我们以后能看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AF会里支持细见的不在少数，野村综合研究所所长中川兴次在海军时代就和中曾根是朋友，他对这个方案的评价是：“国家要全面发展，需要全体意义上的生产力发展，低生产性的行业如果被淘汰，只要有高生产性的行业能够发展，整体的生产性就不会降低，现在中小零售业和农业的处境确实很艰苦，但这些生产性低下的产业也确实需要进行整理。现在美国人成天在说市场开放，规则缓和，日本人也在学着说，但如果不来一个全方位的行动的话，市场也开放不了，规则也缓和不了，这是一个经济构造改革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中曾根首相身边一部分高级智囊人士的意见，日本人从来就是倾向于保守的民族，这种积极的改革意见能通过吗？

能通过。当时并不是只有这几位看到了日元汇率实际存在的问题，以及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新机遇，还有一部分人是从实务上觉得美元的汇率出问题了，这部分人主要是大藏省的高级官僚们。

所谓里根经济学把美国的银行利率弄得极高，全世界的资金都

往美国跑，这样即使美国人什么都不干照样能吃能喝，而日本人也能从给美国人供吃供喝上弄点收入。这样的循环看起来不错，可是有两个问题：首先是这样的日子能不能万岁万万岁？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这是长久不了的；其次是高昂的美元利率把资金全部引向了美国，此时日本已经开始了资金荒，美国财政部和日本大藏省正就此问题展开谈判，如果听任里根经济学横行下去，美国肯定要完蛋，但是皮之不存，日本这些毛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附呢？

所以，一定要和美国人讲清楚这个问题，要增高日元兑美元的汇率。

和一般人所误解的不同，产生应该尽快调整日元对美元汇率这个想法的不是美国人，而是日本人。基于此，才有了广场协议。



6. 从“G2”到“G5”

数控机床的可执行命令代码叫做“G代码”，有趣的是，有关国际金融的会议可以称为是一个“G代码”的系列会议。当然，这个“G代码”和数控系统无关。这里说的“G代码”，是指这几年在媒体上常能看到的大写英文字母“G”后面加一个或两个阿拉伯数字的那种用法。比如“发达国家财长会议”把俄罗斯人也算进去了之后，就从“G7”成了“G8”，美国人要和中国人谈些什么金融问题了就会出来一个“G2”，等等。

有人一听说“G2”就热血沸腾，认为这是中国已经步入盛世的明证，当然也有人一听“G8”就会窃窃私笑，因为那个读音总能让人想入非非。

实际上都没那么复杂，这个G就是“Group”（集团，或团伙）的意思，这个代码是美国人在表示财政部长定期磋商机制时标明所牵涉到的国家数目，非常中性，比如“G5”就是表示“Group of five”，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深奥的含义。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G代码的历史很短，弄出这个东西来的就是乔治·舒尔茨。1973年舒尔茨在尼克松政府里当财政部长的时

候，常常把法国财长吉斯卡尔·德斯坦和西德财长施密特偷偷约到白宫图书馆来幽会，商讨一些美国和西欧盟国之间的财政问题，并称此为“Library Group（图书馆集团）”。后来，尼克松知道了这件事，说没必要偷偷摸摸，再加上日本和英国，大家干脆半公开半定期地碰碰头不是更好？这才有了这个简称为“G5”的五国财长会议，有时候这五个国家的央行总裁也来参加，正好这五个国家还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五大出资国，所以虽然G5和IMF没有官方的关系，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在G5会议上就被决定了。

除了这个“G5”之外，当时还有一个“G10”的会议，即这五个国家再加上意大利、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和瑞典。有时候这个“G10”里面还有一个瑞士，但即使有瑞士参加，国家成了11个，也还是叫“G10”，这是因为瑞士的参加仅仅是因为国际结算银行BIS在他们那儿，瑞士国家本身并不参与任何其他国家集团的讨论。

那时候也有一个“G2”，成员可能会让现在的人吃惊，就是美国和日本。是不是因为日本是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大国，所以美国就必须另眼相看，划出一块地儿来单独商谈？也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日本人在人多的地方怯场，不太喜欢热闹地方，有什么事喜欢闷得儿蜜，还有就是，日本人要找美国人商量的事特多，所以日美财长经常碰头，这就是G2。

其实，“G代码”仅仅指代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和别的无关。G代码中不包括其他部门的会议，所以“G5”指的就是5国财长会议，“G2”就是两国财长会议。至于还有一个开会的时期和它很近的发达国家峰会（Summit），则是另外一个系列会议，实际上和G代码会议没有关系。峰会始于1975年，资格比G代码会议要老，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后来的G5再加上意大利，第二年福特总统又开后

门把他的邻居加拿大也弄进了峰会，而意大利和加拿大又等了十来年，直到1986年才正式成为“G代码会议”成员。

言归正传，日本内阁和政府都下了决心，要日元升值，搞经济结构改革，接下来就是如何使日元实质上升值了，但这个问题却更加棘手。

一般来说，可兑换货币在没有什么影响其信用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对其他通货的汇率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当然可以对其汇率进行人工干预，从而使其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这种方法并不多，一般来说，可以用来升高日元汇率降低美元汇率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1. 政府出面大规模地进行通货的实际买卖以改变其汇率，其目的是降低美元汇率，所以就要在市场上抛售大量美元。这种手法叫做市场干预。

2. 进行改变银行利率的操作。一般来说，银行利率能调节货币的受人欢迎程度，两种通货之间的利率差异会引起资金在这两种货币之间的转移，也就是说，人们会抛售一种通货而购入另一种通货。这种手法叫做金利协调。

3. 通过协调两国间诸如财政政策之类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公共投资、税制进行宏观调控，从而改变两国一直被人称为“黑字体质”或“赤字体质”的经济构造上的问题，进而消除贸易不均衡的问题。

三种方法中以第一种方法最直截了当且效果直观；第二种方法呢？首先，执行权力就不在大藏省手里，各国银行利率的制定和监督都是中央银行的业务，财政部管不着；其次，靠利率来解决问题根本于事无补，美国人决不能降低银行利率，否则外来资金渠道一断，美国就完了。第三种方法何时能实现更是遥遥无期，里面所讲到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由各国的财政部掌握，但是如果想

要变化的话就得通过国会了。政客云集的国会在各国都是被公认为最不负责任的地方，指望谁也不能指望那些政治家，所以日本人还是指望采用第一种方式——也就是和美国人说好，大家凑一些美元，从什么时候开始联手，一起在国际市场上把那笔美元卖了再去抢购日元，这样呼啦一下就把日元弄上去，把美元弄下来。日本的出口肯定是减少了，可是上涨了的日元让日本人在进口时只需要付更少的钱，整个说来不吃亏，而美国人说不定就因为美元下跌，也能在国际市场上往外卖点东西，贸易不均衡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美元的银行利率也不需要下降，不至于弄得美国人被结了扎。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人能接受这个方案吗？里根政府的旗帜可是“强大美国的象征就是强大的美元”，要他们接受美元下跌是不是有损于他们的自尊心啊？白宫发言人跑出来说上一句“严重地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怎么办？

再说，里根政府里可全是一帮原教旨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政府干预经济和共产主义一样不可饶恕，怎么才能说服那帮原教旨书呆子也是一个大难题。

但是，日本人有点操心多了，有时候，里根政府和里根政府也不一样。



7. 不一样了的里根政府

1985年6月22日，G10会议在东京召开。

开会前的6月19日，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这儿来了位尊贵的客人——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代理大卫·马尔福特。马尔福特是来和大场商量搞一次G2会谈的事情的，理由是在美国日本两国的经济政策协议开始之前，两国的财长先见面谈谈。

大场很支持：“好啊，但是要不要设定一个题目，否则大家在一起乱扯也没有意思。要不两国财长讨论一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怎么样？”

说完这句话大场的心跳都要停止了：这句话算是说出去了，但是美国人的反应会怎样呢？如果美国人能接受这个建议的话，日美关系就有可能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但如果马尔福特拒绝的话，大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马尔福特在美国财政部的地位和大场差不多，虽然美国财政部没有“财政官”这个顶子，但马尔福特也是专门和外国打交道的，属于通货黑手党的一员。他和大场很熟，可以随便开玩笑，但这次他没有。

马尔福特眯起眼打量了大场一眼，很严肃地说：“懂你的意思了，这就回去对老板说。”说着起身就走。每次在东京见到大场都要敲竹杠的马尔福特，这次居然连让大场带他去吃那种女招待很有特色的什么火锅都忘了。

在大藏省门口对着远去的马尔福特的汽车深深鞠完躬以后，直起腰来的大场嘴里喃喃地念叨：“真想不到，美国人太善变了。主管的人一变，政策就变了，连思维方式都变了，这太不可思议了。”

确实让人不可思议，这里面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财政部换了老板。

里根政府进入了第二任期，发生了一些人事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财政部长换人。新任的财政部长是詹姆斯·贝克三世，是里根上个任期里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而这次接他班的居然是上届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也就是说进入这个任期以后，里根把贝克和里甘来了个对调。

虽然在美国政治中，总统是大老板，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去管也没人能管，反正出了什么事，责任也是他一个人承担，和别人无干，但人们还是对这次不常见的对调议论纷纷。白宫办公厅主任是大内总管，实权特大，在一般人看来那是个比财政部长要肥的缺，这明摆着是贝克在内部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

可是詹姆斯·贝克又不是职业政治家，干吗在权利斗争中失败了之后还要丢人现眼地待在华盛顿呢？所以这说不通。又有人说里根的老婆南希封建迷信多多，而里根又属于听信枕头风一类的男人，所以就推测说是不是又有占星师给南希出什么对调手下人的工作岗位能够讨个吉利的主意啦？

都不是，而是詹姆斯·贝克自己看上了财政部长这个位子。

詹姆斯·贝克三世，这个“三世”可不是什么国王，他是美国最有名的法律事务所的第三代老板，也是副总统乔治·布什的朋友，

主管布什的选举事务，和罗纳德·里根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美国副总统就是个花瓶，除了总统像肯尼迪那样被人暗算了才有副总统的出场，太平年间副总统什么能干的活都没有，副总统手下的人当然就更没活干了。这样里根才把这位号称“熟知华盛顿从表到里的一切”的大能人从布什那儿弄到自己身边，委以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大权，主管安全保障，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但詹姆斯·贝克还是布什的老人儿，和里根带到华盛顿的那些人不一样。里根的人是准备好了在里根下台后打背包走人的，但他没这种打算，他还要帮助布什成为下一届总统，他还要在下一届政府中继续干下去。所以在贝克看来，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个看来权势滔天的位置只是一个充满了阴谋诡计的宫廷政治的巢穴罢了，贝克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能力的国际舞台，但贝克也知道从大元老乔治·舒尔茨那儿弄到国务卿的宝座是不可能的，想干也必须再等上四年，到布什当上总统之后。因此贝克只能寻找次佳位置，那就是里甘现在正干着的财政部长。

同为爱尔兰移民，贝克完全看透了里甘有一种对权力和权力斗争的渴望，于是向里甘发出了“要不要换个角色玩”的邀请，果然立即得到了里甘迫不及待的回复，这才是这幕对调剧的真实情况。

贝克到财政部上任时只带了一个人来，那就是理查德·达尔曼。达尔曼是一个刚过四十的哈佛大学讲师，懂理论，懂政策，对贝克来说，达尔曼最宝贵的一点就是他还懂华盛顿的官场和政治。

但是这两人都不懂经济。

这当然不是问题，俗话说只要路线对了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少了点经济学家的专门知识能算是什么问题？摆在贝克面前最大的政治题目，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去阻止民主党赢得1986年的中间选举，否则他贝克老爷的国务卿美梦就成不了真。而

要阻止民主党的胜利，首先就要把议会里的贸易保护主义调调给封起来。

但是，怎么个封法？弄个反党反政府的罪名什么的去封肯定不合适，因为人家的天职就是反你共和党、反你里根政府。只能把民主党反共和党、反政府的根据给抽了——也就是说，扔掉“强大的美元”的旗号，将美元跌下去，想法子减少一点赤字，增加一点出口，扭转一点贸易上的不均衡，这样把事情做在民主党前面，他们暂时就没有什么可闹的了，其余的到四年以后再说。

1985年2月，贝克才刚上任就遇到了美元创下了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的最高纪录。当时以西德为首的西欧人开始干预外汇市场，有趣的是，美国人也时不时在市场上打一下游击战，虽然次数不多，投入的资金也很少，但已经和里甘时的“绝不干涉市场”不一样了。面对记者的发问，贝克拿出了几乎是讼棍的腔调来辩解，但实际上也就是在向人表示：虽然我贝克三世老爷来上任的时候脑袋是空的，但现在已经有主意了。

8．竹下登的小算盘

詹姆斯·贝克是有了主意，但是这个主意能否付诸实践可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天下是大老板罗纳德·里根的，甭管人家是不是刚上台就被一个追女戏子的傻仔约翰·欣克利打了一枪，弄得后来有点反应迟钝，但大老板就是大老板，只要里根一定要坚持他那个“里根经济学”，你就只能傻眼。

其次，这个财政部怎么说也是人家里甘的老地盘，里面向着里甘的人可能不会少，就这么占了人家店铺做自己的买卖，会不会在党内弄出反感来？

第三，浮动汇率就是在共和党元老舒尔茨手里弄出来的，那位芝加哥学派的大拿会同意自己的想法吗？说起芝加哥学派可真要命，总统经济事务助理斯普林格便是一位开口之前先默念三遍“市场就是上帝”的怪物。这共和党的怪物怎么这么多啊？

第四，并不清楚联邦储备委员会（FRB）主席沃克会是什么态度。牵涉到汇率利率这些具体问题，沃克实权不小，而且人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即使扣政治大帽子都没用。

最后，就算这些关节全部打通，日本和欧洲的盟国干不干？本来降低美元汇率这种事对别人不利，除了施加压力之外就不可能让人家高高兴兴地认账，而现在又不能把国会弄进来，也就是无法施加压力，盟国会那么爽快地同意吗？

贝克除了摸着石头过河没其他选择。把上面几条看了又看之后，贝克觉得只要能够得到舒尔茨和沃克这两个人的支持，成功还是有希望的。有了沃克的支持，技术上的问题就没有了；而如果舒尔茨能接受美元贬值的建议，共和党内的反对派就全归他处理了，人家是元老，拔根汗毛比一般人的腰都粗。再加上人家是国务卿，盟国得给他面子。于是，贝克就把工作的主要方向指向了舒尔茨和沃克这两个人。

工作怎么做？古今中外都一样，饭桌上说话最方便。贝克就向舒尔茨提出了共进早餐的建议，说是自己一直搞内务，对国际和经济都不懂，只能向您请教，但您老也忙，怎么着咱们一起吃早饭，您就趁机指点指点后辈吧！

这样舒尔茨和贝克再加上双方的副手四个人见天儿一块吃早饭，这早饭也不知道吃成了什么饭，经常是饭桌成了文件桌，连黑板带投影仪全部进了食堂，到后来不光是讨论经济和商务问题了，连外交问题也成了话题，据詹姆斯·贝克回忆说，他后来给老布什当国务卿干得那么得心应手，其实从那段时间的早饭中得益甚多。

饭桌是个好地方，很多问题能在饭桌上得到解决，贝克再接再厉，又开始约沃克一块吃中饭了。联邦贮备委员会主席沃克相当于央行总裁，对于这段时间美元的表现早就牢骚满腹了，但央行总裁手里的法宝有限，还都不是可以随便用的，所以没办法自己出头，只能等财政部的人翻然醒悟了。前些天，他看见贝克见天儿和那位主动要和日本人谈汇率的舒尔茨在一起吃早饭，就暗自猜测是不是

新上任的财长要玩新章程了。这一下得到了证实，沃克很痛快地答应了贝克：如果你想降低美元汇率而需要联邦储备委员会方面的技术支持的话，不管是在货币发行量还是在银行利率上我们都支持你，只管去干吧。

所以对于贝克来说，大场的建议正好就是那场万事俱备之后正在等候的从盟国方面刮来的东风。于是在东京“G10”结束的6月22日当天，詹姆斯·贝克和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又来了一个“G2”，开始具体地讨论日本人提出来的方案。

在日本政界人物中，竹下登算是一个很低调和深藏不露的人。但一般对于竹下登的“深藏不露”的理解是“他没有什么可以露的”。确实，这位来自日本海沿岸的岛根县的乡下人，既没有什么吓人的学历，也没有什么过人的能力，跟在田中角荣后面亦步亦趋的，也终于走到了今天，成了自民党最大派阀“创政会”的领袖，也就是继承了田中角荣留下来的那个巨大的派阀。基本上，在人们眼中，竹下登将接任中曾根康弘成为自民党总裁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但竹下登知道自己的分量，战前日本的总理大臣们自然不要说了，除了后期的军部强人之外，前期或中期的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战后除了田中角荣这么一个没学历的乡巴佬之外，其余几乎全部都是从帝国大学出来的精英官僚变身来的，要学历有学历，要资历有资历，要口才也是张嘴就能几小时不打奔儿的人物。那么能干的田中角荣，其内阁之所以会那么短命，在竹下登看来也仅仅是因为田中没有学历，触怒了那帮帝国大学毕业的秀才而已，所以虽然竹下登知道自己肯定能当上总理，但对能当多久却很不乐观。

没有学历又是乡下人，这些先天的劣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日本人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相比起先天不足来，他们更加重视后天的努力。竹下登从中曾根康弘出任总理以后的表现中体会到了一

条：如果能抓住电视这个媒体来强调自己和美国保持着亲密关系的话，在现代日本的政治市场上就会好混得多。

但如何抓住电视，靠近美国呢？现在所处的藏相位置就不如外相，那时候的外相就是安倍晋三他爹安倍晋太郎，帝大出来的精英，岸信介的女婿，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都已经会面二十几次了，竹下登把他看成竞争对手的头一名。但事在人为，在中曾根对竹下登说明日元升值构想的时候，竹下登想都没想就表了态——支持。

竹下登不像中曾根，还有什么“日本中长期前景”这一说，竹下登对事物的评价完全靠他在永田町（日本国会所在地）浸淫出来的政治感觉。他敏锐地感觉到，日元升值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边美国的贝克也是刚刚戴上财长的顶子，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贝克建立起私人关系，在日本政界也可以打造出自己的亲美形象。

詹姆斯·贝克可能根本就没想到，对面的大藏大臣满肚子打的都是这种小算盘。



9. 从G2到G5

因为知道日本人对日元升值有种先天性敏感的特性，所以贝克在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这次和日本人谈这个题目会很简单。但6月22日的G2很顺利，竹下登根本就没有提什么其他的附加条件，很爽快地就同意了日美联手进行市场干预。

俗话说"给鼻子上脸"，本来应该挺难办的事变得这么简单，让贝克觉得不顺便再弄点什么似乎就有些吃亏了，这就又开始了扯皮。

日本人原本打算日美联合起来在市场上炒一票就结了，白猫黑猫，日元上去了不就是好猫吗？但美国人不这么认为，美国人认为炒汇的结果只是暂时的，日本人必须拿出让日元走高的具体政策来，比如说扩大内需、减税什么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有个50%就行了，你日本人怎么没事就喜欢交税呢，居然把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定到了93%，你们日本人是不是有病啊？

实际上，美国人对美国财政赤字的看法，可以通过马尔福特对这些赤字的原因的分析看出来：

1. 美国和其他欧洲盟国的经济成长率有一个这样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实质成长率是4.4%，进入70年代之后降到3.1%。而

欧洲盟国的平均成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是6.2%，70年代为3.8%，都高于美国的成长率。但是在1982年到1984年间，这个关系倒转了过来，美国在这段时间里的平均成长率是5.3%，而欧洲盟国只有2.7%。美国成长率高于欧洲盟国的结果，是美国的进口大量增加而出口几乎没有增长。美国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增长1%，进口会增长95亿美元，而欧洲盟国的GDP增长1%，美国只能增加45亿美元的出口，1984年年底的欧洲工业生产几乎和1980年一样，如果欧洲保持了成长的话，美国可望多出口250亿美元。

2.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也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一个原因，在1980年，对产油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美国出口贸易的30%，而在那之后，因为累计债务问题，美国的出口发生了钝化，如果在1982年到1984年拉美国家的发展速度不减的话，美国又可望增加250亿美元的出口。

而日本的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马尔福特这样说过："美国对日出口不能增长并不是由于增长率的问题，而是日本市场的封闭性。1980年之后，日本的成长很顺利，但是美国的对日出口几乎没有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人知道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和进口无关，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要改善日美贸易问题，除了日本大规模缓和财政金融政策，就是要进行过度的日元升值。什么叫"过度"呢？那是因为美国人也不知道日元应该升值到一个什么价位才合适，只能从升值之后的实际财务指标来判断，所以说美国人确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日元升值的指标进行封顶也是事实。

而在广场协议一个月之后，当时大藏省的副财务官近藤健彦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么说的："如果要日本减少150亿美元的黑字，光调整日元汇率大概需要50亿日元左右，但假如仅仅靠扩大内需，即

使是采取取消个人所得税，再加上把公共事业开支扩大三倍这种不现实的政策，也只能减少100亿美元左右的黑字。”

就是说，日本政府中也有人意识到了日元一旦升值就可能止不住这个问题，但个别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等于达成了全体共识。更不等于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起码在那个时候，日本大藏省还是在就事论事地和美国人扯皮。

日本大藏省说别的没问题，就这个减税不行。日本大藏省当时打的旗号是“重建财政”，争取到1990年完全消灭赤字国债，但如果实行减税的话，这个目标就不可能达成了。这时候美国人就提出来要日本地方政府加强活力，由各地方政府自组财源来扩大内需，这样不就和中央大藏省的方针不冲突了吗？在这个问题上，日美对话是真正的鸡同鸭讲，美日双方互不理解，以后发生的不少事都和这有很大关系。

日本的地方政府和美国那种权力巨大，甚至自己拥有军事组织的州政府不同。日本地方政府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从中央政府分配来的“地方交付税”，所以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所谓“加强地方活力”也就是一句空话，反正地方上什么事都干不成，不如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给你美国人一个空欢喜，但却没有想到这个让步最后在泡沫经济时造成了惨痛的后果。

本来大藏大臣竹下登就坚决支持促成此事，所以最后没花多大工夫，日本于8月21日在夏威夷达成了三项对美国的允诺：

1. 金融自由化；

2. 使用民间活力扩大内需；

3. 降低银行利率。

这三条里没有包括美国人所要求的减税，并不是美国人撤回了要求，而是大藏省本身无法作出减税的承诺，因为那是自民党税

调会的权力范围，所以另外使用了一个备忘录的形式来注明还有这么一件事。

这下大家该动手炒了吧？且慢，美国人又出了新花样，这件事光日美两国干不了，得同盟国一起干，就是说要G5一起干。

美国人这次说的确实在理，首先，当时的情况不仅仅是日元汇率过低，而且是美元汇率太高，对所有货币来说都太高。需要调整的不光是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对西德马克、法国法郎和英国英镑的汇率都有必要调整，不拉上大伙怎么行？再加上西欧的那些盟国看到美日两国没事老是在搞什么G2也真有点吃醋，这次搞事不拉上他们，只怕以后什么时候会落报应。

这就是9月初的那个“伦敦G5D”的来由。G5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但是D是什么意思呢？这个“D”是“deputy”（次长）的意思，就是说那不是一个正式的财长会议，出席的都只是各国财政部的次长。

本来这种G代码中的D级会议都是在各国财政部大楼里开会，但这个行动还是在保密之中，所以干脆借了伦敦最有名的克拉里奇大酒店（CLARIDGE'S HOTEL）的总统套间来开闷罐会议。

10. G5准备会议

会议在伦敦开，按说应该是英国的财政次长做东道主才对，可是英国的李特勒摸着脑袋对美国的马尔福特说："大卫，人好像是到齐了，咱们要开什么会来着？"—— 几个欧洲人根本就不知道干吗要把他们拘到这里来。

马尔福特乐了，"嘿嘿，材料已经准备好了"，说着就给每人发了几张"non paper"，也就是讨论的提纲。这份提纲最早是日本为G2准备的一份名为《多角经济政策一览》的文件，经过两国讨论之后基本上定了稿，马尔福特又给它起了个"法国、西德、英国、日本以及美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声明"的名称拿到这里来了。提纲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各国的经济政策说明，大家各写各的，基本上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就是共分十八项的总纲，那需要大家来讨论。

这里面有个问题，怎么日美两国的时候对对方国家的经济政策要那样地扯淡，而五国到了一起却反而没事了？这里面最根本的理由就是，除日本之外，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美国联系得那么紧密。比如总纲第十项中有这样一句："贸易出超国日本和另一个贸易出超国西

德”，西德人一听到这句话就跳了起来：“贸易总有入超出超，是不是和美国人做生意发生了出超就犯天条？为什么要特意加上一句‘另一个……’？”马尔福特解释说，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都是盟国，专说日本一家人不太好，在中国砍头都要个陪绑的，这里你也就是陪陪绑，没说要砍头。再说了，日本有那么大的出超自然不对，但是你也是出超国啊，不说不能出超，但大家全部出超的话，老大我还怎么活啊？所以让你陪一下绑也不算什么大委屈。但西德人还是不干，马尔福特一看这样下去没个头，就说咱们先求大同存小异，只要这件事大致上大家不反对，具体的用词到正式的G5会议时候由大家的老板们去定吧！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出在用词上，就是要不要在共同声明里使用“干预（intervention）”这个词。马尔福特主张不用这个词，理由是使用更加含糊的字眼有利于加强对市场的压力，因为市场在弄不清楚这些通货黑手党们到底准备打哪张牌的时候，不敢随随便便地采取抵抗的姿态。

马尔福特的这个意见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心话，因为这种政府直接指定了具体数字指标之后来干预市场的行动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能不能成功大家心里都没底，如果没有成功那就太跌份儿了。

但别人都不同意。跌份儿当然不好，但这里面有比跌份儿更加要紧的事。大家都知道，虽然这次美国人破天荒地领头搞市场干预，但是美国政府和议会里还是有不少人从骨子里就反对这样做。虽然不管什么原因现在已经干了，但美国人随时可能抽身，留下其他人发愣，所以一定要在声明中明确写出这句话，让美国人没有退路才行。

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国作不了主的代理们，谁也不想为了这几个单词在酒店里坐闷罐，反正整个这件事自家政府肯定不会反对，特别是西欧这三个国家，他们在年初就已经自发组织过一次阻止美元

过高的市场干预行动，于是大家都同意了马尔福特的提议，顺便把第十八项里面的一句到底是“希望非美元通货变强”还是“保证非美元通货变强”的争议也留给了他们的老板。

胡适曾经提议过“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五国财长代理现在就是在听胡先生的话，不去纠缠这些具体用词了。大家关心的是市场干预的时机、规模和怎么分担，但是因为各国央行都没来人，真想讨论的问题也讨论不起来，还是只能交给老板解决。

等到大家终于发现除了老板亲自来，否则什么事都决定不了的时候，已经是9月15日，达成广场协议的一周之前。

实际上，这次财务次长会议是一场美国和其他盟国之间疑心生暗鬼的一场试探。直到此时，对美国到底在什么程度上能够转变以往对通货市场放任自流的立场，甚至美国人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西欧和日本都无法确定。这次会议结束之后，西德、法国和英国仍一直在紧密联系和磋商，甚至在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EC）的财长会议时，这三个国家的有关人物还要秘密接头，一来是揣测美国的真实意图，二来是讨论未来G5的干预动作对欧洲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美元贬值和随之而来的西德马克升值会不会影响欧洲货币系统的稳定之类的问题。

至于日本，虽然没有别人可以商谈，但是在大藏省和日本银行里也一直存在同样的猜测。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行天丰雄本身就是一个不干预主义者，一直自认为非常了解美国人，所以直到最后G5的财长声明之前，始终认为美国人的举动太古怪，一直不肯相信这是事实。而日本驻美公使内海孚则坚决认为美国已经转变了政策，直到《广场协议》发表的那天早上，这两个人还在竹下登下榻的房间里争得面红耳赤。

实际上，在伦敦的这次会议上，唯一得到了一致支持的意见就

是借助所有的传媒力量来宣传，大家都同意没有电视和报纸的宣传，想把强大的美元变成软弱的美元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对美元的信赖实在是太深太深了，光靠国家间的政策合作或是联合干预可能无法扭转这种信赖，所以未来的G5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必须向传媒公开，借助传媒的力量。在当时，G10是公开的，但G5却是秘密的，除了G5的参加国之外，没人知道有这么个定期会议的存在。但这次为了达到最大的震撼效果，所有人都同意公开G5的存在。

11. 广场协议

这次的G5在纽约举行，本来应该是在位于华尔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大楼里召开才对，但是詹姆斯·贝克听到FRB（联邦储备银行）就头疼，因为那是他管不到的一块，所以为了照顾贝克部长老爷的情绪，才出了个在酒店里租会议室的主意。

1985年9月22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30分，被称为“G5”的美国、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这五国的财政部长、副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会议在纽约曼哈顿广场酒店的“白金间（White and Gold）”开幕，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多国合作企图干预通货市场的尝试。

本来应该是10点45分开会的，但有趣的是土地爷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迟到了，居然还迟到了45分钟。虽然美国官方对于贝克迟到的解释是飞机因气象原因而晚点，但所有的人都把贝克的迟到认定为作秀，为了最大规模地吸引媒体的注意而特意作出来的秀。

五国财长、次长和央行总裁会议，按理说出席的应该是15人，但实际上是18人。美国加了一位马尔福特，因为正式会议之前的联系都是马尔福特一手操办的，正式会议没他在场恐怕到时候会扯皮。另两位参加者就有意思了，会议使用英语，但日本人不

会英语，而法国人不用英语——老子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只好给这两个国家配上翻译。

到底都是各自的老板，一星期之前下属们怎么都定不下来的句子到了这里，很快就全部通过了。首先大家就确定了下来，是“非美元通货的升值”而不是“美元的贬值”，而且还是“有秩序（orderly）的升值”。

至于德国要不要陪绑，德国财长也很爽快地同意了，反正就这一次，又不是成天陪绑，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是一桩美谈。至于这朋友到底是日本还是美国也没人知道。之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起真正的细节来了：出多少钱？怎么出？怎么花？

美国人的估计是整个行动大约要六个星期，总投入可能不会少于180亿美元。总体说来是一次集体抛售美元、收购日元或者西德马克的行动，但是英国或者法国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收购英镑或法国法郎，甚至德国可以收购一定的意大利里拉。

怎么会扯上意大利里拉了呢？实际上那时已经有了一个欧洲货币系统EMS（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了，也就是现在欧元的前身。1979年EMS创立的时候，所有人都把它看做一个笑话，甚至有人讽刺说，希特勒用坦克履带都没有统一起来的西欧怎么会被波恩（当时西德政府所在地）政府用马克统一起来呢？但是加入EMS的那些国家都已经吃够了通货膨胀的苦头，也知道不安定的通货已经在三十年中两次把欧洲带进世界大战，因此都尽了最大努力，宁愿放弃一部分国家主权，也要一个稳定的通货系统。

西德在EMS中发挥的作用最大，实际上EMS也就是以西德为老大。老大同时就有照顾小弟的责任，EMS中最弱的小弟就是意大利，如果作为国际储存货币的美元在汇率上出现动摇的时候，意大利里拉必定成为抛售的对象，而西德有保护意大利里拉的义务，这才有

西德可以收购里拉这一条。

美国人最早提出来的有关180亿美元资金的分担方案是：美国、日本和西德各自分担25%，剩下来的25%由法国和英国平分，每人12.5%。

但欧洲国家不同意这个分配比例，认为美国和日本的承担太少了，而欧洲国家太多。本来这件事主要就是美元和日元之间的问题，和欧洲人没什么很大关系，美日两国就应该多承担点。再加上美元走低肯定会引起马克走高、法郎和英镑走低，这样会在EMS内部造成混乱，为了吸收和消除这种混乱，西德、法国和英国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去进行市场干预。西欧国家提出来的分配比例是美国和日本各自承担30%，剩下的40%由西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承担，不在内部按国家硬性分配。

美国人同意欧洲人的意见，但要求欧洲人必须亲兄弟明算账，提出各国承担的份额。到最后，欧洲的40%是这样分配的：西德25%，英国5%，法国10%。

据说原来出了由英法平均分配、每人7.5%的方案。但法国人觉得被西德人抢了风头就已经很窝囊了，若还是和英国人一样那也太没有面子了，堂堂的常任理事国总得有点“大国”的样子，但要摆大国的谱又囊中羞涩。但不管怎样，只要能压一下那些英国蛮子总是件开心事，要知道，他们可是几世纪的仇敌了。

至于英国人到底想些什么就没有人知道了，不过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秦琼也有卖黄骠马的那天，钱是硬指标，不是想拿就拿得出来的东西，有些时候也只能忍气吞声。但不管怎么说，大家聚在一起是为了啥？为了美国是不是？这英国和美国是谁跟谁啊。

目标呢？扯了半天皮之后，很含糊地定了一个“10%—12%”的框框，但其实谁都没有把这个框框看得很严重。当天的汇率是＄1=

￥238.7=DM2.84，15%的上浮就是220日元或者2.6西德马克左右，但实际上日本和西德两国都已经做好了接受1美元兑换200日元或者2.2西德马克的思想准备。

准备工作完毕，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佩尔对坐在身边的日本财务官大场狞笑道："日本日出最早，明天终于是你们打头阵了。"

佩尔很不喜欢日本人，因为他认为日本人最自私，为了保护日元的汇率从不管别人，佩尔只要一想到倒霉的日本人不得不第一个出钱去买高日元，就觉得非常开心。

大场当然知道佩尔在想什么，很亲切地回答佩尔："嘿嘿，特别遗憾，明天是秋分，东京是法定假日，市场不开张，看来还是你们法兰克福开第一枪。"大场已经估计到了佩尔会说这句话，还专门为了回答佩尔预先从字典里查了"秋分"的英语说法"Autumnal Equinox"来憋佩尔。

12. 战争开始了

美国东部时间1985年9月22日16时，G5会议结束。贝克带着参加G5的其他成员出席记者招待会，简单地说明了会议概要，朗读了声明全文之后，由美国财长贝克作为代表，向记者介绍了各国将要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

贝克并不是在不分青红皂白地罗列介绍所有国家的所有政策，那个在会议声明里就有。贝克只是介绍他，也就是美国所关心的那些国家的那些经济政策。比如对于日本，贝克是这样介绍的："日本同意将通过扩大消费者金融市场和住宅金融市场来扩大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作为今后的重点，努力促进国内需要。在中央政府继续削减财政赤字的同时，向民间部门提供重视成长的环境，并且鼓励地方政府进行新的投资"。

当时，除了有几位在场的日本大藏省官僚从这几句话里得到了一个"美国和日本对于地方政府的认识确实有些不同"的不痛不痒的结论之外，无论是招待记者的那些通货黑手党们，还是被招待的那些新闻记者们，这个时候都没有想到，最后就是因为这几句话，弄出了一个巨大的泡沫经济。

为了渲染这次G5会议的重要性和压制议会里越来越强的保护主义情绪，当天晚上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还在白宫发表了有关新通商政策的讲话，里根在讲话中说："我知道只要贸易系统遵循自由贸易的规则，只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美国商业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拥有创新力、效率和竞争力，也正因为如此，国际贸易系统只有在规则得到普遍遵守的情况下，才能开始有效运作。自由贸易首先是公正的贸易，如果对别国的出口关闭本国的国内市场，就不是自由贸易。"

这是美国第一次把一直在高歌的"自由贸易"改成了"公正的贸易"，从那之后，"公正的贸易"频繁地出现在美国人的言论中，成为美国向其他国家（当时是日本，现在是中国）施加压力时使用的重要言论武器。

但当时的里根并不是在使用一件什么言论武器在打击日本，他是在真诚地抒发着自己的见解。除了能够满足人类最廉价的好奇心之外，在真正的历史上是没有什么"阴谋论"的存在根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除了威尼斯共和国之外，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过千年之国，所有的巨人都只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而已，不否认这些过客们会去乞灵于一些阴谋诡计，但是如果真要去相信那些连自己的存在和命运都无法理解和把握的过客能够洞穿历史，从而试图用阴谋手段得到令人超越历史的结果的话，其出发点只能归结到人类对于那种阴谋能力的无法抗拒的迷恋情结。

里根在真诚地抒发着自己的见解，同时那些通货黑手党们也在真诚地履行分配给自己的那部分职责。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在广场酒店里没有给西德联邦银行总裁佩尔留什么面子，但那只是图个嘴巴痛快，实际上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银行，不，应该说日本内阁和政府，比任何人都更加重视这次作战行动，可以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这

是战后第一次由日本主谋策划的国际联合行动。

9月22日纽约G5结束之时，东京已经是深夜了，这条消息来不及登上23日早上的报纸，而且因为23日是秋分，是日本的法定假日，报纸连晚报也不出。这么大的事件居然两天之内上不了平面媒体，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

虽然因为这些阴错阳差，没有平媒来报道广场协议的消息，但是霞关（日本中央政府各省厅所在地）一直在注意着来自全世界的信息。虽然大藏省深知那些交易商们比任何人都更加重视信息，是不是秋分阻碍不了他们从全世界所有角落得到各种信息，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大藏省破例向所有日资以及驻东京的外资银行机构连续通报“广场协议”以及大藏省自己收集来的相关信息。

大藏省对“广场协议”能不能成功并没有什么把握，毕竟这次的作战对象是位居国际贮备通货宝座的美元。

第二天最早开始营业的市场是国际日期变更线边上的新西兰惠灵顿市场，虽然惠灵顿只是一个很小的市场，G5中没有人把那儿作为一个作战阵地，但开盘之后美元对日元的比价立即从239跌到了234，跌了5日元。

接下来是香港和新加坡，也是美元在不断走跌。到这时为止，G5成员们还没有亲自出手干预，市场只是在按照自己的直觉行动。

就像大场财务官在广场酒店对佩尔总裁指出的那样，G5真正开始行动是在法兰克福市场开盘之后，佩尔指挥德意志联邦银行进行市场干预，随着巴黎和伦敦市场的开盘，G5的干预规模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伦敦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比价已经升到了230日元，一日内涨幅接近5%。

接下来开盘的是纽约。可能是美元在老家受到更强劲支持的原因，在伦敦市场价已经是230的情况下，纽约的开盘价居然是231！

但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从下午开始2.5亿美元的市场干预之后，纽约的市场价升到了225。

直到这时，那些半信半疑的交易商们才算彻底大彻大悟——美元要跌！全世界所有的交易商都开始放声高歌——卖！卖！卖美元！市场上就只有这一个声音。那些饱经风浪、见多识广的交易商们在高唱的同时，心头还是一连串挥之不去的疑问：这是为什么？难道钱可以这么赚？而钱居然这么容易赚？既然可以这么简单地赚钱，那还要考虑什么，赶紧卖美元就是了。

说兴奋也行，说狂喜也行，反正1985年9月23日的所有外汇市场都被这样的心情笼罩着。



13. 稳定战果

9月22日下午，G5的财长和央行总裁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向媒体公布了“广场协议”之后，从23日开始，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以及在西德指挥下的EMS内其他欧洲国家，在欧洲和北美市场开始了一场可以说是史上最大的联合干预行动，美元在这场干涉行动中以眼花缭乱的速度直线下跌，形势一片大好。

23日是日本法定假日，市场不开张，所以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反而没有出手的机会，只能站在一边观战。藏相竹下登和财务官大场智满23日从纽约坐飞机回东京，在肯尼迪机场上飞机之前得到的信息是纽约市场在FRB的干预下，日元已经升值到了225左右，他们估计，第二天的东京市场的交易水平应该在223到221左右，甚至可能达到220。美国人可能把困难设想得太大了，实际上在一个星期里大概就可以完成10%的原定指标，说作战行动已经接近尾声似乎也不为过。

可是当他们在成田机场着陆之后，从机场的新闻屏幕上看到的消息让他们不禁石化了：东京的市场价居然是230，比前一天世界任何市场的实际成交额都要高，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大藏省和日银在

联合罢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方案，结果只有日本人在拖后腿，这让日本人今后怎么混啊？

竹下登错怪了大藏省和日银，事实是，大藏省负责的国际金融局和实际经办的日本银行外国局为替课早就在一起制订了具体行动计划，由为替课课长大熊义之亲自坐镇指挥，决心打好这意义重大的一仗，以实际行动向自民党汇报。

这还真是“打仗”，那时候的市场干预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体力作战。显示各种指标和信息的CRT（Cathode Ray Tube的缩写，阴极射线管）显示屏当时已经有了，实际市场也好，大藏省或者日本银行的有关办公室也好，基本上都装备了些信息机器，但实际交易中还没有开始使用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所有的交易都必须人工一张一张地填写传票，信息的传送依靠电话和传真，其作业量之大之繁重是现在坐在CRT面前按鼠标的人无法想象的。

当时的东京外汇交易市场规模远小于纽约、法兰克福和伦敦，但是却表现得极不寻常：一早东京的开盘价就是230，而且，最奇怪的是，东京市场对日银倾倒进去的大量美元似乎没有反应，白天最好的成绩只是228，中间美元还有过好几次反弹，其中最强劲的反弹居然到达过232。

当然，这里面有市场对美元的迷信尚未消失、投机商们为了确保眼前利益在往回兑换美元现货等因素，但东京市场反常表现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东京市场是个很特殊的市场。

即使在金融市场几乎已经全部自由化的今天，东京市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和世界上其他市场不同的特殊性，也就是其投机性不太大。而当时美国人还只是刚刚开始教育和催促日本进行金融自由化，那时候的东京外汇市场基本上就只是一个实质需求市场，不是一个以钱赚钱的投机市场，实质需求之外的外汇交易原则上

在东京市场是被禁止的。所以虽然东京外汇市场规模不大，但很稳定，几乎是那些本能地信奉“肥水不流他人田”的日本企业调剂所需外汇的唯一地方。

日本的进出口商人们长期以来就一直被坚挺的美元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有了一点疲软迹象的美元立即成了日本进出口商人们抢购的对象，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日本经济不是靠一点市场干预就能够糊弄过去的，在那一天之内，日本银行就往市场里倾倒了12亿美元，但最后的结果是东京市场的日元收盘价比开盘价还高了0.4日元——大藏省和日银算白干了。

光靠物理的干预是不行的。从理论上来说，虽然有点有利条件，但政府在市场上最后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家，这种地位是由游戏各方所掌握的资源决定的，政府并不比别的玩家拥有更多的资源。

当然，政府也拥有别的玩家没有的资源，那就是政府权力。他们可以通过政府官员的发言和讲话向外界传播心理压力，也可以通过改变银行利率等行政手段向外界传播实际压力。总之，不管光彩不光彩，政府总有比别人更多一点的方法诱导市场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至于最后是否成功或者是否正确则是另一回事。

为了扭转东京市场的古怪现象，日本政府也只能在市场干预之外再采取这两种方法了。大藏大臣竹下登和日本银行总裁澄田智反复在各种场合下发表讲话，再三说明这次的日元升值属于“官方制造”而绝非过去的山寨产品，升值是大方向大趋势，美元只会下跌而再不也不会上升了，进口商们没有必要那么急于去买刚刚开始走跌的美元。

说服进口商不要急于抢购美元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利率上做文章。虽然在广场协议之前的谈判中都已经说好了，美元之外的通货的银行利率都不往高调，以免影响对美国的资金流动，

但是日银也不是没有其他瞒天过海的伎俩。除了银行利率这个官方的公开的一般长期不变的东西之外，各国中央银行手里还有一个叫做“短期利率”的东西，那是银行之间的短期拆借所付的利率标准，提高这个利率和广场协议没有冲突，但对于银行来说，这个利率的提高就等于有更多的理由将手上的美元资金换成日元，以在短期拆借中赚取利息。

一手一手又一手，这手不行换那手。反正在大藏省、日本银行的充分努力下，10月份以后日元即使在东京市场上也进入了210，广场协议所规定的“主要非美元通货升值10%到12%”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

看起来广场协议执行得很顺利，该开庆功会了。

14. 广场协议成功了吗?

如果历史停留在那个时刻的话，可以说广场协议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不是吗？在是否要进行一次人类历史上首次如此大规模的市场干预的问题上，美日德英法五国联合起来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取得了一致意见，而这个干预的对象还是被视为主权中最重要部分的通货。

更为重要的是，干预的结果达到了五国在开始所预想达到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场协议当然成功了。

可是，又该如何解释2008年因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倒闭而引起的直到现在还没有离我们远去的这场金融危机呢？如果广场协议真的成功了，美国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美国制造业恢复了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那么，美国人是否还有必要去弄出那么一个诈骗嫌疑极为严重的次贷问题呢？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从来就没有恢复过来，美国还是像在“里根经济学”那个时代一样，只要日子能混得下去，就根本不会考虑别人地界里是不是洪水滔天。

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场协议根本就没有成功。

要评价广场协议是否成功，还得回到广场协议的原点来看。

广场协议的野心很大。现在有人一开口就是谁谁谁“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些人经常被戏称为“大棋派”，也有人称他们为“麻将派”，用麻将派的时髦话来说就是：西方国家当时想打的麻将未免太大了。从表面上看，广场协议的目标是想在短期内把主要非美元通货的汇率上升10%到12%，但这个目标只是一个手段，上调非美元通货汇率的目的在于首先解救已经丧失了国际竞争力的美国制造业，还有一个目的是加强日元和西德马克的购买力，扩大日本和西德的内需市场，在作为西方经济的最后市场的美国不能继续扩大的时候，收容那些西方经济中已经开始过剩了的产能，以使西方经济得以继续发展。

因此，到现在为止的美元下跌根本就不能作为什么广场协议成功了的标志。相反，有关广场协议的话题现在起才刚刚开始，如果美国制造业不能从降低了的美元汇率中得到好处，如果日本和西德的内需不能因为其通货汇率增长而增加，广场协议所带来的国际通货汇率变化就毫无意义。而签订广场协议的那些人也是从现在才刚刚开始感觉到，他们似乎开始了一项巨大的连他们自己也没有理解的工作。

美元的汇率调整完了，但是美元汇率调整的结果迟迟不能出来。这是因为有好几个因素在起作用，这种作用影响着实际上的结果和刚开始时大家所预料的有点不同。大家都有点茫然了。

当初那位叫摩根的老李在华盛顿的国会上上窜下跳到处游说时，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对那些议员老爷们保证，说只要美元能跌到180或者200，他的推土机就会重新像二次大战时那样推倒一切障碍而横行世界。现在虽然还没有到180，可是已经在200边上转悠了，但是美国产品的出口前景并没得到什么改善。

这是因为出口生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恢复的，即使产品恢复了

竞争力，离买家的出现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总有一段时间上的滞后。另一面是进口也有这个问题，并不是美元汇率下跌之后，进口额就会立即减少，也有一个时间的滞后问题。

但是贸易结算却没有滞后问题，汇率一发生变化就立即会在账簿上反映出来，这种现象叫“J曲线效应”，指的是在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一段时间之内，进出口额度会向反方向扩大，就像“J”的最后一笔向反方向勾起来一样。

而美国人不知道这个在外贸上属于常识的统计现象，因为他们所使用的通货是基轴通货，也就是国际结算单位通货。所谓汇率发生变化一般说的是别种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发生了变化，别的国家在进行统计时会出这种问题，而只知道美元单位的美国人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这次美国人要达到的目标是减少进口和加大出口，现在却由于美元下切的“J曲线效应”，从统计数据上看到的结果是出口额进一步下降，进口额反而进一步上升，贸易赤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急剧扩大。

“J曲线效应”是一方面，还有更加让人想不通的一点，就是除了广场协议刚刚结束的那些日子之外，日本商品的价格并不像人们当初想象的那样产生了普遍飞涨的现象。不能说没有飞涨的，但那都是一些刀叉杯碗之类的餐具或者类似的小商品，美国人真正重视的钢铁、机械、汽车、半导体产品和电子产品，并没有发生预期中的飞涨。

有过这么一件事。2000年第26届发达国家峰会在日本的冲绳召开，参加这个峰会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再加上俄罗斯和欧盟。当时的日本首相森喜朗在作为东道主主持欢迎宴会祝酒的时候，第一杯酒居然是敬给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因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这就是美国人能够毫不迟疑地把产品销路不畅的原因归结到美元汇率太高，还想出一个让别人提高汇率以增加自己产品竞争率的主意的原因，因为它是超级大国，它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而那些所谓“别的国家”其实都只是他的小弟。

事实上，日本人除了是小弟之外什么都不是，无处去诉苦和喊冤，即使确实是因为汇率的原因造成产品的竞争能力下降，日本人也只能默默地寻找解决的办法。也就是想法子开发和别的国家没有竞争关系的新产品，在老产品的制造工艺上深挖潜力，降低制造成本，起码争取不要比原来汇率改变之前的销售价格高很多。这样一来，不肯在制造业上下工夫的美国人就看不到那种单纯的、由于汇率变化而使得日本商品价格暴涨的场面了。

这一下大家都傻了。

15. 主动为国分忧

往往有这种情形出现：一件事情做起来了之后，由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大家也就手忙脚乱地去处理，到最后连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都给忘了个一干二净。广场协议的当事者们就是这样，日本人当然也是这样。

本来，日本人搞日元升值一来是减少一点对美国的出口出超，再增加一点进口，使得外贸账户上能够平衡点，省得全世界看到了日本都像看到强盗一样，到哪儿都没人给好脸色。池田勇人首相访问欧洲的时候，居然有报纸的通栏标题是："那个半导体推销员又来了"，这也太不给面子了。

要说日本人没有考虑过拉动内需，摆脱依赖出口为生的处境那可不是真话。日本人做梦都想摆脱靠国际市场吃饭的境地。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搞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那一天开始，就在为了国际市场而烦恼，这还不仅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商品交换的经济"这个概念。本来日本不是一个小国。日本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如果放到欧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日本应该拥有相当可观的国内市场，但由于日本极度缺乏资源，从石油到铁矿石的所有自然资源都

必须花费硬通货从国外进口，否则制造无从谈起，这样，日本的大国自然条件就被这个进口问题削减得差不多了。因此，日本人谈起经济首先就是“出口”，只有实现了出口，才能换回硬通货来购买原材料进行再生产，日本人才能活下去。久而久之，“出口”成了类似于某种拜物教似的存在，一切为了出口，到最后是为了出口而出口。日本人从未考虑过是否有必要如此强调“出口”这件事。

广场协议是要日元汇率上升，这就要影响日本企业的出口，对于日本企业来说，这就是威胁到能否继续生存的大问题。于是日本全国上下一心在讨论的是如何应付这个日元升值影响了出口的问题。

其实讨论这个问题是很古怪的，但当时日本没有人去想这个。本来广场协议的目的是要减少日本的贸易出超，所以大家才弄出一个非美元通货对美元的汇率上调10%到20%的目标。因为美国人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也仅仅是由于坚挺的美元才使得美国产品没有竞争力，如果美元汇率能够下调10%到20%，下调的这部分就可以用来填补美国产品由于价格昂贵而影响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美国人向日本人要求的是市场份额，是要日本少出口啊。

但日本人没这么考虑，日本所考虑的是为了平息美国人的怒气，尽可能地避免美国启动经济制裁措施，作为一种让步而主动提出将日元升值。对于日元升值之后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由于汇率上升而带来价格上涨，从而削弱竞争力的情况，日本则是本着挖潜的方法来填补的。也就是细见卓报告中的“在日本企业能够消化的范围内”。

从一开始日本人就没有想过要减少出口！他们想的只是做一点让步，同意日元实行一点升值。美日间的这种认识差异既在当时要了日本人的命，也在后来要了美国人的命。

各个企业进行这种挖潜填补的工作是很自然的，企业的目的就是盈利。而日元升值会影响企业的收益，本来政府应该想法使日元

的汇率保持稳定，而现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政府无法做到，甚至还要参与帮助日元升值，这些问题日本企业还都能够理解，所以它们主动“为国分忧”，不搞“等靠要”，而是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汇率上升自然带来销售价格上涨，产品在价格上也就失去了竞争力。独门商品当然不受影响，但绝大多数企业所生产的都不是独门商品，而是通过艰难的竞争之后才好不容易在市场上占有那么一块份额的，这块份额增大就意味着企业在发展，相反，这块份额减小就意味着企业经营陷入困难，企业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市场份额”，而汇率上升直接打击的就是这个“市场份额”，企业是绝不肯放弃这块市场份额的。如果市场份额的减少是因为汇率上升而引起的价格上涨所造成的话，那就在制造工艺上想办法，把成本降下来，从而抑制销售价格的上涨，这样就能保住那块市场份额，而所付出的代价是降低成本的辛苦。

这种降低成本的工作可以用“壮烈”来形容，笔者曾经亲眼看过这么两件事，很可以反映这种“壮烈”的含义。一次，在一家为丰田配套的零件工厂，我看见一个操作数控机床的年轻工人被前辈狠狠批评，原因是这位小伙子在拉开防护罩门的时候，没有按照公司的规定只拉开头能伸进去的宽度，而是一下子拉到了底。前辈很严肃地对他说：“虽然一次这样的拉门动作浪费的时间都不到零点几秒，但是长期积累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更重要的是，你的动作说明你还根本就没有理解到节省时间、降低成本的重要性。”

也是这个工厂，原来是在加工工序之后用压缩空气吹掉零件上附着的切削液，现在是通过一个斜面让零件滑下来以后再用压缩空气吹，这样零件上附着的切削液在下滑过程中能滴在斜面下面的回收装置中，既保护了环境又减少了切削液的消耗。

日本企业在降低成本上的不少做法都来自于美国的泰勒制，有

趣的是，在战前日本人曾经是那么坚决地抵制泰勒制，他们认为泰勒制伤害了手艺人的自尊心，把本来应该是乐在其中的劳动变成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负担，而“手艺人”这个概念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是很高的，美国人这种不尊重手艺人的文化很自然地被认作是“敌性文化”，不被日本人接受也是很自然的。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人使用大量日本工业制造能力支援战争后勤的时候，麦克阿瑟才告诉日本人，光靠手艺人是无法打造现代化的大工业的，日本人这才接受了泰勒制。和其他的东西一样，日本人一旦接受了一样东西之后，肯定能把它改善得比原来还好，泰勒制也是这样，现在日本人就以从美国人那儿学到的方法来对付美国人的围剿了。

16. 一切都始于广场协议

对于日本人来说，日元升值所带来的确实是真真切切的痛苦。痛苦当然不光是推行节约时间的泰勒制，本来文化中就有节俭传统的日本人，在一切方面都开始精打细算、节省开支。比如在前面的那个回收原来被压缩空气吹掉的切削液的例子中，虽然每年也就只能节约三百万日元，大约半个人的年薪，但是还有其他的节约项目呢。当然，出差坐飞机尽可能坐经济舱，没事不要去住五星级酒店，在大多数企业都不需要明文规定了，大家都会自觉做到。笔者听说过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节约经费的例子，大概是有公司居然连恭贺新年的贺卡都从香港往日本寄，这是因为香港的国际邮政价格低于日本国内邮政的价格，对于每年有着巨大数目的信件、贺卡的大公司来说，肯定会注意到其中的价格差异。

日本企业这种拼命挖潜降低成本的过程被很形象地称作“绞干毛巾”。在企业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降低成本是多么不容易，美国的那个李·麾根不就公开讲过降低15%到20%的成本是不可能的吗？而日本人居然在层层努力下做到了这点，随着日元的不断升值，市场上的日本产品却没有表现出什么大幅度的涨价。

日本人最痛苦的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把被美国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化作了可能，但是其努力换来的回报只能是另一轮新的日元升值。广场协议签订之时，有关日元升值10%的商定和日本人对于实际升值20%的精神准备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日本人那种壮烈的挖潜在日元升值的浪潮前面全部化作了徒劳。很明显，日本制造业的前途已经不是那种挖潜能够解决得了的，日本人得另外寻找出路以拯救日本的制造业。

在不少人看来，美国人极其无赖，为了削弱竞争对手不择手段，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是这样，美国人也有美国人的道理。

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企业降低成本的努力是一种违反广场协议初衷的背信弃义的行动。本来美国人认为美国产品之所以无法和日本产品竞争，就是因为汇率不合理造成的同等日本产品价格偏廉，美国产品实际上是处于被日本产品不正当竞争的境地。把这些用专门术语堆砌起来的句子翻译一下，实际上就是：日本货卖得太便宜啦，只有日本货提高价格才符合美国人的“公平竞争”的理想。但现在日本货并没有变得贵起来，所以这是日本人在违反协定。广场协议又不是一个简单的规定汇率的协议，而且从美国人所信奉的资本主义的教条出发，本身汇率就不应该是谁去硬性规定的，广场协议是一个以汇率作为手段来解决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均衡问题的协议，而日本人把这个协议读成汇率指南，那是日本人理解能力太差，不能怪美国人。

如果说在广场协议之前，再往前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之前，美国人的这种想法还有一定市场的话。在广场协议之后，这种看法已经被证明了是没有道理的，日本人已经把叫摩根的那个老李所说的不可能变为了现实，美国人是不是也应该试试，看能不能用深挖潜力降低成本的方法来重振美国制造业呢？如果是在二次大战之前，富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可能都不需要日本人做榜样，

自己就能实现进一步降低制造业成本的目标。要知道，美国不仅曾经是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而且美国还是真正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制造业的国家，现在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降低成本的方法都是从美国起源的，那时的美国人绝不会让别人在制造业上超越自己，就像现在的美国人绝不会让别人在军事上超越自己一样。

学过中学物理的人都知道，流体有一个向阻力最小的方向运动的特性，实际上不只是物理学上的流体运动，就是社会的运动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有一个更为省力的方法可以选择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选一个更加费力的方法。像日本人那样深挖企业潜力，发扬“再绞一把干毛巾”的精神降低成本来赢得市场份额是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非常费力非常痛苦。另一种方法就是使竞争对手的价格上升，从而使自己得到对方失去的那些市场份额，而调整汇率就是使对方价格上升的手段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形象是一个富于理想、生机勃勃的年轻国家，很难将“耍无赖”和这个国家联系起来，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将它推上超级大国的位置之后，美国开始变得会耍无赖了。这种耍无赖还不仅表现在国际政治上，从这次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在经济上也开始公开耍无赖了，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最登峰造极的例子就是这次金融危机使得通用汽车公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国企之后，美国甚至由政府出面对丰田公司进行打压。

这场打压可以被称作“闹剧”，昔日的超级大国不仅在经济上已经败落，而且在道德上也完全堕落了。号称是“轮子上的国家”（On the Wheel）的美国的象征——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的经营破产，让美国人彻底丧失了自信，只要看看美国人是如何开展一场全民参加的反丰田大合唱就可以知道了。

奥巴马政府的运输部长 2009年在国会作证时，义愤填膺地谴

责丰田公司，而在通用公司缓了一口气的2011年2月，他又在电视上若无其事地对美国人说，他建议他女儿去买丰田车。所谓“国家利益”是如此强大，能使得一个高官出尔反尔，完全无视自己的人格。

这一切都是始于广场协议。

但当时为什么就没有日本人看到这一点，为什么选择了一条几乎类似于自杀的道路呢？

17.一代不如一代的政治家和官僚

“如果日本人当时不是那样地挖潜降低造价来维持其价格竞争力，而是老老实实地接受日元升值带来的所有结果，向美国人让出10%到20%的市场份额，那么广场协议之后日美的经济关系，以及各国的经济环境会不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呢？”这毕竟只是一种设想，对于这种假设的最简单的反对意见就是美国人会不会得寸进尺，在日本出让了那部分市场份额之后，继续向日本提出更为无理的要求呢？这还真是不少日本人到现在仍然坚持认为当时日本的做法是正确的理由。比如1996年11月29日，原亚洲开发银行总裁藤冈真佐夫对近藤健彦就这样说过：“说是说政策协调，但美国从来没有牺牲过自己的利益。”

从现在日本人的感情出发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但除去表面上的东西之后就能发现，这实际上完全是感情用事的一种说法，从理智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和欧洲日本盟国的关系史，就能知道这不是事实。

实际上，从1922年召开的逼着日本在《九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日本、中国）条约》上签字，迫使日本放弃了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的“华盛顿会议”开始，美国慢慢迈向超级大国，美国在和盟国的关系中总的来说就是付出多

于索取。二次大战中的表现就不用说了，二战之后美国在帮助欧洲和日本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上付出了很多。

在日本和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过来之后，美国和盟国之间经常在经济问题上扯皮，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美国凭借超级大国的武力仗势欺人的感觉，实际上这不是现实。现实是美国是欧美日本这些盟国的领袖，而成天算计盟国的国家是成不了领袖的。不要说美国，就连苏联，在和东欧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关系中也是付出多于索取的。黑社会的老大只要求手下的小弟效忠于他，而不会去盘剥小弟，否则这个老大立即做不成，黑社会老大尚且必须具备如此心胸、要如此行事才能混得下去，更何况盟国的领袖呢？

但当时日本的政治家中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从而使事情最后变得不可收拾。坦率地说，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无论是观察力、想象力还是行动力，日本政治家们可以恭维的地方都不多。

当然可能会有某一个官僚认识到了这点，但是让出市场份额并不是官僚集团的共识，所以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提这件事。再退一步说，即使官僚集团形成了共识，在1986年的形势下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因为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外贸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官僚们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执政的是像岸信介、池田勇人那样出身于革新派官僚的人，或者是当时的日本有一个像战前革新派官僚那样野心勃勃的少壮官僚集团，日本也许有可能采取一些不同的对策。因为在出让10%—20%的国际市场份额之后，再靠拉动国内需求来填补这个空缺，不用说，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下根本不可能，就算是在计划经济之下，也只能去展望一下，没有成功的把握。但如果是岸信介、池田勇人这些革新派官僚出身、喜欢搞国家统制经济的人当政的话，还真有可能去试一试。

既然政府靠不住，陷入坚挺日元的重围而又不受统制的日本企业们就只能分头突围、各找各的辙了。挖潜是有限度的，当毛巾已经被真正绞干了，就再也无法绞出水来。面对着不断上升的日元汇率，当其他的方法都已经用尽时，日本大企业就只能去寻找地租和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地方生产它们的产品了，也就是转移生产基地。

对于企业来说，转移生产基地能够降低产品价格、增加产品的竞争能力，甚至可以扩大市场份额，是一举多得的措施。对于国家来说，作为制造业经济中流砥柱的大企业能够从经营困难的境地解脱出来也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根据现在的国际惯例，进出口产品的产地归属于最后加工地，从被那些日本大企业转移了的生产基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进入各国进出口统计时，自动划入了生产基地所归属的国家。

但是，除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之外，向国外转移生产基地是会带来问题的，主要是这样做会减少国内的工作机会，引起国内失业率上升从而诱发社会不安。所以日本在向外转移生产基地时一直是相当慎重的。

在此之前，生产基地的转移基本上都是用来补偿日本国内产能的不足，而且主要方向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原来是日本殖民地，日本人一来对这两个地方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二来战前日本在这两个地方都建设过不少工业项目，有一定的设施和人员基础，这种条件很对那些力图加大生产能力的日本企业的胃口。总的来说，由于历史渊源、文化以及人种的差异，除了战后的赔偿处理之外，日本对东南亚一带其他地方的直接投资很少。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日本不是在国外寻找能够增强国内企业的那部分产能，而是在转移已经无法在日本国内继续存在的那部分产能了。而且这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不再是首选之地，本来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就无法容纳日本想转移的那部分产能，再加上它们属于NIES（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新兴工业化地区，一般指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国内有一个更为流行的称呼是“亚洲四小龙”），这个地区从60年代开始的经济增长势头很劲，美国对NIES从来就没有掉以轻心过，而是随时准备发动制裁。所以日本这次只能选择其他地区。



18. 东南亚和中国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被排除之后，能够转移的地区就只有中国内地和东盟国家了，在当时的日本，中国内地和东盟这两个地方孰为首选可是一个相当热闹的题目。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是最坚决的引进日资派，当时他在各个场合发言的中心思想都是“请日本投资东盟”，甚至亲自在日本各传媒撰文宣传东盟相对于中国的优势。

1985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大约在2亿美元左右，而到1989年已经增加到超过15亿美元，但那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还不到2亿美元，就是说中国的魅力远远低于东盟四国。这是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当时东盟四国（除去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在这种时候划分到了NIES之中）的投资条件要远远好于中国。越战结束之后，东盟国家远离了战争的威胁，而刚结束了“文革”的中国急于医治长期内乱带来的满身疮痍，停止了对东盟各国共产党的支持。这样东盟不仅没有了外战的骚扰，连内部也变得安定起来。东盟各国的国内政治虽各有不同，但在日本人看来都是同奉一个美国做盟主，在政治上也属于靠得住的国家，所以日本投资东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1995年年底，日本贸易振兴会对进出东盟四国的977家日本制

造业企业进行过问卷调查，发现它们开始转移的时候集中在了1986年之后，占到70%以上。

日本企业向海外直接投资时需要向大藏省报告，从大藏省的统计记录来看，1986年超过了200亿美元，1987年超过300亿美元，而1988年则超过了400亿美元。这三年间的累计超过了900亿美元，而从1951年开始到1985年为止的累计金额只有800亿美元。

但是东盟四国都有自己的问题，印尼和菲律宾当时的政局都不太稳定，而政局相对比较稳定的泰国和马来西亚也缺乏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无法把接纳这些在国内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了的日本产能作为一项国策来执行，日本企业的转移产能在东盟四国都只能以企业间行为来进行，在速度和效率上都存在问题，不能满足日本企业的急切需要。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这次日本企业需要转移的那部分产能的内容也和以往有所不同。以往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产能的目的主要在于盈利，因此所转移的那部分对于企业员工技能的依赖性比较小，都是一些自动化程度较高或者内容简单的作业，零件本身的生产还是在日本本土依靠技术技能水平较高的日本工人进行；而这次转移已经不仅仅是出于盈利，而是针对企业本身能否继续生存的危机。此时日本转移的产能已经开始包括产品零件，甚至一些很重要的产品零件。

这就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而东盟国家在劳动力的质量方面仍然存在问题。

首先，东盟国家的工业基础其实十分薄弱，除了泰国之外，当时的东盟四国都曾经是欧美国家的殖民地，而欧美国家在阻止其殖民地发展工业上做得非常坚决彻底，不要说独立后出现的是非白种人的政权，就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基本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国家，到现在都不能称之为工业国。这样，东盟四国在制造业所需

的基础条件方面相当差。

其次，东盟四国的普及教育水平不高，而劳动力的素质也不能满足日本企业的需要。一位在泰国的日本化工厂任厂长的日本朋友对笔者描述他在泰国工作的辛苦，说化工厂的劳动强度不大，只要认真地监测各个运行参数就行，但在当地雇佣的泰国工人却经常上班时睡觉，造成质量事故。于是只好采取日本员工在工厂里巡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泰国工人采取了反监视措施，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派出望风人员监视日方员工的动向，这种企管部门和员工玩“躲猫猫”游戏的现实，让日本的企业经营部门十分头疼。

这就造成了一个事实：虽然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日本企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生产据点的浪潮中，东盟四国是日本企业一开始的首选地区，也最早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在那些国家建立什么大规模的重要生产中心。日本向东盟国家所转移的一般都是自动化生产程度相对较高的化工生产装置，或者是对劳动力质量要求程度较低的成品组装生产线，进行的是成批量产。而小批量甚至单个生产的那些东西，比如生产模具的金属加工业，并没有去往东盟国家。模具属于生产工具，80年代中期开始的日元升值还只是使日本企业在要出售的产品上感到压力，还没有在生产工具上开始挖潜。而且像以后会看到的那样，当时日本企业也不具备向海外转移金属加工的条件。

到最后，不仅容纳了已经无法继续在日本本土存在了的那些产能，并且反过来开始吸取那些其实在日本本土并不是完全不能生存的日本企业的是中国大陆。

和东盟国家不同，中国大陆当时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时的中国能够生产从汽车飞机一直到电子计算机的一系列产

品，中国甚至还有自己的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只不过和欧美、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产品落后了很多年，所使用的工艺更是相当简陋。从埃德加·斯诺和杨振宁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在他们眼里，中国大陆是在用“原始的手段生产着这一切”，但即便是这样，起码“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东西。

毋庸讳言，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很落后的国家。但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长处，那就是教育普及得非常好，当时中国六年制小学教育已经完全普及，在大多数地方初级中学教育也已经普及，中国很大部分的青年人掌握了从事制造业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初等三角函数的计算。

从1949年开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领导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出身于军队，都有战争经验。而从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武器上一直都逊于自己的作战对手，他们绝不会忘记被敌人炮火压制过的经历。所以他们执掌政权之后，在发展工业化上是不遗余力的，虽然在方法和效率上有不少可以打问号的地方，但是他们确实把工业化推广到了很大的范围。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部分农村人民公社都有了自己的农业机械厂，虽然这些农机厂设备极为简陋，但也正是这些后来发展成为“乡镇企业”的社队企业让几亿农民见识到了机器！

19. 中国要创汇

这就是说，如果日本大企业要往国外转移生产据点，中国大陆的条件实际上优于东盟四国。但是那时候的问题很古怪，并不是日本企业是不是往中国转移生产据点的问题，而是中国愿不愿意接受这些生产据点的问题。

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欧美人把中国看做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家”，但实际上中国既不遥远也不神秘。从历史上看，出口贸易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贸易让世界知道了中国。丝绸之路就是例证，丝绸、茶叶和瓷器一直就是中国的象征。因为从遥远的中国贩运来的瓷器实在过于珍贵，荷兰的王宫里还有一间专门珍藏中国瓷器的房间，里面放满了来自中国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但象征着女王的财富，还象征着当时的航海大国荷兰在海上的威势。

但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是象征性的，象征着中央帝国的富有和文明，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一些奇珍异宝之外，没有什么要依仗于对外贸易的，只有我是不是卖给你这么一说，没有什么时候会为了卖不掉东西而发愁。当然，从事外贸的商人们会发愁，但是商人们或者向商人们提供商品的生产者的痛苦，和皇上以及代表皇上的官

吏们无关。

对外贸易变得很重要还是在近代之后，鸦片战争的起因就与对外贸易有极大的关系。特别是甲午战争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的巨额赔款，使得统治集团历来仰仗的田赋捐税已经无法承担，统治集团不得不把目光放到关税上来。英国人赫德主持总税务司之后在征收关税方面的成功，更使关税成为了最可靠的经济来源。

伴随着在鸦片战争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战争中的失败，中国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耻辱使中国人接受了工业文明，国家工业化是中国的百年梦想。但是工业化所要求的机械、设备、技术和人才培养都需要从外国进口，鸦片战争之后的巨额白银外流，使得中国在支付这些用途时只能寄希望于出口换来的外国通货，这样就出现了“出口创汇”这个词。对外贸易再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了，而是关系到国家能否继续生存的大事。

然而，直到那时为止，“出口”的目的还是停留在“创汇”上，用创造出来的外汇去购买国防所需要的武器、建设所需要的机械设备技术，去培养人才，当然也包括购买一些日用品甚至奢侈品。无论如何，外贸出口仅为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一个辅助部分。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地区开始摒弃这种外贸出口仅为经济辅助部分的传统做法，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出口经济上，积极地进入国际市场。台湾地区并不只是出口一些土特产品，甚至都不限于棉纺织品，而是积极地引进外国资本，开始生产和出口机械和电子类产品，结果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成为国际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也重新开始把经济工作放到了各项工作的首位。但是长期以来的与世隔绝，使得中国对于对外贸易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创汇”上，之所以需要对外贸易这一块，仅

仅是因为需要使用外汇。这种思想在现在还经常会出现，比如和哪个国家发生了外贸摩擦的时候，肯定有人会出来大声疾呼："它不要我们自己用就是了，为什么好好的东西要出口给外国人去用？"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开放了的中国真的睁开眼睛看着这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也看到了国外许多在当时闭锁的中国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东西，也知道了原来在"蒋匪帮"统治下的台湾地区不仅远不是什么人间地狱，而且还已经是一个挺神气活现的亚洲经济优等生了。

看到了差距就要迎头赶上去，这是很容易听到和很容易说的一句话，实际上做起来却比说起来要困难得多。现在看当事人的回忆录，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中国前进一步可真难。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金问题。邓小平的主张是大量利用外资，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利用外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只要听说能引进外资，不管是优惠贷款、非优惠贷款，或者搞合资企业，邓小平都非常支持。

但并不是所有人的思想都和邓小平一样，有些人的思想就还停留在列宁《帝国主义论》对资本输出的论述上，他们以为现在还是那个时代，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那几个特点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利用外资非常谨慎，他们认为利用外国资本不可能解决我国的建设问题，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他们的观点是，利用外资是不可能有便宜占的，因为在利用外国投资的时候，政府优惠贷款很少，大量为设备贷款，而设备贷款表面上优惠，实际上是为了出口产品，所谓的优惠已加到产品里面去了。而且设备贷款只能买投资方的产品，不能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要用自由外汇，自由外汇利息非常高，用不起。搞合资企业就更不用提了，"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怎么还要和资本主

义联合”，这已经是有关国家命运的头号大问题了。

有人回忆改革开放前十年的时候，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尤其是一涉及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就是中国当年的现实，所以当时的中国还不能一下子就打开国门，完全容纳那些要在海外求活的日本企业的产能。

20.同盟开始崩溃

就在中国人不断调整着思想，考虑要不要准备进入国际经济循环的时候，美国和日本也在不断创造着要让中国人进入国际经济俱乐部的条件。要想让中国人进入国际经济俱乐部，就得给中国人找出那么多活儿来才行，美国和日本就为这件事忙开了。

美国人已经知道了“里根经济学”是在扯淡，过日子光靠减税和扩充军备不行，最后还是要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但问题是已经荒废了制造业的美国人这时都不知道何谓“国际竞争力”了，他们对“国际竞争力”的理解，仅仅来自类似李·摩根率领的“商业圆桌会议”之类的院外活动组织平时所灌输给他们的知识，这也没办法，因为这个组织的中心就是大汽车公司、大钢铁公司和大机械公司以及各大工会组织。它们既想恢复美国制造业的往日雄风，又无法像战后初期的日本、西德以及欧洲国家那样，集中全国力量投往制造业，更不要说，各大工会组织已经成了一种既得利益集团，成了比资本集团更为保守、更加反对制造业改革的古怪集团。这些美国产业界院外活动组织从来不检讨美国产业界的过失，最后达到了一个很荒诞的境界，对于它们来说，问题不是美国制造

业缺少竞争力，而是外国的制造业具有竞争力，具有竞争力才是弥天大罪。

有件事能够说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1994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到最后把全世界都弄得六神无主的所谓“辛普森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一位叫辛普森的前美式足球黑人明星被控谋杀了他的妻子，而他的辩护律师则成功地说服了陪审团，最后辛普森被判无罪。

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使用的方法，就是强调辛普森的“黑人”这个种族特征，最后成功地把陪审团的注意力引向了“种族主义”这个在美国最敏感的话题。

“辛普森案件”过去几个月后，日本冲绳发生了美国陆战队士兵轮奸日本少女的恶性犯罪事件，面对日本人的怒火，驻日美军第一次把刑事犯罪者交给了日本司法当局处理，而从美国国内赶到冲绳来的嫌疑犯家属和他们带来的律师在机场发表的声明内容居然是：“因为被捕的四人全是黑人，所以这是一起种族歧视的捏造”。

这就是傲慢的美国人。他们只会这样思维，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就只有美国，如果在美国发现了某个问题，那么全世界就都有这个问题而且也只有这一个问题。所以美国人在接受了李·摩根的意见之后，就认为李·摩根代表真理，而且也只有李·摩根才代表真理。

实际上，围绕着“广场协议”的明争暗斗，并不是从现在才刚刚开始。

前面说过，日本银行在1985年10月提高了短期利率，据说其目的是为了抑制美元汇率的回弹，巩固迄今为止的战果。这次行动的时间也不长，只有3个月，但实际上那是广场协议之后出现的第一个不协调音符。

在欧美国家看来，日本始终是一个异类。这种“日本异质论”

在一些时候是出于人种歧视，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则是出于文化上的差异。欧美文化讲究契约精神，广场协议是一个契约，大家说好了要在有关的宏观经济政策上相互合作，在欧美人看来，日本人现在就违反了这个契约，他们自作主张地提高了短期利率，而至于日本人是否出于好心则没有人去关心。契约精神的本质在于程序，如果不能按契约的本来规定走程序，那就是错误的。如果真的需要更改程序，为什么不和大家商量一下？

还有一点使得美国人特别愤怒：虽然这个行动冠以了“维持广场协议胜利果实”的名义，但实际上思维方式是和广场协议背道而驰的。广场协议商定的是日本和西德想办法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以图增加对进口的需求，而日本银行提高短期利率的做法是在阻止日本的经济增长。

有这种想法的不仅是美国，欧洲的英、法、西德也在这样想。因为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前科。事实上，美元汇率最高的时候是1985年2月，贝克才刚上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时候，美元创下了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的最高纪录，1美元兑换到263.65日元、3.477西德马克，欧洲盟国全体出动抛售美元，连号称绝不干预市场的美国人都干了起来，可是日本人笑眯眯地隔岸观火，稳坐钓鱼台，说是日元汇率稳定，没有必要进行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讲究市场第一嘛。

实际上，这次确实是日本银行的失误，按照现在公布出来的资料，当时日本资金市场上债券过热，日银为了消除这种过热现象，假借广场协议调整日元对美元汇率为幌子，在没有充分权衡得失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就出台了这么个政策，心想一举两得，既能抑制国内资金市场上的债券热，又能帮助日币升值，谁知道日本人的那点小算盘别人心里都清楚。

这笔账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起码他们得出了一

个“日本人在通货问题上极为自私”的结论，所以大家对于这次日本人擅自提高短期利率的做法都没有往好的方面想，而都认为是日本人为了防止自己经济过热，不惜违反广场协议。这个结论在日后给日本招来了数不清的麻烦。

反正日本的运气不好，坏事都挤到了一起。广场协议之后，在巴黎召开了OECD财长会议，日本大藏省的大场智满财务官受托在会议上向G5以外的国家说明一下广场协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本来想说广场协议的目的是要从“强大的美元，强大的美国（strong dollar, strong America）”转换到“软弱的美元，强大的美国（weak dollar, strong America）”，可是话到嘴边不知道怎么成了“软弱的美元，软弱的美国（weak dollar, weak America）”，一刹那会场有两三秒钟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场这才意识到了口误，连忙订正。

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的日本当然不会有意说“软弱的美国”，可是听者有意啊。

21. 蜜月结束得很快

人人都知道"唐宁街10号"是英国首相官邸所在地，提起"唐宁街10号"也就是在说英国政府。可是"唐宁街11号"又是在说谁呢？那说的是英国财政部。签订广场协议四个月之后的1986年1月，广场酒店的G5在唐宁街11号又重新开了一次G5。

和上次大张旗鼓的宣传不同，这次的G5调门非常低。5个国家的财长和央行总裁在18日和19日开了两天会议之后，发表了只有短短三行字的一个声明："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与会者就有关去年11月纽约会议之后的局势交换了意见，对迄今为止的进展表示满意，并表示要继续努力维护这个进展"。

上次在公众面前第一次公开的G5财长会议可算是给了世界一次巨大的震撼：原来说是自由世界，但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分为三六九等的，还存在这么一个高人一等的秘密组合，这个秘密组合还真在为西方世界筹划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似乎真的在从事一项非常非常伟大的事业。

这里面还有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G5在广场酒店签协议的时候，西德还以西欧老大自居，为EMS

的其他国家，尤其是通货软弱的意大利在反复盘算，结果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由西德向EMS内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意大利）提供美元借款，而这些国家利用西德的借款在国际通货市场上购入本国通货，以期在欧洲通货系统内不出现大的混乱。

另一方面，美国人不知怎么回事，成天没事找事地怀疑西德人在策划什么反美阴谋，这次也不例外。美国人一开始先是反对西德人的方案，认为这可能是西德人策划的又一个反美阴谋，到最后，西德人花了不少口舌，才终于让美国人弄明白了所谓"欧洲货币系统"是怎么回事，以及西德为什么要考虑那个系统，美国才算是理解了西德人。

可不管是西德人，还是法国人、英国人，都忘了向意大利人通报这件事，而意大利人也可能在理解力方面有点缺陷，人人都看懂了广场协议的目的是要压低美元的汇率，而意大利人愣是把广场协议之后的美元走跌狂潮看成了是有人在搞不和谐，有意炒作，想往自由世界的老大脸上抹黑。一下子出于自由义愤，只管顾全大局，也不去管自己的经济是不是精壮，在没有征求EMS同盟国意见的情况下，冒冒失失地就开始了"保卫美元"的行动。

虽然不久就从EMS同盟国那儿得到了消息，但意大利已经损失了不少来之不易的美元，没人知道到底损失了多少，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美元下跌的底线，据意大利政府说不少于几十亿美元，意大利没有什么像样的出口产业，法拉利汽车仅仅是名声好听，出口不了几辆，挣不了什么钱，意大利的外汇基本上都是用一针一针缝起来的时装和皮包换来的，确实来之不易。如果给选民知道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那届政府就得辞职下台了。

当然，也可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损失，这些话也可能都是后来意大利人编出来讹人的。但谁也无法证明，只能让意大利人说他们愿意说的话。

意大利人不仅立即向华盛顿、波恩、巴黎、伦敦和东京发出正式的外交抗议照会，而且意大利总理直接给美国总统里根挂了电话，表示意大利根本就不能接受什么能够决定其他国家命运的秘密国家间谈判，如果意大利被美国划入什么"第二流盟国"，不能及时得到同盟国的重要动态的话，意大利政府将请求美国政府关闭在意大利的所有军事基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部门也都不得在意大利活动，如果美国不能给意大利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意大利总理将向议会通报意大利中央银行由于同盟国的背信弃义而蒙受的巨大损失，请求议会授权容许政府对美国和其他同盟国进行报复。

里根看着电话听筒，听着那些火冒三丈的滴里嘟噜的意大利语，啼笑皆非。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最多也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低级错误，某个无能的官吏把照会意大利的可能性寄托在了别的国家身上罢了，而意大利人拿此事大做文章，说明意大利人虽然理解力可能有问题，但判断力绝对不逊于任何人。什么"不少于几十亿美元的损失"，见鬼去吧！整个广场协议的经费才只花了180亿美元呢，但这道理无处可讲，里根只好在好言安慰了意大利人一番后，答应这个不定期的非公开的G5将被一个定期的公开的盟国财长及央行总裁会议所取代，虽然里根无法预料参加那个会议究竟叫G什么，反正肯定有意大利一份，这才把意大利总理的暴怒平息下来。

这也就是G5后来又增加了意大利和加拿大从而成为了G7的由来。

但这次全世界对这个联合声明都非常愤怒：这简直是在拿全世界开涮。要知道，这两天是周末，而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的相关人员都没有休息，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在等待，看这次的G5会议会不会又出现什么新精神和新动向。结果就等来了这三行货真价实的废话。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广场协议的目的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这次

会议应该是进一步讨论盟国间经济政策层次上的合作，比如银行利率之类的问题才对，而整整开了两天的会议居然就只有这三行废话，难道英国人提供的苏格兰威士忌味道真的那么好，这些通货黑手党们全喝到桌子底下去躺了整整两天？

当然不可能，然而那个联合声明是怎么回事？

确实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唐宁街11号的G5是在讨论各国央行的利率问题，但也就是这个问题，让广场协议时美国和盟国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和合作从这次会议之后就宣告完结，从此开始了一个大家在经济政策上互不信任的时代。



22. 德国联邦银行的独立性从何而来?

不能说詹姆斯·贝克去参加唐宁街11号G5之前的心情有什么不好的，广场酒店G5的目标基本上达成了，说明只要是盟国，就算是在通货这个关系到主权的问题上也能商量，接下来贝克还有点趁热打铁的意思，大家就接着广场协议里面的几句话，在银行利率或者扩大各国内需方面再继续整点干货出来。

当然也不能说贝克的心情很好，这种心情还恰恰被广场酒店G5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点折射得更为突出。因为贝克希望在美国经济指标数字中反映出来的那部分并没有看到，西德人和日本人告诉贝克，这是“J曲线效果”在作怪，真正要反映出汇率变化的效果一般要等到15个月之后。

什么？15个月？贝克可没有这么多时间，1986年的中间选举就在眼前了，那可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而且贝克知道日本人在偷偷摸摸地搞鬼，想用企业的努力来消解日元升值的压力，从而维持对美的出口出超。贝克也真的急了，他才不管什么“J曲线效应”呢，如果真要15个月的话，那就通过加大非美元通货的升值来减少所需的时间，反正美国人，不，准确地说是共和党，现在等着要的就是立即见效。

这4个月里的美元下调幅度已经几乎超过20%了，日本国内当然早就哭闹成了一团，就连西德都快受不了了。

一般人们对西德的印象和日本差不多，也是一个以出口业为主的经济大国，只是在规模上比日本略微小点罢了。这种看法实际上不完全对，出口经济在西德的经济比重中占很大规模，这是事实，但与对美直接贸易的比例要占到全部对外贸易总额37%的日本不同，西德的对美直接贸易只占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10%，也就是说，西德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比日本对美国要轻得多。西德的最大的贸易对手是EC（European Community，欧洲共同体，现在欧盟的前身），而在欧盟各国中，西德最大的贸易对手又是法国，所以西德人实际上对美元怎么变动是很迟钝的。当然，过分强劲的美元也会给西德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西德在一开始对美国提出一起搞广场协议之事既不热心，也不反对。

除了这次的广场协议是日本人主动提出来要日元升值之外，战后的日本人是把日元升值看成绝对坏，日本一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毁坏之后才不得不接受浮动汇率，接受日元对美元的升值。而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的1961年和1969年，西德就两次主动提高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了。

西德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西德联邦银行的存在，作为西德中央银行的联邦银行，拥有别的任何国家中央银行都没有的独立性，即使在西方国家中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一般来说，为了维持货币系统的稳定，各国的中央银行或多或少都保持着一些对财政部的独立性。即使是被讥笑为“财政部的货币办公室”的法国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也并不是法国财政部可以随便对其发号施令的机关。美国财政部对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就更是到了“甚为忌惮”的地步。

西德人在二十几年内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国土两次彻底焦土化，那时还有一半的国土作为“红色普鲁士”被践踏在俄国人的军靴之下。德国人对战争确实已经是极度地厌恶了，他们希望和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也是这样，因此这两个国家都很强调在反思的基础上采取措施来防止再次参加战争，反思到最后所采取的对策也不太一样。

日本人是采用被动地接受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和平宪法的方法来防止再次卷入战争，干脆放弃了交战权和军队，既然战争不好，那么我们就不再进行战争。

西德人走得更远一些，他们问了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德国人为什么会选择战争？当然，这个问题有无数个答案，但西德人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个答案：是一次大战之后的超级通货膨胀使得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无论如何，德意志民族还是属于有理性的民族，德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那么多哲学家就是证明。如果没有那种恐怖的通货膨胀，德意志人应该不会发生那样的全民疯狂。

所以，1957年制定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对联邦银行的法律位置的定义是：“一个联邦机构”，而不是“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它当然应该支持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但是所有的政策都是自主立案和实施，没有接受联邦政府的领导和指示的义务。

西德在战后是从一片焦土上重新出发的，同样，西德马克在战后也是从纯粹意义上的“纸币”（paper money）开始出发的，没有任何黄金和外汇为其提供担保。马克的价值全靠联邦银行对通货供应量（money supply）的调控来保证，所以，任何对联邦银行独立性的干涉都可能危及西德通货的价值，通货膨胀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德意志联邦银行是西德的中央银行，不如说它是防止通货膨胀的守护神。这种“通货膨胀的守护

神”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一种美学。

人也好，民族也好，肯定会犯错误。一般都说更重要的其实是反思错误，找出能够不再重犯同样错误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在反思错误之前首先要承认和认识错误，如果连错误都不能承认和认识的话，如何可能去反思呢！

没有人可以判断西德人或是日本人对二次大战教训的反思到底是否正确，但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地采取措施，他们起码是认识到了战争是错误的这一点之后，才有了对战争的反思，这比有些国家连对最近几十年中所发生事的是非曲折也一直持模棱两可的含糊态度要认真多了。

因为西德有这样的独特性，所以与其说西德是“西方国家”，不如说西德是“西欧国家”，西德对自己属于欧洲的定位是十分明确的，这也就是美国在很多时候把西德划到“反美”阵营的原因。

23. 银行利率到底惹了谁?

各国主管制定银行利率的都是中央银行而不是财政部，西德的中央银行—— 德意志联邦银行，又是一个天王老子也管不着的邪头，这就叫贝克头疼了。

当时各国的通货膨胀率都极低，石油的价格又在一个极低的价位上，按理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应该降低银行利率来刺激景气，但因为有了一个广场协议，这个“按理”的“理”就有点悬乎了。

广场会议的实质是各国联合起来干预外汇市场的汇率，可是银行利率的改变也会影响汇率，这就使改变银行利率带上了一个微妙的含义，有日本人的先例，谁都不愿意去领头趟地雷阵。所以在唐宁街G5的时候，大家谁都想要调低银行利息，却是指望美国率先调低银行利率之后，大家再照样行事。

特别是日本，由于日元高涨所带来的不景气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所以经济界有强烈的减低银行利率、缓和通货发行量的呼声。但是，因为美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怀疑，日本人是否在考虑控制向美国的资金流出，弄得日本人非常神经质，所以这次日本绝对不会率先降低利率。

日本人的这个决心是很古怪的。因为当时和广场协议之初相比，日元已经升值了20%，国内对有关日元升值的批判意见已经喷薄而出，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思路并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在通产省忙于帮助企业挖掘潜力、降低成本以抵抗日元升值的时候，同一个政府的大藏省和日银此时的思路却还在坚持简单的“日元应该升值”。对于银行利率的操作也只看到银行利率变化对于汇率的影响，而没有想到实际上已经应该考虑银行利率变化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了。更直率的说法就是：日元汇率的上调已经到了应该休止一段时间的阶段了，休止下来认真想一下“日元升值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对日本可能更有好处一些。但是大藏省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大藏省掌握着通货外交的主动权，这样就开始了日本在通货外交中的被动境地，以至于可以说影响到了以后日本经济的走向。

那么美国人会不会降低利率呢？FRB主席沃克想知道其他国家的打算，但他并没有率先降低利率的打算，当然，如果日本和西德先降低了利率的话，美国会立即考虑跟进的。

和所有的央行总裁一样，沃克的任务首先是防止通货膨胀，然后才是关注景气。在沃克看来，本国货币对外价值的急剧和过度下跌是最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的因素，所以美国决不能率先降低利率。既然日本和西德不会先降利率，那自己待在唐宁街11号就纯属浪费时间，因此第二天沃克干脆回了华盛顿。

对于要在这里讨论什么利率，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佩尔本身就觉得是扯淡，利率是央行的禁脔，为什么要在这种国际会议上讨论，还有财长在场？他后来透露，为了不让会议真的开始讨论利率的问题，他主动向沃克透露了西德不会主动降低利率的打算，以打发走不愿在这种场合讨论利率问题的沃克，佩尔知道，只要美国的

沃克不在了，就什么都讨论不成了。

这就是到最后联合声明只有短短三行废话的原因。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就有趣了。1月30日，距离唐宁街G5会议结束仅仅10天之后，被高涨的日元逼得实在没有办法的日本率先宣布将银行利率从5%降到4.5%。

这一下就像雪崩似的引发了一轮降息大战。

3月份，美国、西德和日本降息，法国跟进。

4月份，美国和日本再次降息，此时日本的银行利率已经降到了战后最低的3.5%。

7月和8月，FRB又进行了两次降息。

这样，日本在10月份又开始了一次新的降息。

这轮降息大战的最后一枪是西德人打的，他们在1987年1月给这轮降息画上了终止符。

实际上，在唐宁街G5的时候所考虑的降息还是大半出于扩大景气，但到降息真正开始的时候已经成了挽救景气的措施了，降息成了一个控制汇率的手段而被再三使用。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到此已经结束了，或者说已经走向了反面。G5已经分崩离析，大家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再也没有了共同目标。

分崩离析的责任在美国。作为G5的发起人和领袖，实际上美国从一开始就没有认真对待广场协议。

美国负责广场协议的是以詹姆斯·贝克为首的财政部，或者说是詹姆斯·贝克更加合适一些。日本人的初衷是帮助美国扭转里根经济学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但是贝克实际上把广场协议改造成了一个帮助共和党掩盖里根经济学过失的工具，在“压制议会的保护主义风潮”这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后面，实际上全部是贝克如何应对1986年美国中间选举的算计。

在广场协议的文稿中就没有为美国安排什么具体的目标，反而详细地规定了其他盟国为了美国的利益所必须做的哪些努力，这样就给了美国最大的方便。

在广场协议开始之后，就是扣去“J曲线效应”，实际上也已经证明了在华盛顿国会山上游说的那些院外活动团体基本上就是胡扯，因为从一开始，那些院外活动团体就没有想象过日本人会开始一轮如此壮烈的挖潜运动。15个月对于贝克来说可能是太长了一些，但是贝克的心底又何曾相信过美国的制造业真能和日本或者西德的同行竞争呢？

不管相信不相信，贝克是美国财政部长，而且还是G5或者G7的领袖，只要他还在任，这篇文章就还得做下去，而贝克准备如何来做这篇文章呢？

贝克已经熬过了1986年的中间选举，赤字问题暂时不是他所主要关注的问题了，如何使乔治·布什赢得共和党提名，如何赢得1988年的总统选举才是他真正关注的对象。

至于广场协议剩下来的烂摊子，他只要借助惯性，继续打那张汇率牌，有天大的事情，自有喜欢多操心的日本人去处理。

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是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日元升值过程。



24. 请大臣别来帮倒忙

竹下登的“登”字在日语中可以当不及物动词用，有“升”的意思。

在广场大酒店的 G5 时，竹下登不无得意地对詹姆斯·贝克说：“六年前我在大平正芳内阁里也当过大藏大臣，上任的时候日元对美元的比率是242，卸任的时候这个比率是219，所以我在日本是被称为‘升值大臣’的。”

但是这次的日元升值似乎“升”得有点出格了，事态的发展出乎竹下登的意料。

竹下登是自民党大佬，是最大的派阀领袖，手下人马众多。但人马众多也有人马众多的烦恼，成天要为如何保持这个“人马众多”而奔忙。所谓保持“人马众多”就是要保证现有的派阀议员不落选，当然，能再在什么地方弄出几个议席，形成“人马更多”的形势就更好了，所以竹下登成天也就是忙着筹集政治资金和到处去为手下人的竞选活动呐喊助威，大藏大臣什么的实际上是副业。

可是这天，岐阜第二选举区的自民党众议员渡边荣一托人捎来口信，说知道竹下藏相公务繁忙，这次选举就没有必要亲自来助选了。

竹下登乐了，这渡边荣一是他派阀的人，算是手下。这手下很体谅自己啊，但是话说回来，派阀头子就是这个命啊，不去助选怎么行呢。这么想着他就拿起了电话："渡边君，难得你还能为我老头着想，谢谢你啊。不过去还是要去的，这是派阀领袖应该做的，也就是说我就是这个命吧。"说着笑眯眯地就要收线。

但此时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声音却使竹下登愣住了："大臣，这是真话，您真不要到岐阜来。现在形势还行，您要是来了，说不定会有什么反复。"

竹下登不懂了："什么意思啊？我去了反而有麻烦？"

那边的渡边荣一很小心地选择着用词解释道："主要因为您是现职的藏相，现在在野党和党内的其他派阀在恶意攻击您，说是您策划了日元高升，岐阜经济形势恶化的原因就在您，所以这次选举您还是不到岐阜来的好。"

竹下登也有点哭笑不得："胡说，现在还没到能用日元高涨来打选举战的时候吧？日元涨了出口行业有困难，但进口行业的日子好过多了啊，再说，出口行业的原料费用也降低了，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去讲清楚这个道理，不能让在野党这么妖言惑众啊。"

渡边哭笑不得："大臣，基本上是这么个道理，但这个道理在我们这里讲不通，我们岐阜没什么大的现代出口产业，我们出口的只是餐具等瓷器，那原料就是土，不用花钱去海外买。"

这下把竹下噎了个哑口无言——合着老爷去了还是帮倒忙？

日元在升值。随着日元的升值，对竹下登的评论也从"广场协议的策定人"、"有魄力的政治家"慢慢转到了"葬送日本制造业的罪人"。

当时，中曾根的谋士、竹下登还有大藏省的那些精英官僚们之所以敢于选择日元升值，也是有理由的。中曾根康弘曾经是帝国海军少佐短期现役士官，有经常使用海军术语的习惯，在日元对美元

的汇率为240的时候，他想定的“第一吃水线”是222日元，“第二吃水线”是202日元，也就是上浮10%到20%左右，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有个“2”作为个位数，则没人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已经成长起来了的日本产业界实际上能够忍受这些数值。

据当时通产省的内部估计，日本制造业根据行业不同，能够接受的汇率极限也各不相同。在当时情况下，纤维和钢铁的极限是180左右，造船大概是175，低于170的话，电子产业就真的受不了了，而忍耐力最强的汽车行业实际上到了160还能干。

也就是说，在金本位崩溃十几年以后，日本制造业对于日元升值的忍受力实际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传媒的口径还是一如既往地只要日元一升值就大哭大闹，但实际上日本企业本身对日元升值已经不那么充满恐惧了。

不但不恐惧，而且随着金本位废除之后日元的不断升值，以及日本企业在海外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日本企业已经体会到了强劲的日元所带给它们的强劲购买力的优越性，特别是在原材料采购以及在海外设置生产基地时，随着美国人向日本所要求的“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扩大，不少日本企业也已经开始跳出制造业的框框，开始试探各种投资领域，里面也有不少小成者。所以在广场协议刚开始的时候，不但日本国内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实际上不少企业很有点心情激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主张推进广场协议计划的那些人基本上是掌握了这些数据和日本企业的这些发展新趋势，正因为有这些个正面材料做底，所以才敢在战后第一次主动提出日元升值。

历史的经验无数次地告诉人们：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并没有什么聪明不聪明的区别，只有谁的运气更好的区别，更不要说，在广场协议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谁是胜利者之说，它们实

际上都失败了，所以也不存在聪明不聪明、谁玩谁这种阴谋论的话题，有的只是日本人运气到底坏在哪里的话题。

日本人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想象力，把历史、现实和将来混同了起来。

无论日本人在一开始是怎样预估了日元升值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机遇和危机，他们还是预估错了。人们能通过统计知道过去和现在，但永远无法预料将来，无论日本人在预估时对可能出现的日元升值幅度做了怎样的估计，甚至还在这个预估之上再加上安全系数做保险，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最后日元的升值幅度到了不可收拾、完全失控的地步。

失控到了什么地步呢？

25. 高涨的日元

一位日本外汇代理商回忆当时的情景：

1986年1月24日，对于那些代理商们，这天和其他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大家也是照常看着放在面前的显示器上的各种汇率和新闻信息，紧张地填写着各种买进卖出的传票。

15:30左右，东京外汇市场马上就要收盘了，这位日本代理商看到，另一位他所认识的新加坡代理商在新加坡市场上放出了一大笔美元，数目确实不小，但日本代理商想到这段时间国际外汇市场很平静的现实，就把这笔美元吃了下来。

就在这时候，显示屏下方的路透社新闻栏滑过一行短短的文字："竹下藏相明言可以接受190左右的日元汇率"。

一瞬间，外汇市场消失了。

每天流通量达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市场居然会消失？会！就在这行字滑过屏幕的瞬间，所有的代理商都停止了买卖操作，所有未完成的操作都被取消了，屏幕上的价格提示全部消失，剩下漆黑一片，这就叫"市场消失"。

这种"市场消失"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几秒钟之后，市场又恢

复了，但恢复之后的外汇市场是一个一边倒的疯狂抛售美元的市场。

这位日本代理商把烟灰缸砸向了屏幕。

砸归砸，却也无济于事，只这一票买卖，日本代理商赔上了35万美元。

各国财政部或央行的高级官僚为什么被称为“通货黑手党”？就是因为他们经常通过这种所谓“口头介入”，或者叫“talk down”来影响市场。运气稍微差点的代理商碰上就要掉一层皮。

但这次的口头介入倒不是竹下登有意干的，而是无意中出来的一件事。

竹下登在伦敦唐宁街G5结束之后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去了美国，因为纽约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给了竹下登一个名誉法学博士的荣誉学位。竹下登很开心地出席了学位授予仪式，还去白宫和里根总统进行了10分钟的会谈，虽然10分钟除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之外说不了什么话，但怎么说也是和美国总统单独见面啊。

心情很好的竹下登这时对要求进行采访的所有传媒来者不拒，这句话就是他在肯尼迪机场等飞机回国，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驻纽约记者冈部直明的采访时说出来的。

对于冈部有关汇率的提问，竹下登很轻松地回答道：“那1美元兑换199日元又怎么样？兑换190日元是不是有问题呢？有问题没问题各个行业都不一样，能够接受的环境也不是完全没有。”

竹下登后来自己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说199日元和200日元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可之后却被炒作成了“200以下也无所谓”。

竹下登说的是实话，了解日语语法中那种主语经常会被省略的人应该知道，竹下登原话中“能够接受”的主语是“各个行业”而不是“日本政府”。

实际上，《日本经济新闻》在23日发表这段采访时也没有很偏

离竹下登的原话，只是强调了"190日元"这个单位，发表的位置也是在晚报的第二版，不太引人注目，不注意根本看不到。但这条消息在第二天（24日）被路透社以标题的形式转载，被剪得更短，更加强调了"能够接受"，而且还和日语一样省略了主语。但这次主语省略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能够接受"的是日本政府。

于是就出现了这一场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汇率地震。

竹下登的反省是："痛感作为通货政策负责人的发言的分量，应该统一到'只有上帝知道'那句话上去，今后不管问我什么问题，只要是有关通货，就回答他'只有上帝知道'。"

但是竹下本人在回国以后的公开记者招待会上还在说："就是市场真的进入了190日元，也不应该用人为的想法扭转过来"。竹下登没有注意到自己发言的分量可能是事实，但是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竹下登在那时还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像大坝溃决一样的日元升值，当时他讲话的真实思想实际上是害怕下跌了的美元还会卷土重来。

1987年1月31日，日元升到了192。

2月10日，日元突破190，10天之后突破180。3月17日，日元到174，这是战后最高值。3月19日，日本银行在广场协议之后第一次进行了抛售日元的市场干预。

距广场协议还只有半年，日本政府的立场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光靠日本一家是无法干预市场的，日本人想拉美国人一起干。日本人也知道，刚刚从日元升值中看到一线希望的美国人肯定不会同意共同干预，于是他们想了一个转弯的方法。干预的地点不是从东京而是从纽约开始，日本银行委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纽约市场上抛售日元，以此给人们一种"美国人和日本在一起阻止日元升值"的印象。

单独说这个行动还是成功的，外汇市场当然不会天真到真以为是美日在联合干预市场，但也注意到了美国起码是默认了日本的干预，所以日元回跌到了180。

但这只是一时的反应，日元的升值已经几乎是无法阻挡的趋势了。3月19日还默认了日本干预市场的美国从此要亲自上阵了。4月11日最轰动的消息是，和贝克会谈之后的英国财务大臣罗森对记者说："日本之外的国家都希望日元继续升值，贝克财长也是这个意思。"

10天之后，里根总统亲自出马发表谈话："美元汇率应该进一步降低。"

这一句话让日元进入了170。

半年前为了让日元升值，日本政府要人们在各种场合下发表各种讲话来诱导市场；半年之后，却是美国政府要人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在各种场合下发表讲话了。

1986年4月，G5在华盛顿开会，竹下登愁眉苦脸地对贝克说："我的名字叫'登'，也就是'升'的意思，但我的人气却在'降'。"

贝克笑了笑："那你想办法搞好构造改革，人气还是会升的。"

但是，日本藏相换人了。

26. 宫泽喜一接了任

在日本的媒体上，“日元升值”就是洪水猛兽，十分可怕，但是日元升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没人能够说得清楚。据说日元升值会打击日本经济，而经济如果出问题会影响执政党的地位，但这些和现实似乎都套不上去。

1986年7月6日，日本进行了参众两院的同时选举，中曾根康弘领导的自民党取得了创历史纪录的胜利，自民党得到了众议院的300席议席和参议院140席的议席。就是说，日本选民对已经执政将近四年的中曾根政权表示了很大的支持，是不是也反映出起码日元升值还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呢？因为选民们好像并没有觉得遭受了什么很大的痛苦，要不然中曾根弄不来那么多票。

实际上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这次选举和日元汇率之间的关系太紧密了。1986年5月东京峰会之后，又掀起了一阵新的日元升值浪潮，5月12日，日元甚至上涨到了150，中曾根内阁已经无法维持了。

但中曾根想赢得选举，他曾经对大藏省提出要求，在选举之前一定要把日元稳定在170的水平上。为了达到中曾根的目标，大藏省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首先，在这几个月之内，日本人进行了规

模相当大的市场干预，到底花了多少钱直到现在也是个绝密数字，人们只能从同期日本银行外汇储备的变化来推知其规模。从1986年3月到7月这4个月中，日本银行的外汇储备增加了62.3亿美元，基本上可以认为，这就是日本对市场进行干预行动的规模。

再一个就是，日本银行已经把利率降到了创纪录的3.5%了。

可是这些动作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最后还是美国人进行的“救出中曾根”政治行动才使得中曾根内阁继续存在了下来。

日本政界中有一种“亲美内阁不一定长命，但反美内阁肯定短命”的说法，实际上亲美内阁基本上都是长命内阁，比如这几十年中最长命的内阁就是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这两个最亲美的内阁，因为美国人也乐意看到日本存在一个亲美的内阁，所以在关键时候会出来帮一下忙，这次在中曾根的选举上就是这样。

日元上涨到150的第二天，即5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就发表了“美元调整已经基本完成”的言论。20日，贝克在国会作证时再次重申了上述结论。

日元随着贝克的这两次讲话回到了170。

贝克的这两次讲话当然是为了回应日本人的要求而发表的，东京峰会时中曾根就直接向里根表示，日元升值的幅度已经超过了日本产业能够接受的水平，美国人无论如何要有所表示，否则连内阁的基础都会出现问题。

大藏省方面也向美国发出了呼吁，当然，美国人也并不想日元升值的步伐过于激烈，最主要的是，如果过度的日元升值影响了日本政局，那么反过来是有损于美国利益的，所以美国在东京峰会期间虽然没有就汇率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但在会议结束之后立即表态，这就是那个后来被人们称为“拯救中曾根”的政治行动。

“拯救中曾根”行动的成功又可以作为日本政治安定的一个

证明，也就又成为了日元人气的理由，于是，在市场上又掀起了一轮抢购日元的浪潮。更重要的是，11月的美国中间选举就在眼前，现在轮到日本人还账了。

7月22日，中曾根康弘组成了第三次中曾根内阁，最引人注目的是宫泽喜一出任大藏大臣、竹下登出任自民党干事长。

宫泽喜一原本就是大藏省的官僚出身。大藏省官僚一直被人称为“官僚中的官僚，精英中的精英”，而宫泽喜一在所有的国会议员中又几乎是精英味道最浓的一位了。可是大藏省的那些官僚们听说他要来当大臣时，没有一个人觉得高兴，反而是人心惶惶。

因为宫泽喜一是主张所谓“积极财政”的人。他是原来那位提出“国民收入翻番”的池田勇人首相的亲信，所谓“积极财政”的意思就是依靠公共投资来拉动经济，使得国民收入和税收增加，实现经济增长。

当年的池田勇人依靠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实现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宫泽喜一就认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年搞经济高速增长要靠它，现在对付日元升值也要靠它。实际上中曾根也有点信这套东西。美国人在广场协议时对单纯的市场干预就不太热心，美国人最起劲的是日本和西德是否能够依靠经济政策的变化来拉动内需而不是单纯地依靠出口市场，所以中曾根任命宫泽喜一为大藏大臣是很和美国人胃口的。对于美国人来说，只要不断地使用汇率作为武器，就能督促宫泽喜一尽快地实现从出口到内需的转变。

但宫泽喜一是日本的大藏大臣，面对日元持续高涨的形势没有什么可开心的，他上任后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日元应该稳定在160到170之间的水平上”，并且撤销了不少对日本的保险公司等投资商的限制，容许它们拥有更多的外国债券。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在

日本国内也诱发对美元的需求，从而使美元起码不继续往下走。

但这些措施都只能应付一时，保险公司无法持续提供规模巨大的美元需求，日元还是不断地继续升值。正当宫泽喜一焦头烂额的时候，倒有美国人来试探宫泽喜一，问他是不是愿意和贝克来一次面谈。

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贝克的日子也不见得比宫泽喜一好过多少。在贝克看来，西德和日本都是背信弃义之辈，根本就没有执行广场协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拉动内需”的条款。而且，这种话题没必要弄到G5或者G7上去，最好是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分别展开双边谈判的好，首要目标当然是日本。只要日本搞定了，西德势单力薄，也只能乖乖地就范，这才有了1986年9月贝克和宫泽的旧金山会谈。

27. 你们能不能找点内需出来?

这次是贝克想要搞定日本，是贝克要见宫泽喜一，所以就一定得给足宫泽面子。

首先，不能让传媒知道，否则，大家一闹腾没准儿连带着外汇市场也发生连锁反应，所以双方都没对传媒走漏一点风声。第二，就干脆搞美日平等，贝克也不去东京，宫泽也不去华盛顿，大家在东京和华盛顿的中间会面，这才弄出了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旧金山会谈的怪事。

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是真的两个半小时。这个“真的”是什么意思呢？贝克和宫泽喜一谈判不需要翻译，所以这两个半小时货真价实。别看贝克是律师的干活，靠嘴皮子笔杆子吃饭，但宫泽喜一的英语绝不会比贝克差，当然一开口就冒出的日本口音是另外一回事。

在这之前，为了能进行会谈，贝克是给足了宫泽面子，但会谈开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贝克向宫泽喜一提的是要求、要求再要求。

日本曾经想过弄一个“产值税”来敛钱，其实后来也没弄成，但是贝克这次就先拿这个税来开刀了。他说，原来说好了日本要扩大内需的，可是你们的行动在哪儿呢？我们美国要扩大内需的时候

肯定是减税，让大家有钱去花，可日本为什么要开征这个“产值税”，加大收刮力度？这不是明摆着不让大家花钱吗？再者说了，你这个“产值”是什么意思啊？出口是不是不算国内产值，你们从一开始就没动好脑筋，既想抑制国内消费，又想变相补贴出口，是不是这么回事？

宫泽喜一连忙解释，说那个税估计要黄，开征不了，反对的人实在太多。就算是能够开征也不是您老人家所说的那样，那个税率很轻，不会产生什么大的经济影响，再加上当初出口也算“产值”，根本就不存在出口补贴的问题。

其实贝克就怕宫泽喜一和他耍光棍，来一句什么“我就是要出口，不出口你让我怎么过日子啊”的话，贝克就没治了，但宫泽喜一一解释就好办了，说明日本人起码在大面子上还不能放弃广场协议。

贝克就直截了当地摊牌：“日本一定要确保这个财政年度GDP的增长率，一定拿出有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内需的方案出来，别忘了，这是我们之间交易的一部分。”

“交易”（deal）这个字让宫泽喜一愣住了，贝克一见宫泽的表情就知道宫泽可能还不知道：“7月份选举的时候，我们帮助中曾根保证了170的日元汇率，现在日本人应该还这笔债了。”

虽然没有具体参与交易，但宫泽知道贝克不会在这件事上撒谎。宫泽也不是不愿意扩大内需，问题是这还是一个交易，美国人愿意付出点什么？“170是日本的生命线，并不是只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才要170，而是如果没有170，日本就会沉没。扩大内需的事情我们正在做，如果能在秋天弄出一个好的补充预算的话，1986年的GDP增长3%以上还是有把握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外汇市场，一个稳定的外汇市场也是美国资金来源的保障。”

宫泽最后一句话是在暗示美国人：如果美元跌得实在没了边，

断绝了从国外流人美国的资金，美国也是死路一条。

贝克和宫泽会谈之后，美、日、西德三国开始了一系列通货交涉，这些交涉都围绕着一个题目展开：能否以日本、西德扩大内需的政策换取美国在稳定汇率方面的合作，以及具体如何交换。旧金山会谈大家达成了第一个问题的默契，就是说日本同意通过编制补充预算、扩大景气的手法来扩大内需，而美国也同意了在稳定汇率上做出努力。在第二个问题上则没有进展，即日本能够保障多大的增长率，以及美国是不是能够接受170的日元汇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在即，日本人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报答美国人在中曾根选举时所施的恩。

宫泽喜一回国就开始编制补充预算，宫泽喜一本身就倾向于积极财政，再加上中曾根欠了美国的人情债，而且宫泽自己也答应了贝克通过补充预算来拉动内需，这样自首相中曾根以下，全自民党都高唱起了“搞好补充预算”的战歌。

具体说，就是“要搞一个3万亿日元以上的补充预算”，没钱的话就“发行建设国债”。

日本政府的财政年度很奇怪，不像其他国家是从1月1日到12月31日，日本是4月1日到第二年的3月31日，在头年年底所作的国家预算之外，每年秋天都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补充预算，用来应付一些突发事件。补充预算的规模一般只有预算规模的5%左右，按这个规模的话，那年的补充预算就只有2万亿日元左右的规模，而自民党提出了3万亿的数字，这样就发生了一件需要举债来填补空白的事情。

这种做法是当时高举“财政重建”大旗的大藏省所坚决反对的。在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不景气、岁入减收的时候，再发行赤字国债并减税的话，赤字规模越来越大，财政该怎么办？

宫泽也有自己的一套道理来说服大藏省："就是这个时候才要下定决心啊，如果日本经济能够不怕日元升值了，税收不就回来了吗？你们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现在的现实税收在减少，将来的税收也不会增加，从里到外漆黑一团，根本就没有希望。还谈什么财政呢？"

反正就这样反复争吵，最后终于在9月19日通过了一个3.6万亿日元的历史上最大的补充预算方案，宫泽喜一就兴冲冲地拿着这个补充预算去找贝克了：我们日本人拿出了东西，现在该是你们美国人履行诺言的时候了。如果170真的有困难，少点儿也行，只要高于160就能过得去。

但是贝克那脸难看哪。



28. 想蒙我贝克?

现在加上了俄罗斯以后的G8会议是一年一次，这是在大家都知道了这种会议纯属扯淡之后，每年只是会个面聊聊天，谁对这种会议都不抱什么期望了。但那时候不一样，当时大家都以为这种会议能解决问题，所以没事就碰头开会，1986年9月又在华盛顿开G5了，宫泽喜一也就顺便想和贝克解决一下上次的交易问题。

贝克说话很明确：宫泽您努力了，谢谢您，但是交易不能做。理由很简单：日本人食言了，根本没有出动财政来扩大内需，而只是打马虎眼想糊弄人。

贝克没冤枉日本人，大藏省还真是在糊弄人。

从明治维新开始到战后，日本的中央官衙历经变化，特别是战后重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官衙都打乱重组了，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大藏省和外务省。当然，到现在大藏省也没有了，变成了财务省和金融厅，但一般都认为金融厅只不过是财政省的一块殖民地而已，实际上的大藏省变得更大了，这就说明了大藏省有多牛。

大藏省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叫做“只知其局，不知其省”，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大藏省，而只存在大藏省下面的那几

个各管一块的局，那几个局几乎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大藏省下面有影响力的主要是负责收税的主税局、负责预算的主计局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国际金融局，到现在为止，说大藏省的时候实际都是在指国际金融局，也就是那些通货黑手党。通货黑手党们虽然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很出风头，但实际在大藏省内的位置并不高。

日本大藏省很有意思，各局中最威风的甚至都不是管收税的主税局，而是管预算的主计局，这是日本人出于一种极为现实的考虑。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就一直认为自己穷，日本人也没有欧美人那样的纳税意识，所以日本征税成本很高，税是征不上来的，而要搞好这个国家的关键反而在于如何用好征上来了的那点税金，也就是管好预算，把钱用到刀口上比多征点税更加重要，所以权力全在主管编制预算的主计局。就那么点钱，干什么、不干什么全由主计局说了算。一般常说大藏省官僚比其他省厅的官僚大一级，其他省来个课长，大藏省一个课员就打发了，就是其他省的次官来了，大藏省也就是出个局长和你说话。这说的就是主计局，因为主计局主管预算，别的省要干点什么都得有预算才行，老得去求他们。但没有什么要去求主税局、国际金融局之类的，所以大藏省里面其他的局也不那么牛了。

通货黑手党，哪怕是大藏大臣在外面说了什么、答应了人家什么，和主计局有什么关系？主计局的口号就是要量体裁衣，用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到1990年彻底消灭赤字国债，其他的都是胡说八道。当然大臣和执政党在哇啦哇啦吵，也不能不给他们面子，这就来了个3.6万亿的补充预算，实际上你真要去仔细研究其内容，还真得为大藏省主计局的那些人击掌叫好—— 那些人太能糊弄人了。

“补充预算”，没有冠以“国家预算”的名义，这里面就可以

胡说八道了。主计局把不管什么追加的经费全部算到了“景气对策”的名下，甚至把像电力公司、煤气公司那些半官半民的大公司的设备投资都算了进来。

真正扣掉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国家其实只出了5400亿，连一个零头都不到。更牛的是，这笔钱里还有4100亿是救灾费用，那年受了灾，救灾要用钱，而那钱是从灾害贮备金里面出的，和景气对策毫无关系，国家实际上所出的“真水”，用英语来说的“real money”，只有1300亿日元。

在大藏省主计局看来，面子当然是要的，这就是要框出来一个3.6万亿大框框的原因，但是不是一定要那么多钱呢？只要有钱在动，物资就会动起来，这和谁出的钱、从哪个账户拿的钱没什么关系，有这么多钱在动，再加上减点利率，景气就不会继续恶化了，最重要的是，这种预算用不着借赤字国债！

贝克当然不干，因为在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开始有人怀疑起贝克做法的有效性了。这是因为广场协议之后，美国政府放弃了“强大的美元”的政策，企图重振美国制造业，但问题是美元从广场协议之后到底下跌了多少？光看日元和西德马克，美元下跌的幅度确实达到了35%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美国对外贸易的全局，以及加拿大、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些非G5成员而又有大量对美出口国家和地区的加权的话，美元至多也就下跌了6%到8%，这种幅度远远不足以使美国经济有起色。

所以贝克也就要更加积极地对宫泽喜一施加压力了。老太太吃柿子得挑软的捏，既然主计局那一关不是那么简单就能通过的，而且补充预算已经编制好了，无法推翻，那么贝克就要日本银行继续降低银行利率了。

日银在四个月内已经三次下调了利率，现在的利率是战后最低

的3.5%。还有下调的余地吗？日本银行的看法是已经没有了。

当时日本的消费者物价和批发物价很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迹象。但日银更注意的是已经出现了“资产通货膨胀”，也就是泡沫经济的苗头。

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标准地价”，就是政府在每年的9月底公布一次各地的标准地价，然后根据这个标准地价来征收财产税、遗产税、交易税什么的，这个地价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指标。1988年的标准地价很让人吃惊，全国地价的平均上涨幅度是2.7%，而东京的商业用地上涨了40%，住宅地上涨了35%，这在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热潮之后还是头一次。

股价也上涨了40%。

这种情况，还能下调利率吗？

29. G2联合声明

一般来说，银行利率下降之后，银行的贷款利率也随之下降，这样企业能够更加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从而增加设备投资，使企业经济行为变得更为活泼。

但这种说法只是古典经济教科书的说法，这种陈腐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不适应当时的日本。

当时的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已经在金融自由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段日子，不少规则得到了缓和或者干脆就撤销了，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早已不止从银行贷款，或者更准确地说，从银行贷款已经不是企业筹集资金的方法，起码不是主要方法了。

发行新股，或者转换社债（一种公司举债的方式，债主在债务到期时可以在领取本息和将债权转换为股权这两种方式之间选择其一）等等当时被日本企业称作“财务技术”的方法正是大为走红的时候，这样即使银行利率下降，企业也不会从银行加大贷款的数量。

另一方面，银行减息之后，存款利率也随之降低。人们很自然地会去寻找更为有利的投资方向，这样不管是银行还是个人都出现了多余的资金，这些资金的流向，本来就是土地和股市。加上广场协议之

后，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东京已经成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金融市场，东京的外资金融和保险企业不断增加。办公室不足的观测或者预测造成了猛烈的土地投机，日后的泡沫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按理说，日本银行已经没有再降低利率的余地了。所以10月3日，日本银行副总裁三重野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讲明了上述情况之后，明言："现在不应该去动利率，也没有那种考虑。"

但1986年10月31日，日本银行还是决定再次将银行利率下降到3%，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在三重野讲话的前两天，在华盛顿曾经有过一次日本银行总裁澄田智的答记者问，澄田在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既不能否认日本4月份到6月份的增长率过低，也不能否认日本对于景气的要求应该比西德人更加强烈"，这其实已经在暗示日本银行是有可能以"扩大内需"的名义降低银行利率的。

原来，澄田到达华盛顿之后，受到了贝克和FBR沃克主席要求日本银行继续降息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不光来自美国，同行的大藏大臣宫泽喜一也对他说："大藏省已经做好了转换财政政策的准备，你们金融也应该跟上才行。"

大藏省对于所谓"积极财政"的抵抗是世人共知的，那个补充预算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号称坚如磐石的大藏省都不得不改变政策的话，日本银行的抵抗是否有意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日本银行唱了一个两重唱，总裁和副总裁的调门不一样。

实际上，澄田总裁在从美国回来之后还是坚持不降息的。

但为什么又降了呢？这是因为宫泽喜一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所谓"国际协调"，日本那么大的贸易出超问题不解决不行，所以日元要升值，而日元升值之后带来的是经济不景气，

现在必须首先保证日元稳定，如果不进一步降息，后果就是日元继续不断地走高，这样就什么解决方策都无从谈起。

也就是说，为了让日元稳定下来，一定要降息。降息一来能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二来也能稳定日元汇率，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在日银宣布减息的同时，华盛顿发表了《贝克、宫泽喜一联合声明》。虽然这份联合声明只有两张A4纸的篇幅，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份绝不寻常的联合声明。

当时美国财政部有位高官说："这就是第一个G2宣言，说明美国和日本先行一步，其他的欧洲国家应该赶紧跟上，什么？德国人会不高兴？那当然不高兴啰。"似乎这个声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西德人不高兴。

联合声明最后是这样的语句："双方要求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参加促进世界经济成长，改正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并开放各自市场的努力。"这句话是马尔福特亲自书写并插入的，当然就是说给西德人听的。

除了德国人之外也没有人会高兴，所有的欧洲盟国都不会高兴。因为这时正在开华盛顿G5会议，而G5的联合声明的发表是在这个G2联合声明发表的三小时之后！美国似乎已经不需要其他欧洲盟国，美国只要和日本合作就能够管理世界通货、管理世界经济了，《财经时报》11月1日的社论标题是《欧洲的孤立》，里面说"当欧洲，特别是西德拒绝参加政策调整时，其他的两个通货圈，也就是美国和日本，毫无顾忌地抛下了它们而自管自地前进了"。

佛雷尔投资银行合伙人罗哈丁则是这么说的："这个联合声明意味着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关系结束与美国和日本的特殊关系开始。这和交际舞一样，交际舞只有一个伙伴，虽然伙伴能够交换，但每次只能有一个。……美国被环太平洋的那些国家吸引去了，日本、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对了，还有一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大陆，美国和日本的新的特殊关系将是环太平洋关系的中心。而欧洲呢，欧洲除了有一个不肯承担其盟国责任的西德之外，就只有一个无力承担其盟国责任的英国了，法国，谁说过法国是盟国的？”

当然，宫泽喜一本人很低调、很谦虚，他没有加入这个“G2”的大合唱和大炒作，只是心满意足地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句：“从此再没有了日元升值。”因为联合声明里就有这样的字句：“双方表示达成互相理解，即广场协议以来所进行的日元和美元汇率的调整，已经基本上和基本的基础条件相符合”。

世界真美好。

30. “G2”的真相

真的是那样吗？

人们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就自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进入12月之后，随着新年度的接近，市场上又开始了一轮抢购日元的浪潮，所谓G2的联合声明纯属扯淡。

实际上，在G2联合声明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财政部就已经表现出来和宫泽喜一的论调的不一致了。首先，美国人说“所谓日元汇率指的是最近较低的汇率”。其次，美国人表示“这个联合声明并不表示某个特定的汇率是适当的汇率，也没有承诺对于汇率的某种具体行为”。这种“具体行为”当然是指市场干预，可是“我们并没有改变对于干预市场的态度”，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暗示这个声明没有任何意义。

实际上，为了这个联合声明，日本人是做出了很大让步的。在这个声明中，日本人承诺做到：

1. 向国会提出补充预算来刺激国内经济。

2. 为了使投资和企业活动更加具有活力，日本政府将进行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法人税最高税率的税制改革。



3. 降低银行利率。

美国人承诺的三点则是：

1. 削减政府开支。

2. 减税。

3. 抵抗保护主义。

日本人的三点中除了第一点之外，其余都是新做出的承诺，美国人的三点没有新意不说，实际上也有提供检验方法，都是一些无法评价的空头指标。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日本人没有理解美国人的真正想法，而一相情愿地做出了自己的猜测。

首先，美国人也不希望存在日元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呈现线性增长，总需要一个间歇，否则美元如果丧失信用的话，外国资金将停止流入美国，已经是对外纯债务国的美国是不能没有外来资金的输血的。

其次，美国需要一个“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形象来刺激欧洲盟国，主要是西德，以使其也采取银行降息措施。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和日本对于“合适的汇率”的理解是不同的。宫泽喜一上台伊始就提出了“170到160”，希望最低也要维持在160的位置上。而美国呢？广场协议十年之后（1995年），马尔福特在回答NHK记者的问题时说：“从1986年到1987年，日本和欧洲都在担心美元是否走得太低了，因为当时的美元汇率偏离广场协议的目标太大。但我们当时的考虑并不是那样，我们当时的‘合适的水平’是135到140 。”G2联合声明发表时，日元对美元的比价是160，还差了20多呢。

就是这个160，后来一直成为美日之间疑心生暗鬼的一个很大悬案。因为进入10月份之后，日元的汇率一直在153到154之间徘

徊，但快到月底时，美元汇率突然开始转为上升，到了发表联合声明的前三天，美元涨到了161到163。美国人怀疑日本人为了利用G2联合声明绑住美国人而在中间搞了鬼。

联合声明发表之前，马尔福特直接打电话给大藏省财务官行天丰雄，询问日本人是不是为了汇率而干了什么？并警告说如果日本人干了什么的话，这个联合声明立即作废，不发表了。

行天丰雄表示，这段时间日本肯定没有干预过市场，联合声明应该按照原定计划发表，而宫泽喜一闻讯后勃然大怒，让行天财务官转告马尔福特："联合声明如果被取消的话，在日本国内会酿成很大的政治问题，我会立即辞职，你们看着办。"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联合声明当然只能按时公开发表，但是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猜疑却无法抹去 —— 要么是大藏省偷偷摸摸地搞市场干预，要么就是大藏省把消息偷偷地泄露给了日本的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无论大藏省干了些什么，考虑到日本公司对其国家和政府的忠诚度，要找到大藏省的把柄是不太容易的。但实际上，这个在外界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G2声明在还没有出娘胎之前就已经死了。

里根政权在政治上也是困难重重。从广场协议一开始，贝克就把中期选举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可是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惨败，失去了参议院的多数，这样政府再抑制国会的保护主义倾向就非常困难了。正好这时候还出现了伊朗武器门丑闻事件，中央情报局为了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组织，私下卖武器给伊朗，再把所得款项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组织，这个丑闻甚至使人们开始怀疑里根政权的安定性了。

12月21日公布的美国11月贸易赤字又达到了192亿美元，市场上看不到任何能阻止美元汇率继续下降的因素，加上美国财政部要人们也一起开始被称为"talk down"的口头介入，美元开始了新

一轮被称为“雪崩”的贬值。1月19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到了149.98，终于突破了150大关。

日本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干预，但是在没有美国人合作的情况下，以日本一国的力量是不可能改变市场潮流的。这时宫泽喜一采取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行动：亲自前往冰雪世界华盛顿，和贝克面谈汇率问题。

内向的日本人居然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着实把美国人也吓了一跳。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雪亲自来，打个电话或者让大使馆来人不就行了吗？事情真的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吗？要知道这种行为几乎把贝克送上了被告席，因为美国没有遵守诺言，让贝克在政治上很麻烦。

但宫泽喜一在政治上遇到的是同样的麻烦，现在不要说170、160的日元生命线了，连150都已经失守，就不可能把责任推到前任竹下登身上去了。无论如何，作为藏相一定要为日本、为日元找到一个稳定的汇率，否则宫泽喜一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所以，也可以说宫泽这次突然前往华盛顿是一次“万岁冲锋”，拼命了。

31．通货万花筒

贝克不能眼看着宫泽喜一在政治上死亡，实际上如果宫泽出了什么事的话，那么贝克也跟着完了。因为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人来接任日本藏相的职务，说不定日美之间又会出现什么新的麻烦，所以虽然事出仓促，但贝克还是给了宫泽他所能够给的最大礼遇。

冒着鹅毛大雪，贝克站在财政部大楼外面亲自迎接宫泽喜一，并立即举行了会谈。

对精英味道十足的宫泽喜一来说，这个会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整个会谈就是宫泽喜一在单方面求情，请求美国人遵守10月份的G2会谈声明。当然，再回到两个月之前是不可能了，但无论如何日元不能再从150往上升值了，也就是说，日本需要美国人一个“维持汇率稳定”的保证。

贝克接受了宫泽的要求。在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中，虽然双方认为“近来的外汇市场经常出现不稳定的局面”，但是双方又同时承认：“最近的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基本上符合经济基础的”。

如果说上次的G2声明容忍了160的汇率的话，这次的联合声明就是容忍了150的汇率，但是双方是否都会努力去维护这个汇率就

很难说了。宫泽喜一再三陈词，痛说日元进一步升值将会对日本经济、美国的资金流人以及经济界的投资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贝克只是坚持一贯的立场，即接受1美元等于150日元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会采取一个义务、自动的市场干预政策。是否进行市场干预要看美国经济当局的考虑。

会谈结束后一个星期（1月28日），日元再次升值到150的边缘，这次FRB和日本银行一起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干预，这是广场协议之后，美国人采取美元贬值政策后进行的首次保护美元汇率的市场干预。

但这次干预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政策的改变，也不意味着美日经济当局会开始更为紧密地合作来稳定市场汇率。这只是美国用来换取日本人的更大规模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的行动，日元本来就只是美国人的一张牌而已。

在两个月前被全世界传媒谈论得热火朝天的所谓“G2”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对这个名词从来就没有定义和说明，G2到底是出自美国人想和日本人联手领导世界经济的一种战略考虑，还是仅仅以这个为诱饵来吸引那个不听话的西德，从而组成一个G3的战术考虑呢？

有人评论，G2是个万花筒，能够映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就看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了。当初的竹下登是为了通过G2来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藏省是想通过G2来排除西欧的影响，那么美国呢？美国主要是想通过G2对西德施加压力，迫使西德就范。在第一次《贝克、宫泽喜一联合声明》发表的时候，美国财务部高官曾经这样说过：“西德是很不合作的国家，日元从历史的最高值175已经突破到了153，而西德马克还是徘徊在2.05到2.07，要知道，西德马克对美元的历史最高值是1.69。很明显，日本人表现出了一种比西德人更

加合作的态度，所以才有《贝克、宫泽喜一联合声明》。”

美国人没有达到目的，德国人决不放弃在经济政策上的独立自主。这不仅是因为对美贸易仅占西德对外贸易的一小部分，还因为西德人成功地使EMS紧紧地团结在了自己周围，以抵抗美国的压力。

G5成员中的英国一直与美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但是在广场协议之后的西方通货外交中，英国的存在感却非常模糊。这不仅是因为经济上的衰落使英国不得不为了自尊心而采取“光荣的独立”的方式，与西欧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且因为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处境本身就和美国在广场协议之后所采取的政策有冲突。

撒切尔政府本来就信奉金融自由、市场优先的信条，对于广场协议那种政府出面干预市场的做法本来就不以为然，再加上G5中英国是唯一的资源出口国，北海油田使得英国成为一大产油国，美元的贬值对坚持英镑和美元挂钩的英国的国际收支是非常不利的。

英国没有参加EMS，但英国不少抱现实主义态度的政治家们一直在怀疑这种做法的正确性，游离于欧洲货币系统之外的英镑使得英国的经济也越来越远离欧洲经济圈。实际上，英国国内已经有不少人在呼吁，要解除英镑与美元的联系转而与西德马克挂钩，这就是在广场协议之后的西方通货协议中，凡是牵涉到了西德，英国人总是沉默不语的原因。

法国在这些通货协议中的表现则非常有趣。作为EMS体系中的一员，法国默默地支持西德的所有具体行动，因为EMS所要求的内部通货安定使法国人无法忍受伴随美国人所要求的西德马克升值所带来的法国法郎升值。

但是，法国人在这些交涉中又充分发挥了法国人最擅长的外交谈判能力，在帮助美国人说服西德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德人能够无视美国人的抱怨，但无法无视在EMS系统中经济规模仅次于自己的法国，如果西德和法国不能维持良好的关系，EMS就无法继续，因此西德也就只能臣服于美国了。所以，法国在美国和西德之间充当了一个桥梁的角色，使得双方能够继续交流。

从19世纪后期开始，法国几乎在所有的对外军事行动中都没有取得过胜利，但这也没有影响过法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这就说明了法国外交的老练和成功。外交并不全是耍嘴皮，外交需要大家能够接受的理念和主张，这点正是法国的长处之所在。法国在国际通货方面有自己的一套理念和理论，那就是所谓“目标区域”（target zone）理论。法国人主张国际通货市场应该维持一个包括上下限的“目标区”，各国所需要努力的只是把通货限定在这个目标区之内。虽然，到最后这个理论也没有被人正式接受，但是随着多国协商的不断进行，这个理论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到了1987年2月卢浮宫G5的时候，几乎差点就成了G5的共同理论了。

卢浮宫G5，可能是各国最后的一次共同努力了。

32. 目标区域

法国有葡萄酒，法国有法国料理，法国还有卢浮宫。

如果在卢浮宫里品尝法国葡萄酒和法国料理会是怎样的感觉？

手里端着弗罗兰·路易香槟、嘴里嚼着比目鱼的美国财政部次长达尔曼打量着对面壁画上的鹿，嘴里喃喃道：“今天的正餐吃什么，听说是鹿肉？”

站在对面的法兰西银行总裁特拉罗杰尔听到了这句话，他回头看了一眼壁画，对达尔曼会心一笑：“嗯，会很不错的。”

这是法国财政部长帕拉杜尔主办的G5工作午餐上的一个场景。

这次的G5在卢浮宫举行。卢浮宫除了是陈列着《蒙娜丽莎》等名作的有名博物馆，还是法兰西共和国财政部的所在地。

从这个被称作“友好厅”的房间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卢浮宫的院子，里面有几辆红红的大吊车在进行改装工程，吊车上写着“G5”、“G6”等字样，这些吊车的主人是承包工程的GRUE PROPRIET公司。

不知是谁说了句：“怎么没有G7？这可不大吉利，意大利和加拿大不是就要来了嘛。”

不知谁接了答话：“呵呵，G7就要来了，听说法国政府刚刚给

那家公司打了紧急电话。”

一阵哄笑。

日本银行总裁澄田智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倒着高级葡萄酒，心里想着：“总算过来了，不容易。”

这天是1987年2月21日。按照正式的说法，应该将在第二天召开G7会议，这是在G7之前的G5碰头会，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G5。上午，按照西德、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顺序，各国财长和央行总裁分别报告了各国的财政和金融情况，澄田智在报告中很骄傲地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进行第五次降息。”

手里拿着香槟杯子的法国财长帕拉杜尔突然来了一句：“诸位，说点正经的吧。”

正在吃着喝着的时候，说什么正经啊？人人都在心里嘀咕。

帕拉杜尔还在继续：“为了防止以后发生误解，现在就把具体的数字理一理吧。”

G5开会本来就不可能是那么轻松的。这次也还是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午院子里少了一辆编号为“G7”的吊车真的不吉利，反正到最后这个首次的G7就是没有开成，只弄出来了一个G6。

明天的G7是公开的，而今天的G5是秘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意大利却知道了这回事，觉得在G7开会的前一天居然还有一个G5，特别有伤意大利的自尊心，上次这5个国家胡乱做一个决定就让意大利损失了大笔宝贵的外汇储备，这次说是让意大利人参加了，怎么还有个预先的秘密会议啊？于是意大利决定抵制这个倒霉的G7会议。

意大利人通过抵制首次G7找回了面子，但这个面子全是从会议东道主的法国人那儿找来的，好不容易开次会还被人抵制了，法国人才没面子呢。法国财政部长帕拉杜尔就把这个问题端到会

场来了——到底是G5还是G7？结果花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讨论出名堂出来。沃克愤愤地说："Fuck，简直是浪费时间！"他可忘了，想出G7这个主意的实际上是他的总统——罗纳德·里根。

但法国人不能骂人，特别是因为意大利是属于EMS的欧洲国家，多一个欧洲人说话就多一份分量，所以正式晚宴只开到一半，他就带着法兰西银行总裁、财政部国库局局长三个参加了G5的法国人，前往意大利财政部长格利亚的驻地赔礼道歉。气坏了的意大利人坚决不接受道歉，说意大利总理官邸已经下了死命令，要抵制这次G7，他个人只能表示抱歉了。

就这样，第二天早上6点钟，意大利人就离开了巴黎，剩下了的G6对着记者团面面相觑，拼命解释缺了意大利并不意味着盟国之间出现了裂痕什么的。

不管这个从G7莫名其妙地变成G6的过程是不是吉利，反正从此以后，这个G代码会议就再也没有精气神了，就算现在加上俄罗斯成了G8也不顶用。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后来的事情，当时大家都对这次会议充满了希望，英国财政大臣罗森对会议的评论只有几个字："广场第二"。

罗森并没有夸大其辞，如果以后没有发生那些想象不到的事情，卢浮宫G5确实可以和广场酒店G5一样载入史册。广场酒店G5决定了各国联合起来降低美元的汇率，而卢浮宫G5则决定了各国联合起来稳定美元的汇率。

如何稳定呢？

上面提到过，法国人有一套一直在主张的汇率理论，也即"目标区域（target zone）"理论。法国人主张汇率既不应该像美国人那样完全没有目标、自由放任，也不应该像日本人主张的那样是一

条往上多少都行、往下一分一厘也不让的死线，而应该是一个有其上限和下限的区域，这样就可以有弹性地对应。如果汇率变化的幅度超越了这个区域，则由有关国家联合采取一定的行动来进行市场干预，把汇率再调整回去。

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也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理论，但谁都不愿接受。首先，在像通货汇率这样有关主权的微妙领域，大家可以商定一些具体做法，但谁都无法接受他人的一套完整理论。其次，各国都有各自的考虑。比如，西德人就觉得这个理论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如果市场干预的结果无法把变化了的汇率调整回目标区域怎么办？是不是修改目标区域值？这样还不是和没有这个区域一样吗？美国人对于预先设定一个区域值倒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无法接受“如果汇率变化的幅度超越了这个区域，则由有关国家联合采取一定的行动来进行市场干预”这句话，因为美国人不能这样把自己捆死，美国人不太喜欢“义务”这个词，特别是不喜欢为别人尽义务。实际上，日本人对这套理论倒是最能接受的，对于日本人来说，所谓目标区域不是问题，问题是目标区域的下限必须在日本人能接受的防守底线之上。

大家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要开成这个卢浮宫G5可不容易。



33. 为了开成卢浮宫G5

贝克一直想再搞一个类似于广场协议那样的国际协定来解决通货问题，1986年10月的第一次《贝克、宫泽喜一联合声明》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在向西德施加压力。

日本人也想有一个大家能够遵守的国际协定，否则对这种日元升值受不了。特别是1986年12月的第二次《贝克、宫泽喜一联合声明》，让日本人受尽了屈辱。而西德人为什么能保证其独立性呢？日本人知道西德人的强势在于其有欧洲作为盟友，从而在对美交涉时不是以单一的国家身份出现。日本也不想再次单独地面对美国，所以对贝克试图通过G5来制定新的章程的想法也非常支持。

1987年1月，在瑞士的苏黎世召开了五国副财长会议（G5D），讨论具体的卢浮宫G5的议题，实际上是扯用词问题。虽然基本上大家都接受了法国人的“目标区域（target zone）”的概念，但是决不能就这么简单地用这个词。经过再三扯皮，基本上大家趋近于使用“参考范围（reference range）”这个词，不过，这个所谓的“参考范围”究竟是“现在的水平周围（around the present levels）”还是“现在的范围周围（around the present range）”，还有待最后老板

们的决定。

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之外，实际上贝克还真的想过放弃卢浮宫G5。

就贝克来说，他是想用稳定汇率来换取西德和日本扩大内需的承诺，减轻对美国市场的压力，解决美国的预算和国际贸易收支这一对双胞胎赤字的问题。稳定汇率一直是西德和日本所希望的，也是现在贝克所希望的，第二次《贝克、宫泽喜一联合声明》发表之后，美国参加了干预市场的行动就是一个证明。因为新的美国国债的招标就要开始，这个时候美元下跌势必会使人在竞标时发生犹豫而使得美国的长期金利上升，这绝不是贝克喜欢看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三方一致了。

但是，西德人在减税问题上的表现让美国人很不满意。

1985年6月，西德科尔政权曾经有过一个大型的减税设想。根据这个设想，西德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别实行109亿马克和88亿马克的所得税减税，并在1990年继续实行440亿马克的大型减税。1986年和1988年的都已成为法案通过，问题出在1990年的减税上。1990年减税号称440亿马克，实际上只有250亿，因为还有190亿马克的消费税增税和削减联邦政府对各州的财政补助计划。

科尔政权是一个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三党联合执政的政权，1987年1月西德大选时，大家围绕着这个减税设想就开始扯淡了，自由民主党坚决主张以降低最高税率的方法实行减税，但基督教民主联盟觉得那种方法有利于有钱人，对收入处于中下水平的人不公平，而主要基地在农村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则害怕削减联邦政府对各州财政补助会影响到其支持层的利益，因而也面有难色。

除了执政党内部的情况外，中央和地方之间也有问题。减税法案一定要在众参两院全部通过才能生效，而西德的参议院是由各州

代表组成的，当时西德11个州中，掌握在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手中的就有5个，再加上其他因素，所以在参议院通过减税法案希望不大，于是科尔政府决定，在1987年底的地方政府选举之前，先冻结减税的议论。按照科尔总理的说法就是："西德人不能像中曾根或者竹下登那样成天做一些无法兑现的保证"。

在脑子异常灵活的美国人看来，西德人的脑子就像花岗岩那样顽固，就算你不能信口开河，你还不能说一个能够办到的目标吗？

能。科尔政府直到预测能够在1月份的大选中取胜之后，才很谨慎地宣布了将预定在1990年进行的440亿马克的减税计划中的55亿马克提前到1988年进行，至于其他会引起争论的最高税率、消费税或者削减补助什么的一概不说——打消了念头也没准儿。

这在美国人看来根本就不能算什么"扩大内需"，所以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贝克都对卢浮宫G5会议失去了欲望。但最后，预定在2月份开始的美国国债招标，以及下半年的西德地方政府选举还是让美国和西德在稳定汇率上走到了一起，西德财政部长斯托尔腾堡直接打电话给贝克，表明西德愿意在卢浮宫G5上允诺更大规模的减税，而日本政府也答应了在议会通过1987年预算之后，立即编制有关扩大内需的补充预算。

就这样，卢浮宫G5总算开起来了。

和所有的G5一样，会议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扯语言的淡。比如前面说过的"水平（levels）"和"范围（range）"，法国人和美国人倾向于"水平"，而日本人和英国人则倾向于"范围"。西德人呢？出于对美国人的厌恶，强烈主张如果不用"范围"就什么都别谈，这样一来，美国和法国人只好投降，改用"范围（range）"。

"levels"和"range"的含义是不同的，从各国的选择中也能看出各国的想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卢浮宫G5中最让大家无法

理解、哭笑不得的是英语奇棒的日本藏相宫泽喜一。

虽然在G5中日本人说日语，法国人说法语，但是最终声明之类的文件都是使用英语。而到目前为止，对声明在语言文字上把关的是英国财政大臣罗森，英语嘛，当然应该是英国人来喽，这是常识。

但这次在卢浮宫，宫泽喜一对这个常识提出了挑战。

联合声明中有一个"现在"的说法，使用的英语单词是"present"。从一开始的苏黎世G5D开始就没有人对这个单词提出疑问，但这次宫泽喜一就对着罗森嘟哝上了："'Present'这个词的含义太个别、太具体了吧？如果要稍微在时间尺度上放宽一点的话，这个词恐怕不那么恰当吧？"

大英帝国已经没什么牛的了，能让罗森自负的就是他的英语造诣。这回饶是罗森也糊涂了："那你说用哪个词呢？"

"Current！"宫泽喜一斩钉截铁地说。

这两个字不都一样嘛，在场的所有人异口同声："行，就用'current'。"

34. 宫泽喜一在想什么

在别人看来，“present”和“current”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用哪个词都一样，宫泽喜一拘泥于这些似乎很可笑，但在宫泽喜一看来，这两个词是真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定死用“present”的话，那还真的就是“现在”的意思，而“现在”的日元汇率在这个时候指的就是前一天的收盘价——153.5日元兑换1美元，宫泽喜一要是承认了“present”，也就承认了153.5，那就会出大问题，特别是无法向日本国内交差。而如果使用“current”的话，就能给宫泽喜一下一步的交涉提供基础，同时也能够向国内解释，这点大家在当时都不知道。

但马上就要知道了。

卢浮宫G5所提出的“参考范围（reference range）”是这么个意思，首先给通货汇率定下来一个“current levels”，也就是前一天的收盘价：1美元兑换153.5日元或者1.825西德马克，这个其实是一个中心汇率，以后的动作都根据这个汇率进行。

在市场价格偏离这个价格到了2.5%的时候（这个值叫margin），两国开始干预市场，但这种干预并不是强制性或义务性的。当市场价

格偏离这个价格5%的时候（这个值叫band），两国必须干预市场，而偏离度达到5%以上时，就要重新定义中心汇率了。

看起来挺公正，如果大家都能做到的话，卢浮宫协议也不是一个不能维持的体系。

但是这只是“看起来”，大家一较真，宫泽喜一的“present”和“current”之争的意义就出来了。按照“参考范围”的定义，中心汇率为153.5的日元发生2.5%变化的上下限分别是157.43和149.75，发生5%变化的上下限分别是161.57和146.19，这是按照所谓IMF（国际货币基金）计算方式得出来的数字，所谓IMF算法是变化后的数字算100%。

不要说发生5%的变化，就是变化只有2.5%的时候，中心汇率153.5的下限也低于了150。而150是宫泽喜一无论如何要坚守的底线，也是日本国内能够接受的最底限。低于150，哪怕是149.75也是日本人绝对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从一开始宫泽喜一就要扯“不能太个别、太具体”的原因，那意思就是不能使用153.5这个中间汇率值，另外在“current”的值里面再找一个行不行？

没什么不行的，英国财政大臣罗森这次支持宫泽喜一，因为他也不喜欢1987年2月20日英镑对美元的收盘价，因为英镑的汇率太低了。和日本人不同，已经成为石油输出国一员的英国当时正为了石油价格低下而伤透脑筋，提高英镑汇率是英国能够多弄点外汇的唯一方法。

这就开始扯淡了，西德人本来就不赞成超越市场而制定什么中心汇率，这下更热闹了，你们不但要制定中心汇率，还想恣意地制定根本就不存在的什么中心汇率，你们是不是上帝啊？

美国人则质疑日本人，你们为什么光看地板不看天花板，从来没有看到你们对天花板有意见，一直是在扯地板！天花板和地板是

配套的一对，你们得全部接受才行。马尔福特在说明时还加了一句："就像怀孕一样，没有怀半个孕的。"

但这次不一样，谁也无法说服宫泽喜一。150对于宫泽喜一太重要了，从他出任藏相的时候，马奇诺防线是170，第一次《贝克、宫泽喜一联合声明》的时候成了160，如果到现在他连150都无法死守住的话，他的政治生命就很可能出现问题，所以他现在不是为一个抽象的"国家利益"努力，而是为很具体的他本人的政治前途打拼。

这时候法国人出来了，劝说得极其实惠：这个2.5%的margin和5%的band是没有任何法律义务的，日本人没有必要把这个"没有法律义务"看成拒绝参加市场干预的理由，而应该看成是进行市场干预的许可证。

一语惊醒梦中人，日本人这才发现，原来卢浮宫G5联合声明并没有剥夺日本人死守马奇诺防线的权力，至于马奇诺防线是否能够防守得住，本来就没有成为过问题，只要宫泽喜一没有主动放弃150，即使是日元进一步升值，那也是"天亡我，非战之过也"，这样才算平息了这场争端。

在当时，参加卢浮宫G5的人们对这个协议的评价是相当高的，都称其为"广场协议第二"，对其抱有相当大的期望，而且从20年之后的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材料来判断，也没有人想过要违反或放弃这个协定，相反，他们在一开始都是很积极地想维持卢浮宫协议中的"参考范围"。

但是，市场变了。

市场不再像广场协议发表时那样尊重这个什么G5了。广场协议之后的短时间内，G5的表现使得市场知道了这几个主要工业国能够联合起来采取一致的通货政策，但随后，G5会议所提出来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相矛盾的政策和提法，以及各国间争先

恐后的缺乏方向的口头介入，使得市场再也不相信他们还能够联合起来采取一个统一的通货政策，G5的权威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卢浮宫协议根本就没有引起市场的重视，大家只把这个协议看成是G5自欺欺人的东西而已。

再加上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西德和美国的实际经济表现也使得市场对于G5所采取对策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对于市场来说，美元的贬值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什么为了重整美国制造业而需要采取的权宜之计，美元的价值是一个应该下降的东西了。

这就使得卢浮宫协议从一开始就成了一个泡影。

35. 广场协议终于寿终正寝了

卢浮宫协议之后，市场沉静了一段时间，日元汇率在153之内变化。但这段时间很短，到了3月16日，日元就进入了152，从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日元升值。

这轮日元升值的主要原因是进入3月份之后发表的美国经济指标非常不妙，1986年，美国对外贸易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450亿美元，而GDP的增长率只有2.9%，是四年来最低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在停滞。

当然，和往常一样，直接拉动日元升值导火索的还是詹姆斯·贝克。

3月24日，贝克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卢浮宫协议中没有汇率水平的协议"。这句话没错，G5的通货黑手党们确实没有在卢浮宫达成什么大不了的汇率协议，但是贝克讲这句话的时机实在太糟糕了。

根据卢浮宫协议，各国开始了联合干预市场的行动，但是这次行动被市场的铁壁粉碎了。市场的代理商们根本就不相信各国在联合行动，相反，到处是"日本银行又在借别人的手在行事，实际干预的只是日本人一家"的小道消息。

那时的干预规模绝不是一个小数字，光日本一家就奋战了一个

月，日本银行在3月份增加的外汇储备为67亿美元，加上1月份进行市场干预所开销的92亿和2月份的3亿，总和已经超过162亿美元，几乎是广场协议时五个国家花费的总和！美国FBR从3月20日开始到4月6日这半个月里，也投入了30亿美元进行市场干预，西欧各国也参加了这项行动。

市场介入的总指挥官泽喜一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个藏相做得最不光彩，今天是两日元，明天是三日元，永远在升值，所有人看到我的时候，脸上都是'你这个藏相在干吗啊'的表情，进行市场干预，一投就是20亿美元，换算成日元就是3000亿，那么多钱就像投进了黑洞一样，市场没一点反应。"

市场本身已经变了，变得太大了。此时东京外汇市场的规模已经变成了广场协议时候的3倍，除了原本就在市场里的日本各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之外，新增了数不清的外国公司，更要命的是，除了这些专业做外汇买卖的之外，大量八竿子打不着的日本公司也进入了外汇市场，在东京随便扔块石头，都有可能砸着一个挂着"外汇代理商"头衔的人。

有人这样回忆："没有比外汇代理商更加容易干的活了，什么都不要想，只管买日元卖美元就行了。偶尔美元也会涨的，但是终究是往下跌，只要卖掉美元，迟早是赚的。这样参加进来的个人和公司越来越多，中央银行在这么大的反对集团面前什么都不是。"

3月30日，日元跳过了宫泽喜一坚决不承认的146，一下子就进入了144，卢浮宫协议还不到一个半月就破产了。

4月8日，G7会议在华盛顿召开，这次意大利人总算来了，首次开成了G7。但是聚齐了的G7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市场已经不听他们的了，发表什么联合声明也没有用了。最终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居然有这样的语句："各国通货最近的水准基本上

和各国经济的基础条件以及卢浮宫协议所阐述的基本政策意图是一致的”，此时的日元已经是145左右了，只能说G7们是在掩耳盗铃。

可是美国人还在寻找挽救美元的方法。在华盛顿G7会议上，贝克和沃克反复劝说日本和西德要遵循卢浮宫协议来维持参考范围。这个已经破绽百出的“参考范围”还能怎么维持呢？贝克提出的方法是在美国加息的同时，日本和西德减息，拉大美国和西德日本之间的银行利率差距，从而诱导资金流向美元。

这次日本银行的回答很坚决，日银总裁澄田智很严肃地对贝克说：“Enough is enough（够了就是够了）。”2.5%的银行利率是日本从未经历过的，日银本来没有长期持续的打算，而且日本已经开始逐步从日元高涨所带来的不景气中走了出来，日本银行已经开始考虑景气是不是开始好转了，在这个时候日本怎么会再次减息呢？

美国还是不断督促日本减息，但日本没有反应，已经无法在银行利率上反应了。

广场协议之后的西德和日本实际上从美国人那里受到了同样的压力，但是西德人和日本人在压力面前所做出的反应完全两样，以后所发生的也完全两样：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而西德则没有泡沫经济。

怎么会这样？

日本和西德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西德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西欧国家，是西欧的一部分，西欧国家都是它的盟友，美国对西德所施加的压力最终被西德分散到整个西欧，单独西德部分的压强并不大。

而日本在亚洲的位置非常微妙。战后的日本虽然不再提“脱亚入欧”的口号，但也从来没有将自己看成是亚洲的一员，甚至到GDP已经被同是亚洲国家的中国超过了的今天，这种古怪的意识

依然存在。日本一直不知道那种“亚洲优等生”的骄傲已经不合时宜，它在亚洲没有盟友，日本人也没有想过应该在亚洲找盟友，这样当他们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时，他们必须自己全部担负起来，故而他们受到的压强相当大。

所以他们还是要考虑如何与美国进行经济政策的协调，在银行已经没有进一步减息的余地的情况下，日本人手里剩下的唯一一张牌就是财政出动、扩大内需。

1986年秋天的补充预算只是大藏省虚晃一枪，糊弄了一次美国人。但美国人是不会让别人糊弄第二次的，《贝克、宫泽喜一第二次联合声明》中，日本人就不得不明确承诺了要搞景气对策。

这一搞就搞出了个泡沫。

36. 泡沫从何来？

实际上，日本银行在那时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加息！既然已经答应了要搞景气对策，答应的还是美国人，那就一定要搞了。而且也不能再像1986年补充预算那样去忽悠美国人了，这次真要投钱干。

能不能“投钱干”有两个问题：有没有“钱”和能不能“干”。中曾根从1981年开始就一直在搞行政改革，所谓行政改革在日本就是“节省开支”的代名词，像现在民主党政权的女大臣莲舫的顶子就是“行政改革大臣”，实际上所干的就是怎么从预算中找出一些可以削减的项目一类的事情。和为了上台比岁收还高的债都敢借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不同，中曾根高举的一直是“无增税而重建财政”这面大旗。现在要中断行政改革来搞景气对策，首先就得要他自己搞出来的那个“临调（临时行政调查委员会）”能够同意才行。

一开始中曾根也没指望能够简单地说服“临调”。别看中曾根是“总理大臣”，但当时的“临调”会长大槻文平也是日经连的会长，算是日本资本家联合会的会长，光是一个“总理大臣”恐怕吓不倒人家。但是这次大槻文平没有为难中曾根首相，只是说“无增税而重

建财政的方针不能变，但是税的内容倒不是问题”。意思就是只要税收总额不变，征税的名目可以调整，就是说可以“干”。

可以干的原因是因为有钱，当初1986年补充预算的问题是大家都说没有钱，而大藏省又坚决发行赤字国债，所以弄不成，但这次不同了，这次日本人很有钱，要干个漂亮的行动出来。

中曾根康弘的智囊之一中川兴次特地写过一封信给中曾根说明钱在哪儿。

按照中川兴次的计算，中曾根主导的行政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中曾根的三大行政改革，也就是将原来的三个国有巨型企业——国有铁路、电信电话公社和烟盐专卖公社改为民营，这样，在削减政府支出的同时，还可以从出售国家持有的股份中得到收益。国有铁路和烟盐专卖公社因为累计亏损太大，民营化除了减少了政府开支之外还没有看到多少收入，但电电公社改为NTT公司之后，给政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高收益。日本政府从1986年秋天开始出售持有的政府股份，刚上市时每股119万日元，到1987年4月已经上涨到了300万日元以上。中川就是看到了这笔钱。

按照中川的计算，政府可以拿出来搞补充预算的钱有：

1. 自然增加了1万亿日元以上的税收，这里面可以拿出来7000亿作为上一财政年度的剩余金。

2. 按照每股290万日元计算，出售195万股NTT股票所得到的5.6万亿日元。

3. 出售JAL日航公司股权得来的5000亿日元。

这6.7万亿的额外收入中，扣除种种费用之后起码可以拿出4.7万亿来搞补充预算。

实际上，中川在信中只指出了后面两笔钱，说可以弄一个3.5万亿日元左右的补充预算。后来大藏省又说出来了第一笔钱，那

是一笔什么钱呢？1986年，日本人在美国人的再三要求下，实行了一个1.1万亿日元规模的、以法人税和所得税为中心的减税行动，但是到最后收上来的税款并没有少，所以本来用来填补这个减税窟窿的钱就多出来了，可以用到其他地方去，而中川不是大藏省的，不知道还有这笔钱。

大藏省急吼吼地把多收的那点税赶紧往外说也是有原因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一直在上升，日本企业的出口受到打击从而影响了国内景气，特别是国内的中小企业所受打击确实不小，议员们在选区里受到了来自与中小企业有关的选民的压力，这些议员反过来就把这些压力转到了政府身上，这样国内政坛上当然是吵成了一片，矛头直指政府。首先是政府能不能想法子停止日元的上涨，其次是如果不能停止该怎么办？

在日本人看来，这两个问题都只能由大藏省来回答，因为都牵涉到钱。而大藏省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日元升值的趋势已经不是日本政府所能控制的了，而且也看不出美国人会和日本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所以只能考虑在日元继续上涨时的对策了。

日元上涨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经济中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太高，所以如果能够减少出口、扩大内需的话，日元升值自然就会停止。但和非常多的议论一样，这只是废话真理，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扩大内需。所以如何才能“扩大内需”成了当时日本最大的话题，解决日元升值问题要靠“扩大内需”，而内需真的能够扩大的话，反过来正好能够为由于日元升值而剩余出来的那部分产能提供应用场地，一举两得。

这时候宫泽喜一大藏大臣的“积极财政”论就无可奈何地成了大藏省的唯一选择——先出动财政人工造出“需求”再说，于是大藏省

开始四处寻找财源了，这就是大藏省主动说出多收了1万多亿税的原因。

但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多收的1万多亿税究竟来自何方。

法人税和所得税减税所空出来的1.1万亿日元的岁入空缺居然会被自然增长的税金给填满了！但是这个空缺并不是被增额的法人税和所得税所填满的，而是被多收来的其他税种的税给填满的：有价证券交易税、固定资产税和土地交易税在1986年大幅增加，其中有价证券交易税增加幅度是92%。

就是说，虽然传媒和国会在吵吵日元升值，经济不景气的同时，股市和土地价格非但没有收到什么影响，而且还在大幅度地增长。但这实际上已经是泡沫经济的警告信息了，但日本人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信息，反而把解救经济问题的方法寄托在已经走上了危险道路的经济上，打个比方，就是给已经发烧的病人注射增温剂。

还有另外一个疑问：是不是一定要搞这个“补充预算”呢？



37. 日元升值经济就一定不景气吗?

可以说，二战之后的日本经济史就是一部日本人和日元升值的战斗史，日本是一个经济主要依靠出口产业的国家，通货上涨对出口产业界当然不利，尤其是在短时间内的暴涨，给出口产业界带来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比如，当汇率为240的时候，一辆日本汽车在海外售价为10000美元，利润率为10%，卖掉一辆汽车日本企业就能够得到1000美元，也就是24万日元的利润，而日元升值一倍所带来的后果是：即使日本厂家还能以10000美元的价格在海外销售汽车，而且利润率仍然为10%的话，这个利润值也降到了12万日元，更不用说由于通货兑换率的变化，这辆汽车在海外市场上仍然以10000美元的价格出售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是一直困扰日本产业界的“円高不况”——由于日元比价太高而诱发的经济不况。

然而，日本的实体经济在广场协议之后并没有毁灭，虽然传媒和政治家们依然哇哇乱叫，但日本经济还是很扎实地在持续运行，并没有出现像在欧美常见的遇到经济危机就发生企业大批倒闭、失业率急速上升、街头溢满无家可归的人那种景象。

经济企画厅每年年初要做企业问卷调查，1987年1月和1988年1

月两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有意思。调查里面有一项是：“能够盈利的日元汇率是多少”，1987年1月时候的平均值是175.4，而1988年1月的平均值已经下降到了140.9，下降幅度接近20%。实际上，其中最多的回答是在130左右，14%的企业已经能够在120的汇率下实现盈利。

当时的富士银行也对机械行业进行专项问卷调查，里面也有盈利日元汇率这一条，1985年是210，而1987年上半年已经下降到了131。

日本类似这样的问卷还有很多，政府和各种民间团体经常进行这样的调查，但有意思的是，这几个数字都高于当时的实际汇率。特别是上面富士银行的结果，指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应该说机械行业对通货升值的对抗能力比电子和汽车行业要差，但就是机械行业的盈利汇率，也一直在实际汇率之下。

即使在1986年，日本国内对日元升值的喊叫甚嚣尘上的时候，日本的大中型企业中也没有出现赤字，而到1987年的时候，大多数日本的大中企业都创造了盈利的历史最高纪录。日元升值并没有对日本的大中企业造成什么大不了的困境。

回想一下当年卡特彼勒公司的董事长李·摩根在游说国会的时候所说过的话吧：“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降低15%—20%的造价……我们没有办法和小松制作所竞争。”——所以日元必须升值，因为美国人是无法降低造价的。而日本人并不认为降低造价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不认为降低造价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日本人一直就在和日元升值苦斗，因此他们确实拥有了一些解决方法，这些方法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永远有效，但在日本的具体条件下，还是可以把日元升值所引起的经济震荡的影响降到最低。

日本人干事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像欧美人那样选择激烈的做法，而是慢慢地解决问题，慢慢地吸收解决问题时所产生的副作用。日本企业不会采取欧美国家常用的、一旦遇到经济危机立即大量裁员

的做法，只是悄悄地改变了雇佣制度，起用更多的临时工（Part Time Worker）来减轻企业在工资、保险等费用上的开支，同时也控制正式工的工资，来增加企业的收益。而日本的雇员也愿意和雇主合作，接受这些条件来和企业一起渡过难关。

同时，日本企业也以“再绞一把干毛巾”的精神在内部挖潜上下工夫，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小成本以和国外企业竞争，一般的日本企业都能做到在一年内降低5%的成本。这样，在日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日本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随日元升值的比例而升值，甚至还能找出一些日本产品不断降价的例子。

当然，企业在内部经营方面的挖潜是有限度的，在日本的政治无法为日元升值打上一个终结符的时候，日本企业所能采取的最终对策是转移生产据点，将生产据点转移到离最后销售市场更近、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地区来压缩成本，在保证其质量和功能优势的同时，确保在价格上不至于太缺乏竞争力。

实际上，日本企业向外转移生产基地才真正使得广场协议成为了名垂青史的一大事件，广场协议会有这么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是当初参与的那些人们绝对无法想到的，他们导演的广场协议的真正结果是改画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地图。

肩上担负着国家民族未来的政治家都看不到的东西，就更加不要去指望企业经营者告别了。不要说企业会做出有悖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就是企业直接和国家对着干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要说日本企业，就连美国企业也是这样，人人都记得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国国籍的大石油公司为了不得罪阿拉伯世界，跟随阿拉伯人对美实行石油禁运，拒绝给美国第七舰队加油，反过来把原油卖到价格高涨的日本和西德市场的事情，因为企业的目的是盈利。

虽然大企业采取转移生产据点的措施能够降低成本，确保盈

利，但同时给社会带来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被大企业转移到国外的那些直接生产部门自然是这样，波及面更广的是为这些部门提供零部件以及其他劳务配套的那些企业，而那些企业一般都是中小企业，本身并没有走向海外的基础和实力。这样就造成了国内中小企业开工不足，甚至破产倒闭，失业率上升的问题，也就是所谓“产业空洞化”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日元升值所带来的问题还不是表面上的经济不景气，而是实质上的产业空洞化。

38. 产业空洞化是什么意思?

一开始，日元升值所带来的这种生产基地转移的失控对日本产业本身造成的冲击还不是很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损失。因为相对来说，转移出去的那部分是技术含量较低的部分，制造业的核心部分仍在日本国内，从产业安全这一点来说，这种转移还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就影响到某产业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但是在此之外所带来的问题就相当多了。

这部分问题主要是社会上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产业空洞化”。制造基地转移给社会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失业率问题，原来从事那部分被转移了的产业的人员富余了出来，这部分失业人员的存在和解决是个大问题，然而，日元升值对失业率的影响并不止这些，还有一部分国内产业也随之受到了冲击。

也不知道这个词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还是从日本引进来的，反正日文中也有个词叫“舶来品”，含义和在中文中一样，都有一点“来之不易的高级品”的意思。这个含义和原来东亚的经济地位以及制造业水平有关，进口商品都是比较高档的东西。但是，日元升值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舶来品不那么高级了，人们也能够更多地

消费这些高级舶来品了。更重要的是，除了原来意义上的高档舶来品之外，商家还把目光投向了一般的中档商品甚至低档商品，理由很简单：日元升值使得进口商品的价格变得便宜起来，无论是对商家还是消费者，便宜了的进口商品价格和日本国内原来的价格之间的差异都有极大的诱惑，而这种诱惑的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日本国内厂商在市场竞争中因为价格原因而败下阵来，破产倒闭，这又更加加剧了本来就因为大企业转移生产基地而出现的失业现象。

笔者在《东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中描述过日本的电子、汽车等支柱产业因对抗日元升值而向国外转移生产基地，从而使得日本国内本来为之配套的中小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发生大量破产倒闭的事例。实际上，由于日元升值造成的问题并不仅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遇到了困难，生产国内消费品的那些企业也同样遇到了问题。

比如说石英钟，这东西本来还是日本人的发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服部精工舍成功地把原来是一个庞然大物的石英钟弄成了可以摆在桌子上、挂在墙上，甚至戴在手腕上的东西，而且精工舍没有为石英钟表申请专利，这样一来，大家都能生产石英表。但石英表的质量还是日本的最好，20世纪90年代之前，外国石英表很难进入日本市场。但是飞涨的日元，特别是在中国开始生产极廉价的石英钟表之后，一切都不同了。

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市场上的低档石英钟的零售价大概是5000日元左右，约合40美元。但是中国能够以1美元的出厂价提供石英钟，当然，质量不是很好，比如不是很准、使用寿命较短等等，但是一般人在生活中对时间准确性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所以，在其价格能够满足用户的性能价格比的情况下，质量稍微差点的石英钟也能卖出去，这样，日本制品在中低档石英钟市场上就被扫地出门了。

日本是发达国家，有自己作为发达国家的自豪和责任，这种自豪和责任的表现之一，就是日本对于外国的工业品进口几乎没有关税。当然，日本经济在根本上还是依靠对外出口工业品，这也是日本不对外国工业品课税的原因。日本对外国工业品不课税而外国工业产品也并没有在日本市场上泛滥成灾的原因，是日本人依靠日本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能够抵御外国产品。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有一位叫中内功的人提出了“价格革命”的口号。此人是当时日本最大的超级市场连锁店“大荣集团”（DAIEI）的董事长，原来日本有一个“厂家希望价格”的概念，是他首先提出了“价格不应该由生产厂家决定，而应该由消费者决定”的概念。

这在当时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概念，这个概念直接挑战了日本的制造业厂商，而中内功之所以敢于只身挑战众多的日本制造厂家，是因为除了日本的传媒界支持他之外，他身后还站了一个名叫“中国”的急于闯进“工业产品提供国”的潜在巨人。

这种所谓“工业产品”，并不限于电子工业什么的，它包含了所有的轻重工业产品。举例来说，一双普通室内拖鞋，20世纪90年代初时，无论在日本哪家商店里，基本上都是800日元左右的价格，也就是说几乎是7美元，而这双拖鞋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上的销售价不会超过0.5美元，价格是日本的1/15。拖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高科技产品，中日两国间拖鞋的差异也就仅仅在样式上，如果中国按照日方提供的样式图案进行生产，消费者是不会有什么抵抗心理的。

在中国按照日本指定的样式、按照日本的标准，有时甚至使用日本的布料，在日本专家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生产，然后再把这些产品运回日本来销售。即便是在一开始因双方都不习惯这种操作方式而产生相当多的损耗的情况下，这双拖鞋也能在对商家极其有利

的前提下以400日元的价格在超市出售，这仅仅是原来销售价格的一半。随着合作双方经验的逐步积累、销售量的进一步扩大，这个价格还在不断下降，到现在，在日本可以以不到100日元的价格买到拖鞋，这个价格甚至低于中国的市场价格。

能够这么操作的商品当然不只是拖鞋，甚至也不只是服装鞋帽等轻工产品，所有的产品都能够进行这样的操作，真正的问题出在这里……



39. 从国外进口来的实际上是通货紧缩

趁着日元升值在海外进行投资，使用海外的廉价劳动力生产日本国内所需要的产品，运回来廉价出售，既满足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又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引进外资的需求，最后还满足了商家对于利润的需求，这已经不是双赢了，是三赢，皆大欢喜。

但这只是短时间内发生的暂时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做法的恶果就会慢慢呈现出来。

首先，进口商品冲击了国内产业。拖鞋也好，菜刀也好，原来日本有这个产业，养活着一批人。大量进口商品冲击的直接结果首先是这些产业的经营危机，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进入和廉价外国商品的价格战争。不管这些企业的选择是什么，在这些企业就职的员工即使没有立即失业，他们的收入也肯定下降。而收入下降也就意味着消费能力或者购买力随之下降，这就为廉价产品打开了更大的市场，同时也使得一开始并没有被价格或市场问题涉及的那部分生产高端产品的企业的市场开始萎缩，收益下降，从而再开始一个价格下降的循环。

这就叫"通货紧缩螺线"，实际上最影响日本经济的是这个螺

线，而不是因为日币升值使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的价格竞争力，日本产品在日本国内也卖不出去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的出口产品并不只是电子电器和汽车，餐具、炊具和毛巾等轻工业产品也曾誉满全球，而现在这些产品不仅失去了国际市场，连国内市场也没有了。

日元升值带来的这个结果并不被日本传媒所重视。日本人在谈到日元升值时，更多的是谈对高端出口产业的打击，对这种打击低端产品的结果则很少提及。这里面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这些行业都不是大行业，就业人数较少，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远不及那些高端产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实际上是无法保护这些产业的，日本是依靠贸易立国的国家，本身无法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战，所以，对于这些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产品，只能采取接纳的态度。但是，很不幸，本来就没有理清楚自己思路的日本这次又正好赶上了一个具有潜在产能、几乎是无穷大的中国，这一来，“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标志从一开始像熊猫那样稀少，直到变成没有那个标志的商品像熊猫一样稀少了。

这里再加一句有关那位发动“价格毁坏”战争的中内功的结局的闲话。中内功的结局非常悲惨。中内功是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成长而成长起来的，泡沫经济顶峰的时候，也是中内功成功的巅峰。中内功的商业模式基本上就是依靠出店的方式，抬高新开张的店铺周围的地价，然后再把店铺抵押给银行、得到贷款来购入新的土地进行开发。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地价狂跌，这种经营手法陷入了危机，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又在他背上添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那根最后的稻草还不是地震加上去的，是中内功自己主动背上去的。大荣集团是中内功先生战后在神户长田区从一家小肉铺起家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内功要报答神户。在神户地区不少店

铺毁坏的情况下，他坚持能够营业的店铺全部开门营业，所售产品一个日元也不涨，在交通网中断、物流不通，货物运不进来的情况下，中内功租用了商用直升机往灾区运送货物。在他的努力下，受灾地区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是中内功这种不顾经济规律的举动，给本来就负债累累的大荣集团带来了更多的债务，最后大荣集团陷入了经营危机。1994年大荣集团被“产业再生机构”接管，事实上破产。破产前中内功曾放弃全部股权，捐出私财企图起死回生，但没有成功。1995年，眼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企业化为乌有的中内功先生逝世。

如果你和神户人说“无商不奸”这句话，神户人会给你一个反例，那就是中内功先生。

实际上，日本经济的问题是由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产业的困难引起的。本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总有一些产业被淘汰，这些产业原本所使用的那些人力物力资源被其他更有活力的产业吸收，不会形成很大的社会问题。但这次日本人遇到的不是一个循环渐进的自然过程，他们遇到的是一个人为的突变。在那一瞬间，所有的日本产业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这样就无法自然地吸收那些多余出来的人力物力资源，形成了从那时开始一直困扰着日本企业的设备过剩和人员过剩问题。

社会问题一定会在政治上表现出来，选民们在遇到这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总要求助于他们所选出来的、平时好吃好喝供着的政治家们；在野党为了争取选票、夺取政权也要拼命渲染和扩大这件事，用来打击执政党；即使执政的自民党内部的不同派阀之间的利益也不尽相同，对于那些没有在现内阁占有阁僚位置的非主流派阀来说，这也是一个成为主流派阀的机会，这样一来，“日元升值”就成为了日本社会的最大问题，大家都在讲这个问题，都在抨击政府无能无策，但日元升值问题的由来、日元升值到底给经济带

来一些什么影响，以及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倒没有人去管。

因为这些原因，当时没有人去注意产业空洞化，也没有人去注意实际上大企业并没有被日元升值所困扰的事实，或者说就是注意到了也不能有所表示，因为这在政治上不正确。媒体要扩大销路也好，议员要争取选票也好，一定要政治上正确，起码不能犯政治错误。既然日元升值已经被决定了是一件坏事，就不能顶风作案反潮流，只能跟着说。再者，就算看出了实际上的问题是产业空洞化，也找不出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起码不是马上就找得出来，还不如闷声发大财呢。

40. 6万亿日元的成果

政治家总要拿出个方案来解决问题，选民已经把这个国家交给你了，就算是糊弄也要拿个方案出来。

自从美国人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之后，美国的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世界霸主，经济学也是这样。美国人不但在实际上占据着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在理论上和思维上也是这样，据说是罗斯福用过，带领着美国人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恐慌，主张积极财政的凯恩斯主义一直是西方各政府的终极武器。日本当然也是这样，于是主张积极财政的宫泽喜一终于占了上风，把主张削减赤字、重建财政的大藏省官僚压了下去。到最后，在1987年5月29日中曾根康弘发表的政府景气对策里面，包括了“不下一万亿日元的所得税和住民税的减税以及五万亿以上的公共事业”，这就整个改变了日本的景气对策常识。这次，就连那位当初告诉中曾根有钱的中川都被吓坏了，他听说这个规模后，一个劲儿地说“有四万五千亿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弄出六万五千亿来呢”。就是现在，中川还是坚持“多花了二万亿”。

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屈服于宫泽喜一的大藏省对这个景气对策

的评价都是一句话："Too late, too large（太晚了，规模也太大了）"。

实际上，日本在当时并不需要景气对策，起码不需要大规模的景气对策，真正所需要的是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日本人在这种时候特别喜欢使用"救灾"这个词，一开始就是"中小企业救灾政策"，所以一出手就是单纯大规模的土建工程，但救灾的方法不能解决这次的问题，因为现在日本的中小企业遇到的不是简单的灾害，而是大企业转移生产基地所引起的产业空洞化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空洞不是土建工程所能填补的。

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以后还会讨论，现在日本需要的是上调银行利率，以防止资产进一步通货膨胀，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泡沫经济。但是上调银行利率牵涉到一个可能诱导资金进一步从美元向日元转移从而加快日元升值的问题，虽然日元升值符合美国人的目标，但如果伴随而来的是资金流出美国，那就是美国人的灾难了，所以美国人无论如何不会同意日本人可能采取的加息行动，不仅如此，在需要的时候，美国人还会要求日本人减息。

1987年9月，格林斯潘接替沃克出任FRB主席。当年7月美国的国际收支创下了破纪录的赤字，美元再次开始下跌。为了稳定美元，格林斯潘打算上浮美元利率，同时要求日本和西德这两个盟国下调利率。当时日本的泡沫迹象已经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为了阻止经济过热，日本银行正在考虑提息。面对美国人提出降息的要求，日本人打消了提息的考虑，改为维持银行利率不变。

德国人就不一样了，德意志联邦银行仅仅对西德马克负责，其他国际国内政治问题不在联邦银行考虑的范围之内。和日本一样，在广场协议之后，西德为了和美国进行政策合作而采取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也导致了流动性过剩的现象。但是西德文化中没有东方文化中的那种土地崇拜，多余的资金不是流向土地投机，而是直接

在物价上反映了出来，西德开始了通货膨胀。

德意志联邦银行是世界上对通货膨胀监视得最严的银行，总裁佩尔一直称西德经济为“一个湿火药桶”，意思是稍有疏忽，一旦火药桶变干了就会立即爆炸，所以美国人对西德提出了什么要求和他们没有关系，进入10月份之后，德意志联邦银行采取了提高银行利率的措施。

美国和日本、西德的利率差已经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了，没有这个差，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立即就会陷入外国资金流入枯竭的境地，所以气急败坏的贝克在10月16日星期五，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对西德进行露骨的威胁：“如果不能进行包括利率在内的经济政策协调，美国将会容忍美元进一步的汇率下调。”

但是这种威胁非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诱发出了一个“黑色星期一”。就是接下来的星期一（10月19日），纽约股市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暴跌，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跌落了508美元，跌幅达到22.6%，远远大于引起世界大恐慌的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的12.8%。第二天，东京股市的日经平均股价也下跌3836.48，跌幅达14.9%。

和“黑色星期四”引发了世界大恐慌不同，这次的“黑色星期一”并没有打击到实体经济，东京股市不到半年就恢复到了下跌前的股价。所以这次的“黑色星期一”除了被人当做日历的一页之外，并没有人对这件事很关心。甚至连“黑色星期一”的起因都众说纷纭，一般说是计算机程序出了故障，但是即使是计算机程序也不会毫无理由地暴走。实际上，最大的原因就是贝克在10月16日的发言。

美元进一步下跌的意思也就是在美的债券和资产会贬值，因此在下一个工作日的星期一，被贝克谈话提醒了的投资家们一起开始了从美国的资金撤退。背景是在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在财政赤字和

贸易赤字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广场协议的合作体制也无法继续支持只靠借债度日的美国经济了。

有趣的是，“黑色星期一”之后，市场上出现了对美元的需求，美元汇率一时间倒涨上去了。这是因为美国的投信市场出现了大量的解约，为了筹集退还给客户的资金，美国证券公司不得不在跌幅较小的东京股票市场上抛售日本股票再兑换成美元，这样就在市场上造成了对美元的需求。当然，这种需求只是短时的需求，只有一星期，当美国证券公司把窟窿填补上之后，美元就又要开始下跌了。到10月29日，美元对日元的兑换率已经跌进了140。

41. 广场协议终于完了

应该说，“黑色星期一”使里根政府真正地害怕了。FRB立即得出了“要吸取1929年大恐慌教训”的结论，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格林斯潘立即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说FRB“确认时刻准备提供流动性来支持经济和财政系统（affirmed today its readiness to serve as a source of liquidity to suppor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立即采取了降息、增加流动性等措施，把市场浸泡在了美元里。

这个方法很管用，实际上，格林斯潘那份声明发表的当天，纽约股市就回弹了大约4%，“大师”格林斯潘也奠定了他君临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长达19年的基础。但是这种做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2月份的卢浮宫协议在8个月之后就寿终正寝了，意味着从广场协议开始的盟国间通货政策的合作寿终正寝了。

日本人在日元升值的问题上只能靠自己了，再也没了别人救援的指望，哭也没有用。

别说，还真有人去美国哭诉。那时，发生过一件让全世界都啼笑皆非的“劝进账事件”。日语中“劝进”的意思并不是劝你做皇帝，而是劝你捐点钱做修佛像建庙的好事，说是一种乞讨也行。劝

进的时候有一张横幅挺长的帖子，像卷轴样的，端着那张帖子站在谁家门口大声读，说明修庙修佛的伟大意义，然后这家人就认捐，再在劝进账的最后面添上捐钱人的名字和钱数。

当时民社党有个叫春日一幸的资深议员，此公在1987年7月去了美国华盛顿。因为资深议员来访，日本大使馆招待得非常周到，说您想去哪儿玩都可以安排，且派人同伴。可这位哪儿都不去，只说要见贝克。

贝克是美国财长，哪能那么随随便便就见得到？但是这位议员实在是资深，如果见不到贝克，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谁都不知道，起码在国会答辩时揪住外务省不放就受不了。结果大使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让贝克答应见这个普通日本议员一面了。

这位呢，在大厅正中间全身站得笔直等贝克到来。贝克一露面这位就来了90度的深鞠躬，倒把贝克弄得有点不好意思，正要上前说几句客气话，却被春日一幸下面的举动给雷得当场石化了。

这位日本资深议员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卷长长的卷轴，清了清嗓子就读了起来："贝克阁下……"

贝克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对面这位在耍什么把戏，等到臊得满脸通红的翻译结结巴巴地把大概意思翻译出来了之后，贝克气得满脸通红，撂下一句"汇率是我贝克就能决定的吗？"就走了。

这事到此就算完了吧，可这位议员还不干，一定要开记者招待会，让大使馆把传媒全部找来，他要宣布刚刚面见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当面求他饶了日本这么回事。被找来的传媒倒都是见多识广的人，比这更怪的表演都见过，根本没把这当回事，散了会就忘了。

传媒忘了可这位议员没忘，回到日本，他发现所有报纸上都没提这件事，可来了火，到各传媒去闹，结果报纸只好挤出一个角落，发了"议员面见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严正要求美国政

府采取有效措施来安定外汇市场”的字样。

这位议员既然是资深，就不是傻瓜，岂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只是在耍活宝、徒添笑料？但是谁愿笑话谁去笑话，他选区的选民不笑话就行了。其实他选区的选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只是从报纸的只字片言里知道他们的议员亲自去美国找过贝克，还从该议员本人的吹嘘中知道这位是怎样勇敢地向贝克抗议。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反正这位议员确实是在想着大家的利益，这样这位议员下次选举还能当选，变得更加“资深”。

当时日本的现实就是这样，八竿子打不着的议员也会利用日元升值来赚人气，从上到下一片对日元升值悲观失望的言论，几乎是哀鸿遍野。这就更加坚定了所谓“出动财政来救灾”的决心并加快了其进程，因为，在这种形势下没有人敢于出来冷静地分析局势，提出不同的见解。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出动财政救灾”是日后引起“泡沫经济”的元凶。但公平地说，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泡沫经济”，而且“泡沫经济”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人们一直到实际泡沫破灭的时候才肯承认曾经有过泡沫经济，否则会有数不清的专家权威使用数不清的理论来证明经济活动的正常性。有个叫海江天的日本人，现在入阁菅直人内阁，在内阁改造前担任财政大臣，内阁改造后担任经济产业大臣。此人在当时是大学教授，著书立说，到处去鼓吹日本经济是最佳形态经济的理论，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在读了他的书、听了他的演说之后才出手股票或不动产的。而多年以后，此公的言行还是被人记得清清楚楚，在2011年年初的一次电视讨论会上，有人还扯出此事：“就那位满嘴跑大舌头的主，您能指望他什么？”其实海江天大臣也是有苦说不出：当时可曾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声“不”的？

泡沫经济的发生有不少原因，这个6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当然是最大的原因，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比如当时东京出现地产泡沫，整个东京都23区的地产总价能够买下全美的土地还有富裕，这个和补充预算可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补充预算并没有在东京都内的投资项目。

一般都认为，东京的地产泡沫来源于当时方兴未艾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大批外国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公司进入日本市场，造成东京写字间严重不足。不动产商是在观测到这种需求之后，才开始在东京投资大型办公楼工程的，在一开始并不完全是盲目的投资，而是很有可行性基础的，但是到最后泡沫破灭之后，被炒起来了的地价就成为压垮那些开发大型项目的不动产公司和提供贷款的银行的一个恐怖的包袱了。

42.泡沫的根本在于大众心理

当时的大藏省理财局局长大须敏生在事后评论泡沫经济时，曾经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经济学的面目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大家评价经济学的标准是其难以理解的程度。特别是近年来起源于美国的所谓'金融工学'，更是在互相竞争其方程式的古怪和别出心裁。实际上，经济学之中有一类叫做'文献经济学'的，因为其没有古怪的公式和理论而一直被人看不起，但实际上那是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列举了文献经济学大师金德博格的《狂热、疯狂和毁灭》一书为例，说如果当年他读过那本书的话，他绝对不会同意那个补充预算。

形成泡沫经济最根本的原因是盲目的大众心理，一种过分自信的大众心理。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日本人学着造汽车，日本人造的汽车就是第一流的；日本人学着造彩电，日本造的彩电还是第一流的；那么日本人想要搞金融、搞内需，为什么就不能也是第一流的呢？

太平洋战争时，日本人有一句"英美鬼畜不足畏"的口号，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人看来，美国人是更加不足畏了，除了金融之外，美国已经没有任何领先于日本人的地方了，而美国人之

所以在金融方面还能领先，唯一的理由只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全能的日本人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罢了。

于是日本的一大批大中小企业都开始不务正业，一窝蜂地搞什么“财务技术”，就是炒股票、炒期货、炒外汇。称为“财务技术”，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技术，只要把钱投下去就行了。所谓泡沫也就是在什么都增值的时候，只要买进来就没有不能再加价卖出去的，因此进入市场的所有人都赚了，这样也就吸引着更多的人进入市场。英国有句谚语是：“没有什么比你的朋友或者邻居发了财更能搅乱你那平静的心的”，这种大众心理引发了雪崩似的正反馈，进入市场参加炒作的资金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东京外汇市场在广场协议当时还是一个实质性的市场，没有什么投机交易，也不容许投机交易。但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升值以及当时日本政府的对策活生生地把东京外汇市场变成了一个投机市场。

日本政府和大藏省为了制造对美元的需求，修改了禁止日本保险公司拥有以外汇结算的债券的限制。本来这个限制是为了减少外汇债券可能带来的风险，但现在为了让保险公司购买美元外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可是保险公司为了购入外汇债券而购买的美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对减弱日元升值的贡献其实很有限，相反，其所带来的风险则是无限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好几家日本保险公司的破产都和手头握有太多的高利率高风险外国债券有关。

往好了说，这样的政策变化叫“随机应变”，往坏了说，叫“得过且过”，其结果是东京外汇市场的专职炒家越来越多，投机性越来越强，进一步促进了日元升值。让人惊讶的是，这里面有不少是从事什么“财务技术”的制造业企业。

比如在1986年7月14日的《日本经济新闻》第一版，就有一条

这样的消息：

198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反正在这一天，日本银行在市场上开始了一场10亿美元的收购行动，想压一下日元。

然而在某银行的交易室里，看到监视器上出现了大量美元抛售的人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阪和，这一定是阪和！""阪和"指的是阪和兴业株式会社，一个大规模的商社，原来老老实实做钢铁生意，但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升值使其生意太难做了。

社长北茂干了四十年圆钢和线材的出口，对于汇率和国际市场上的钢铁价格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成为了本能的一部分。北茂社长突发奇想："咱们干吗要这么累死累活地做生意？炒钢材说不定还不如炒汇呢。"说干就干，他立即在社长室边上空出一间房间，安上监视器、电话、传真，由一名社长认为在汇率的感觉上很好的常务理事带着五个人组成了一个班子，每天从早上八点钟开始炒汇炒到半夜零点，从东京炒到纽约，每天进出的数额达到3—5亿美元。

成果也相当可观。1985年4月1日到1986年3月31日的公司决算盈利142亿日元，里面居然有98亿日元是从"汇率差价"中来的。当然，不能说阪和的汇率差价全是炒汇炒出来的，但是肯定不会少。因为不管北茂社长对于汇率有多么高明的直觉，阪和兴业在前一年由于汇率波动仍是遭受了6亿日元的损失，这在财务报表上可是一清二楚的事实。

阪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日本企业本来不太干这种投机买卖，这次居然有人干，而且一出手就是大手笔。阪和一上纽约市场，就把前一年在炒汇事业中制造业企业排名第一的西德大众汽车公司甩到了后面，在纽约市场上一炮打响。花旗银行纽约分行还专门去问日本人这个"阪和"是个什么公司，怎么来势这么猛啊？

当时有一个“六鬼闹东京”的说法，是包括阪和兴业在内的一起开始炒汇的共有六家日本公司，另外五家是山一证券、夏普、伊藤忠商事、三菱信托银行和日本长期信托银行，这几家刚出世的“小鬼”，以阪和为首，每天要进出十几亿以上的美元，比原来日本所有的商业银行做的总和还要高一个数量级。实际上，日本银行在稳定汇率方面的努力全被它们破坏了。

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是个“美人投票”的地方：这个人是不是美人，仅仅取决于是不是有更多的人认为她是美人。而这六个小鬼当时成了“民意”的代表，所有炒汇者唯它们马首是瞻，只要它们表明了立场，日本银行也就是市场上的一个普通客户而已。



43.日元升值的影响到底能不能吸收?

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件事情干起来了之后，从事此事的各方也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干这件事了，G5的广场协议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广场协议是美国人策划的一个阴谋"这种论点是错误的，虽然从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一直在升值，而日本经济也一直处在不景气中，但这个论点混淆了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并不是日元升值所带来的。

日元升值会对日本的出口产业造成困难这是事实，但是升值之后的日元也会促进日本的购买力，增加日本的消费，从一个长远的时间间隔来看问题的话，通货升值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并不大。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正常运行，在短期内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应该是能够被长期的正面影响所抵消的，而为什么就只有日本永远都陷在日元升值的怪圈里出不来呢？

前面讲过，这是因为在广场协议开始之后，日本人已经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搞广场协议了。广场协议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日本、西德等国的贸易黑字，增强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这并不是单纯地为美国谋利益，考虑到美国是能够容纳日本产

品的最大市场这一个事实，维持美国经济的繁荣、维持美国市场的稳定实际上也符合日本的利益。如果美国经济真的因为贸易赤字而崩溃了，日本经济也是死路一条。实际上，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日本就处于那种地位：虽然日本人所受到的直接坏账牵连并不大，但是美国市场的疲软使得日本经济也奄奄一息。

广场协议之后的世界经济没有发生当初所追求的变化，在改变了“强硬的美元”这条路线之后，美国人不能更耐心地容忍“J曲线效果”是一个原因，日本人没有实现最初的允诺也是一个原因，甚至是更大的原因。

李·摩根在游说国会时说“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降低15% —20%的造价”，但日本人能够做到，日本人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再绞一把干毛巾”的精神挖潜力降低造价，把日元升值所带来的在价格方面失去的竞争力吸收下来，从而保持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对于某一个企业来说，这是非常可贵、非常了不起的，人们对于日本企业的这种努力只能脱帽致敬。

但是跳出单个企业的范围，从国家间来看问题的话，结论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在美国人看来，日元的升值对日本产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影响，甚至日本产品的价格还会变得比日元升值之前更低。因此美国人永远得出一个“日元升值还不够”的结论是很正常的。日本经济学者们在预测日元走势时，经常使用美国学者对“日本能够忍受的底线到底是多少”的猜测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就是说，虽然在广场协议之前，日本政府确实做出了让步的准备，但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企业并没有做出让步，它们以令人惊叹的毅力和能力抵抗着日元的升值，绝不肯轻易放弃自己已经占有了的市场份额。除了不断开发新产品之外，日本人还以令人眼花缭

乱的速度不断开发出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来缩短制造产品所需要的材料和工时，以和其他国家竞争。日本的大企业都维持着一个金字塔形的零部件生产供应系统，里面分成一次提供商、二次提供商等不同层次。日本人依靠这种特有的零部件生产方式维持着产品的质量和产业的技术，也维持着日本社会的稳定。但是，在不断升值的日元打击下，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大企业对利润的需求，虽然各个下级零部件供应商做出了最大努力来达到每年下降一个固定百分比造价的目标，但这种努力在动辄10%以上的汇率变动面前犹如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摆在那些要死保利润的日本企业面前的出路就只有一条：转移生产据点，到工资成本低、汇率稳定的国家去生产。

将生产据点转移到国外对于日本企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过去的转移和这次的转移有根本性的不同。以往的生产据点转移一般是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是日本国内生产无法满足出口的特殊需要。比如早在1959年，专门生产拉链的YKK公司就在英国设置了生产据点，这是因为拉链生产有一个批量小、要求交货时间短的特点，将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运到欧洲无法满足需要，所以YKK早在日元汇率还是360的时候就开辟了英国生产据点。

还有一种是贸易摩擦的结果，像日本各大汽车公司在北美的生产据点都是日美汽车贸易摩擦的结果。为了缓和美国国内对日本汽车的制裁压力，各大汽车公司不得不在北美当地生产，以增加对北美人的雇佣量，并向当地政府缴纳税金。

还有一种转移生产据点的行为，是作为日本政府行为的一部分，带有国家间的经济援助性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由于太平洋战争和其他历史原因，日本

和这些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着一个战争赔偿的问题。在处理赔偿问题时，日本政府经常采取经济或技术援助的形式来取代直接的现款赔偿，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也不反对这种赔偿方式。比如日本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南越的战争赔偿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采取产业合作和人才培养的形式。战后的日韩关系史也是这样，在“历史清算”和“经济发展”之间，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朴正熙政权毫不犹豫地选取了后者，这也是一直到现在历史清算问题还是韩国政治中一个重要话题的原因。

但这次不同了，以往的转移一般都是把要扩大的那部分生产能力放到国外，对于国内现有的产能没有影响，当然也就不会影响到国内的就业率。而这次转移的是日本国内现有的产能，这样的转移直接影响了国内的就业，引起了所谓的“产业空洞化”。

生产据点往国外转移所引起的不单是显性失业人数的增加，这种趋势还使得现有的中小企业的劳动条件进一步恶化，就业人员收入进一步下降，使得整个社会都不安定了。

44.形势一片大好？

实际上认真地说，当时的日本真是“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1985年9月20日，东京外汇交易市场的收盘价是一美元兑换242日元，到了1988年1月4日，东京外汇交易市场的开盘价是121.65，两年零四个月里，日元升值了一倍。

有面对日元升值的局面一筹莫展的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但也有不少企业因为日元升值而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因为从日元的价值这个角度来看待日元升值，得出来的结论就不一样了。日元升值一倍就是日元的价值增大了一倍，各种用基轴通货美元来记述的数字也就跟着增长了一倍。

1985年，日本的国内总生产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是21150亿美元，还比不上美国的39981亿美元，但是人均计算的话，美国是16710美元，而日本是17470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日本在1960年开始进入高速经济成长的时候，人均GNP只有美国的1/6，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1/3，一直到十年后的1970年，日本的人均GNP也还不到美国的40%。而在1985年这个值得纪念的

年份，日本终于在人均统计上追上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后，“赶超欧美”就是日本民族的夙愿，在经过117年之后，日本人实现了这个夙愿。

发生“美日逆转”现象的并不只限于GNP，在国民所保有的财富方面也一样，日本拥有的资产总值在那年是109300亿美元，而美国只有102100亿美元。日本在海外拥有1298亿美元的纯资产，超过英国从而成为最大的海外资产保有国。

日本超过了美国这件事被称为“70年代的奇迹”，日本被预测为下一个世纪的领袖国家，而美国则自然成了评论家嘴里“没落”的象征。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学生生涯之后，日本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昂起头说：“我们已经没有要向欧美学习的了。”

真是这样的吗？日本人立即就发现所谓的“日本崛起”和“美国没落”仅仅是一场历史的恶作剧，只不过历史在这场恶作剧中所使用的是“数字”罢了。

撒下去了那么多钱，肯定会出现规模巨大的“内需”，因而也能带来好景气，从1986年11月到1991年4月，日本持续了长达53个月的好景气。实际上，从1986年春天之后就已经开始经济泡沫化了。从那时开始到1989年初，两年半的时间里日本陶醉在一片狂热之中。

日本泡沫经济期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没有什么很大变动，价格上涨主要反映在“资产通货膨胀”上，也就是股价和地价的狂升，从1986年开始的流动性过剩最后集中地反映到了这两样东西上。广场协议后第一个营业日的1985年9月24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平均股价是12755日元。平均股价超过两万是在1987年1月30日，而到了1989年年底的12月29日，这个数字创下了38915日元的历史纪录。那年的5月2日，东证一部的上市公司股价总额达到了500万

亿日元，占当时世界份额的45%，东京证券交易市场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

股价在这五年内上升了3倍，而地价的上升幅度还远远不止如此。

地价也是从1985年开始上升的，按照日本国土厅的地价公示，这年的地价是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的六年中第一次大幅度上升。进入1987年之后，可以用“狂乱”来形容地价的上涨了，东京的商业用地在一年中上涨了48.2%，住宅用地上涨了21.5%，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了1973年田中角荣政府的“日本列岛改造”的热潮。1988年就更为恐怖了，东京的商业用地上涨幅度达到61.1%，住宅用地上涨了68.6%，和开始上涨的1985年时候相比，东京的商业用地上涨了2.9倍，住宅用地也涨了2.1倍。

地价的暴涨并不限于东京，这个狂潮像海啸一样席卷了日本全国，到1987年底，日本全国土地的时价总额为1673万亿日元，是国土面积为日本 26倍的美国全国土地时价总额的 2.9倍。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袭击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但是也受到了很大波及的东京股市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把“黑色星期一”只当做一次偶发性的事故，凭借437000亿美元的“世界第一的国民纯资产”，凭借年平均4.3%的经济增长率，凭借“高涨的日元、低下的利率和不值钱的石油”这三件神器，东京市场很快就恢复到了事故前的水平，而且还以更猛的势头向前发展，开始了真正的泡沫经济。

关于谁是泡沫经济的元凶有很多种说法，80年代中曾根政权开始的金融自由化，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升值，从1987年2月开始一直到1989年5月的长期低利率，“黑色星期一”发生之后大藏省的会计处理缓和措施，或者是日本企业所惯有的相互持股的习惯，等等。

实际上，所有指出来的原因都是造成泡沫经济的元凶，对于把

一个国家的经济拖入黑暗隧道长达二十余年而找不到出路的大灾难来说，原因绝不可能仅仅只有一个。

但在所有这些叠加起来的复合原因中，最大的问题是日银所采取的长期低利率政策。从1987年2月开始，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日本银行听任利率停留在2.5%的低水平应该是最大的原因。

日本人不太喜欢冒险，有一种追求安全的倾向，他们历来有一种银行拜物教心理，就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银行是最安全的地方，起码在战后一直到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日本没有过银行倒闭的事例，所以人们有了点余钱就往银行里存。

在泡沫经济之前，一般的日本人并没有什么“金融投资”的概念。有钱存银行，那是正当人干的，而去捣鼓股票什么的就不是什么正经事情，属于“梦想不劳而获”，在社会上是要遭白眼的——要钱的话去工作、去做生意，干吗去搞什么“金融投资”呢！

但是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金融形势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45.借钱两万亿来炒股

笔者一个朋友的儿子从横滨国立大学拿到金融专业硕士后，就职于高盛公司从事证券交易工作，当笔者向朋友表示祝贺时，朋友的脸上却显露出很复杂的表情："不就一个株屋吗？"日语中把股票叫"株"，而把"证券公司"叫做"株屋"，实际上很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

如果那位朋友的儿子就职于某家银行的话，朋友脸上的表情可能就会不一样。在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收入虽然没有什么区别，但两者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银行职员受到普遍的由衷的尊敬，而在证券业就职就无法得到那么高的尊敬了。这也是日本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中国那种全国人民齐上阵，炒地炒房炒股票的原因。

虽然不是全民一起上，但在泡沫经济的那几年，去碰房地产和股票的日本人还是不少。欲望是一个原因，银行系统的不断降息也确实给一些人的生活造成了现实问题。

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可以说是一直在"跑步进入资本主义"，这样，日本一直处于一种资金短缺的境地，银行利率就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在广场协议之前，如果有1亿日元（大

约40万美元）左右的银行存款的话，仅靠利息收入就基本上可以维持一个说得过去的生活水平了。当然，有1亿日元以上存款的日本人还是极少数，但是一般日本人在退休时都能拿到一笔退职金，退休年金当然远不如在职时的工资，所以这笔退职金的银行利息收入也是老年人贴补生活的重要来源。

可是银行的不断降息对于这些人的生活就造成了直接的打击。在不断高涨的股市的号召下，有些脑子灵活的老人自己动手玩起了股票，其他就是自己不妙的人也无法抗拒证券公司业务员的劝诱，把钱交给那些自称“专家”的人去进行投资，从而填补因银行降息而出现的亏空。这笔原本在银行的存款进入股票市场，也是股市上扬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泡沫的过程一般就是上扬了的股市召唤着更多的资金进入其中，从而造成新一轮的股市高扬，再吸引更多的资金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

这个过程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在一个特殊的事例中，这个过程能够达到一家银行向一个私人发放了高达两万亿日元的贷款去炒股，从而在最后造成银行倒闭的荒唐地步。

那时大阪有个开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的女老板叫尾上缝，据说她能和大仙说上话，所以经常在店里预言股市的走向和赛马的结果什么的，古怪的是她经常能猜中，因为这个原因，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上这里来听妈妈桑算卦的证券业和银行业人士可不少。有关尾上妈妈桑的传说也越来越神，到最后尾上妈妈桑也真以为自己能和大仙说上话了，于是就自己动手炒起股票来。

光是自己炒，本钱毕竟有限，就有相信妈妈桑真能通神，又想提高自己营业成绩的证券商鼓动妈妈桑多找点本钱，正好也有相信妈妈桑真能通神，又想提高自己营业成绩的银行员，就鼓动妈妈桑



到他们银行去借钱。这位妈妈桑也真的到银行借了钱来炒股，在泡沫经济顶峰的1988年，尾上缝从各个金融机关借出来的钱高达2270亿日元。事后警方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当时妈妈桑还是挣了钱的，妈妈桑从股票交易中赚到了48亿日元，也不能说少。

但是也决不能算多！考虑到那是泡沫经济的顶峰时期，那时没有不涨的股票，以妈妈桑从银行借的本钱来计算的话，收益率也只不过略高于2%，说实在话，还不够支付银行贷款利息的。

银行员借钱给妈妈桑可不是什么慈善行为，而是为了提高自己业绩的，可现在不要说业绩了，连偿还利息都成了问题，本钱还不知道怎么办呢！于是，围绕妈妈桑就开始了一场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属罕见的金融诈骗犯罪。

日本有一种区域性的、仅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关，叫做信用金库，这位尾上缝妈妈桑勾结了东洋信用金库的一个支店长，伪造了这个支店的存款证书，拿到其他金融机关去换取原来当做担保押在那儿的股票或债券或者再借新债，因而这个案子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一直到最后，尾上缝在1991年8月因为诈骗的罪名被逮捕入狱才告结束。

尾上缝总共从12个金融机关诈骗了3420亿日元。一个料理店老板娘尾上缝居然前后总共从各家银行里借出来过27736亿日元，还了23060亿日元，到最后，妈妈桑在拘留所履行破产手续的时候，负债总额是4300亿日元，个人负债总额是日本历史上的最高数额，估计这个纪录会是绝响，以后不再会有人打破了。

最后尾上缝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东洋信用金库破产，借给了尾上缝巨款的日本兴业银行最后也被富士银行吸纳合并为现在的瑞穗实业银行。

这个来由以及牵涉到的数字都是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案子特别能够说明什么叫做泡沫经济，所以这种泡沫是不能持久的，1989

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股价创下了38915.87日元的最高纪录，在这之后仅仅过了9个月，就在1990年10月1日跌进了20000日元。

泡沫经济的产生及其破灭不是本书的题目，其成因也都是极为复杂的复合因素。不少人把泡沫经济的原因归结到广场协议，但起码在现在的日本，已经没有人把泡沫经济产生以及破灭的原因归结于广场协议。广场协议对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都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很有限的，泡沫经济的真正原因，是当时的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经济金融诸政策的种种失误。

无论如何，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花了二十年都没能走出那条黑色隧道。

46.神户来了一场地震

有句话叫“量变到质变”，这种汇率的变化到最后就超出了简单的通货兑换关系，从而引起了东亚和世界经济势力地图的变化。

日本人有一种追求完美主义的倾向，有过日本生活经验或是日资企业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么一个事实：日本企业在向内发表重大目标的决定时经常不是列出1，2，3，4，……而是列出1，1，1，1，……这些目标没有什么主次之分，而是全部要达到的目标，一个都不能少。

在日元汇率上，日本人的做法也是这样，追求一个无法成立的完美。也就是说，日本人在接受“日元适当地升值”，试图享受购买力上升的同时，却不肯付出因为日元升值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所有的企业都不想放弃它们拥有的市场份额，在受到因为汇率变化而带来的价格竞争力下降的压力时，它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对内挖潜降低成本，对外转移生产基地，采用更为廉价的配件或者干脆成品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在广场协议之后的十年中，日本企业就是用这种方法熬了过来，虽然这种熬日子的结果，是除了那些接受了日本转移来的生产

基地的国家在财政税收以及社会就业率这些问题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利益之外，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

当1995年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突然天崩地裂了。

那是真正文字意义上的“天崩地裂”，1995年1月17日黎明5点零7分，一次7.4级的大地震袭击了神户，震中在神户边上的淡路岛北部，震中深度16公里。死亡人数6500人，伤者上万，是日本现代史上仅次于1923年死亡人数为14万人的关东大震灾的地震灾害。

地震之后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日元升值。但这次的升值原因和通货黑手党们的举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次的日元升值是日本特有的保险制度诱发出来的。

起码在当时的日本有一个“一亿总中流”的说法，确实，日本社会的贫富悬殊确实几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即使日本社会的贫富悬殊已经增加了不少，但现在日本的贫富悬殊也还是很小的，所以，在自然灾害多发的日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份很可观的保险。一发生自然灾害，日本的保险公司就面临着理赔问题，而阪神大震灾所造成的估计损失大于100亿美元，为此，保险公司需要付出的理赔金额大于30亿美元。因此它们不得不抛售手里持有的外国有价证券来换回日元现钞，而那些通货炒家们看准了“现在的日元升上了天也有日本人来接单”这一点，在通货市场上和日本人一起抢日元，这就形成了新一轮的日元升值，本来日元汇率在1994年就进入了100，在受到了这个外来突发要因的刺激之后，日元汇率立即展开了一轮新的涨势。结果，在三个月之后的1995年4月19日，日元涨到了79.75这个历史性的数字。

这个问题当然成为日本最紧迫的话题。但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日本人自己已经无法估计日元将来的走势了。所有的日本经

济学家所估计的根据都是出自“美国人的估计”，而这里的“美国人的估计”居然不是对市场供需关系平衡的估计，而是美国人对于“日本企业能忍受下来的最后价位”的估计！那时一般估计那个价位是75。此时的日元汇率因为当时的局势已经完全离开了政府的控制，而仅仅取决于已经控制了市场的那些投机家们的意向了，而投机家们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在不玩死日本企业的前提下，从日本企业身上尽可能地榨出油来。

投资家们并不是上帝，先不说他们所测算出来的75日元是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是不是任何行业的日本企业都能够忍受这个汇率？问题在于，即使日本企业能够忍受这个数字，日本企业也没有必要或义务去忍受。日本企业应付这个汇率的对策还是这段时间一直在使用的最有效的武器——向地租、劳动力价格和税收更为低廉的国外转移生产基地。

这一次的转移规模比以往要大得多，那时，作为日本的主要产业转移目的地的东盟四国已经无法容纳这次日本产业要转移的那部分了。有一点很关键的因素是，这次日本企业需要转移的那部分产能的内容也和以往有所不同。以往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产能的目的主要在于盈利，因此所转移的那部分产业对于企业员工技能的依赖性比较小，都是一些自动化程度较高或者内容简单的作业，零件本身的生产还是在日本本土依靠技术技能水平较高的日本工人进行，这次的转移已经不仅仅是出于盈利，而是企业本身能否继续生存的危机。此时日本转移的产能已经开始包括产品零件，甚至一些很重要的产品零件。

此时，能够为这些急于向国外转移产能的日本企业提供场所、工人以及其他条件的就只有中国了。

中国不但拥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在地理上容纳下日本的这些生

产基地，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人力资源的优势。这种人力资源并不是说“中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这个简单意义，而是说中国有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

当时的中国虽然还很穷很落后，但有一个很成功的教育体系，尽管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很落后，但是已经普及了初中等教育，不要说文盲，就是完全不知道“三角函数”、“分子式”等概念的年轻人也已经不多见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给中国所带来是贫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看到的世界使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急切地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中国人的劳动意欲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中国能够满足对劳动力基本素质的要求。

47.时来天地齐努力

当然，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是不是有地方来容纳那些要转移的生产基地，前面也指出了中国有足够的潜在质量很好的劳动力资源。但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人”，或者说“有经验的人”来满足这一次的产业大转移呢？

应该说还没有。这次日本企业所转移的很大一部分跳出了组装的范畴，牵涉到了制造业的基础部分，也就是机械加工，比如被称为“mother tool”（工具之母）的模具产业就属于这一块。这部分产能一直对从事生产的工人有很高的技能要求。根据制造业的传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车床工、刨床工和钳工。

培养合格的车工、刨工和钳工十分困难，原来要培养一名能够独立操作的机械工人起码要5年以上的时间，而要培养一名能够独当一面，根据图纸来确定加工工艺及流程、制作所需要的特殊刀具的机械工，没有10—15年以上的磨炼则根本就不可能。

而当时的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农业国，制造业基本上集中在一些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源并不是十分富裕。要在未来的中国制造业中挑大梁就只能指望那些从内地的大山里走出来

的农民，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那一个特殊的阶层。

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中间，在从家乡出发准备去沿海城市之前，连火车都没见过的其实并不在少数，更不要说各种机械设备了。这些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能不能立即把那些从海外转移到了中国的产业承担起来呢？

1995年，还是另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份。在那一年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95”操作系统，宣告了计算机历史或者制造业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本来，IBM公司在80年代初期所发表的PC的开放性系统结构就开创了一个“个人计算机”的时代，把计算机从大学或者研究机关的实验室里解放到了一般的办公室，Intel的8086芯片被IBM选来作为这种个人计算机的CPU，而Intel则更进一步弄出了个mother board（主板）的开放性结构概念出来，把原来需要单个调试的东西弄成了一个模块、一个黑盒子，黑盒子的中心是它的CPU，其余全部为开放的。而Intel在为这种系统结构提供主板的同时采取了最缺德的（从IBM的观点来看）的一招，把主板的生产放到了台湾。洪水般的廉价台湾主板淹没了全世界，使个人计算机成了围绕着主板转的、是个人就能装配的东西，甚至就连在一段时间占全世界计算机产量50%、产值80%的计算机巨人IBM，到最后也很郁闷地发现连它自己都被台湾主板冲出了个人计算机市场。

个人计算机硬件的价格泡沫化还不是计算机历史上的大革命，使用计算机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使用，是微软的“Windows 95”操作系统才真正把计算机给彻底泡沫化了，无论什么人都能在短时间内学会最基本的操作。

这个计算机革命也给了急于转移生产基地的日本企业们一个机会。这时候出现的空前的IT革命和计算机泡沫化，使这一切都变了。

廉价的计算机让原来一直驻扎在大企业的数控装置成为了可以普及的东西。数控的理论本身非常简单，但在没有通常被称为CAD/CAM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的支持时，仅靠手工编制数控机床的运行命令是一项足以使人神经错乱的工作。即使在有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之后，由于这些软件高昂的价格，在数控机床问世以后的多年里，使用数控机床进行加工也始终无法推广。

但这次和泡沫了的微机一起到来的，是空前的CAD/CAM软件的盗版浪潮，像CATIA，ProE，UG这些本来动辄几十万美元的软件产品，在中国只要花不到十元人民币就能买到，这样就令为数控机床编制操作命令成为非常简单的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数控机械进行加工对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不太高，只需会按按钮就行了，原来培养一个熟练工人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现在随便从哪个大山深处走出来的乡下孩子，哪怕他从来没见过电灯都没关系，有个把月的时间，就足够教会他认清所有的按钮和按动这些按钮的先后顺序了。即使学会使用各种CAD/CAM软件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一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在一个月之内肯定能掌握最基本的应用方法。实际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整个机械加工行业来说，在中国数控机床的普及来得更早更广泛一些，其原因就是因为廉价的个人计算机和几乎免费的CAD/CAM软件。这样，各种廉价的数控产品，从数控铣床到数控电火花加工机，像浪潮一样席卷了中国，虽然在加工质量上和加工精度上稍微差一点，但作为一个从这里起步的前进基地，这就完全足够了。

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个大的技术进步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信息的流通"。从计算机、互联网一直到移动通讯技术，这些技术革命都使原来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时间才能完成的发展制造业

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变得简单了。这样，作为一个极有潜力的、能够容纳日本所要转移的那部分产能的地方，除了以上这些硬件条件外，中国还有地理上距离近、使用汉字、是儒教文明的国家等等极有吸引力的人文条件，对日本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这样问题就变成了：有着空间资源和人力资源，有地理之便，并且由于IT革命而轻而易举地具备了成为制造业基地的中国，本身是否愿意接受日本的这部分产能，从而帮助日本企业对付日元升值而带来的那些问题呢？



48.中国的发展战略

也正好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引进国外技术、资金和经验走到了更为深化的阶段。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中央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虽然这个战略的名字后来变了，但主要内容一直没有变化，那就是：沿海将近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在战略上应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沿海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品。

（二）将资金、设备和产品销售放到国际市场上，即从国际上进口设备、原料、材料，引进资金，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随进随出。

（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生力军甚至主力军。这就是说，充分强调乡镇企业的作用，通过乡镇企业这种形式，走出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把沿海地区农村的大量劳动力，转入外向型经济，转向国际市场。

（四）为适应这种转变，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中的统一收购、统一出口的做法。凡能从事外向型生产的单位和企业，或从事进口、出口的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总之一句话，就是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

有人后来如此回忆说："提出这么一个战略并能够实行这样一个新的方针，首先是有国际的机遇。因为国际经济结构出现了大的调整。本来，随着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和劳动费用以及环境意识的提高，一部分劳动密集、污染环境的生产会转移到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去。这一过程其实一直在进行。二次大战以来，就是这样滚动式的转移。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在世界范围也好，在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错过了好多次机会。"

日本制造业发生这种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正好此时的中国沿海地区又具有利用这种机遇的条件，需要的只是去除思想上、规章制度上的障碍，有适当的政策去引导。

而且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想法，这是自然产生的趋向。

往往有人把广东珠江三角洲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搞"三来一补"（即利用国内现有的设备和劳力，来样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作为这种对外贸易的开端，实际上，广东这样做还要早很多，在60年代初就已经有了，那时候叫"周转外汇"制度，不同的

是，那时的外汇只给地方，不给企业。

原来国内有些地方之所以不能生产出口产品，常常是因为没有好的原材料，产品出不去或者档次上不去。如果能进口原材料，就可以生产出口产品赚外汇。在60年代广州市就向中央打过报告，提出把外贸搞活，以进养出。在外贸部长叶季壮的同意下，广东实行外贸包干，比如，给广州市若干外汇作为周转，它可以进口原料再加工出口，即以进养出。这样一年可周转多次，赚来的外汇，地方分成。60年代初广东经济得恢复比较快，实行了这种做法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从改革开放以后的1981年开始，广东就已经开始搞“三来一补”了，说穿了，这是轻车熟路而已。一开始是香港商人到东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试行“三来一补”，然后再逐步把生产设备和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其他地方。除了广东之外，福建、山东、浙江、江苏也都开始实行这种做法。

改革开放几年来，沿海地区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但从整体上作为一种战略使沿海地区更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发展，是在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之后的考虑。这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长期观察、思索、研究得出的认识，是改革开放十年经验的启示，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沿海经济的需要。

这个“沿海发展战略”和当时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观点很相似。但除了都要更多地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之外，沿海发展战略和“国际大循环”观点还是不一样的。“国际大循环”是主张中国发展轻纺商品出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用以出口，换取资金，换取设备，就是先进行资金积累，然后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等基础工业。这个设想实际上还是一种自力更生思路的延长。

而沿海发展战略则是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素质好、交通方便、信息灵通，人们竞争意识强、反应灵敏，而且有一定的基础设施、轻纺工业生产能力比较大的优势，直接把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分离出来，向所谓的“四小龙”看齐。当时提出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沿海地区一亿到两亿人口推向国际市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流和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同时从国际市场取得原料和生产资料。

49."姓‘社’还是姓‘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只是在想方设法地提高自己经济建设的效率，试图通过“出口创汇”换来一些硬通货，从而能够得到一些中国建设所需要的物资。还并没有想到要跻身于世界市场，做一个同等的参与者。但是这些初期的实践所得到的经验也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优势，中国是可以通过贸易来以己之长补己之短的。中国还穷，但穷也是一种优势，穷国劳动力便宜，国际竞争力就强。起码中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闭关自守，不融入国际市场、不通过国际贸易来扬长避短，那么这个国家必定落后，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所以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中央还是通过了这个战略，并且开始在全国实施。这个战略提出以后，在包括日本、东南亚、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以至美国的国外政界、经济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大家都把这个理论解读为中国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信号，而且认为这样一个战略必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给予比较肯定的评价。国内也有很多人表示赞成，邓小平看了沿海战略的系统材料后不但非常赞许，还在批语上写



了这么一些话："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在中国，不管是什么时候，也没有人反对过搞"出口创汇"，甚至连开口就念"唯生产力论"紧箍咒的江青都不反对，因为江青也知道外汇是好东西，她所消费的那些高档舶来品只有靠外汇才能买得来。但是这个沿海发展战略已经超越了"出口创汇"的概念，所以反对意见很多，比如有人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人这么多，和所谓"四小龙"就不是一个等级的，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得出去？还有人认为，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强调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怎么靠乡镇企业出口？至少是应该组织大企业集团，搞高精尖的产品出口才对。也有人认为，沿海已经发展得比较好了，差的是内地。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沿海，是不是会扩大不平衡？甚至干脆说发展沿海是锦上添花，为什么不雪中送炭？

说穿了，就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效果一直不好，费力大、收效小，除了经济体制自身的原因之外，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最常见的就是把自力更生精神绝对化和泛政治化，导致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和搞国内平衡成为一种"政治上正确"的东西。实际上当时被绝对化了的口号除了自力更生之外还有不少，现在看来都很可笑。比如一说种田就是"以粮为纲"，谁种植其他的经济作物就要冒"反对以粮为纲"的政治风险。

19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对外贸易是无关的，而且还强调"不搞无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从原料搞起。首先找矿、选矿，再搞焦煤，再修铁路，然后炼铁、炼钢、轧钢，再造各种机器设备。但由于国产铁矿石品位不高，而且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要从很远的地方运送原料。这样一个炼钢厂周期长、建设规模

大、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也慢。

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直接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品位高、价格便宜的铁矿石，船运也比国内的火车运输便宜得多，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经济效益。后来甚至有人干脆从后面搞起，先搞轧钢，用进口的钢锭轧钢，立即就能得到经济效益；再利用销售之后回收回来的资金往前搞炼钢，炼钢用的生铁也是从国外进口。这样建设周期短、资金回收快，见效快。

化纤行业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前，“的确良”之类的化纤产品都属于高等衣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凭票供应，中小城市以下就很难看见了。这是因为要搞化纤，就得先有石油，再炼油，有了原料之后才能抽丝，做成衣料是在整个生产环节的最后面。后来有些化纤厂，像江苏的仪征化纤厂，就干脆从抽丝开始，由后向前搞，这样很快就建了起来，有了收益。

那时候，这些现在看来非常正常的做法都是属于离经叛道甚至大逆不道的行为。在当时的一些人眼里，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一元化世界，人们只能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之间选取一样，也必须选取一样。所以在他们那里，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至于孰姓“社”孰姓“资”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已经搞了那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些离经叛道的做法肯定姓“资”。

在事过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已经吓不倒人了，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还是一件很有威慑力的武器，不说每次在祭出这件法宝的时候肯定能够战无不胜，但最起码能使对手手足无措。

因为“姓‘社’姓‘资’”这个并非在抽象地讨论是否应该引进外资、提高效率时才存在，这个问题最频繁地跑出来是在讨论外

资实务的时候，随着外资不再是小打小闹地来到中国试探风向，土地、劳动人事关系这些在计划经济之下根本就不能称之为问题的问题，切切实实地放在了中国人面前，姓“社”姓“资”被问得最多的时候往往是在这些问题上。

最后，是邓小平亲自出面平息了这种毫无生产性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算停止了争论。

50.停止争论之后的中国

邓小平一直给人一种实用主义的印象，主要来源可能就是那个有名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应该说，邓小平的总体思路是“不争论，大胆地试”，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在大胆尝试的进程中，姓“资”姓“社”的问题更多地留给社会发展本身去回答，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当时的中国能够选择的不多，时间就更少了。毛泽东曾有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实际上真要只争朝夕的事例是很少的，但是这次因为毛泽东自己发动起来的“文革”把国家弄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邓小平是真的产生了只争朝夕的危机感。

这个姓“资”还是姓“社”的死扣一旦解开，市场化的大潮便不可遏止。中国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现在的日本人离开了“Made in China”是无法生存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人。到现在，日本市场上所占份额巨大的中国产品早已从衣食用品扩张到了其他几乎是匪夷所思的制品上了，比

如，现在连日本的墓碑都有80%是中国制造的，从石材的开采到文字的雕刻，可以说如果离开了中国，日本人无法下葬了。

一开始当然不是这样的，在最初日本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生产基地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付日元升值的对策。一来为了降低日本产品的成本，二来为了减少日本的对美出超，因为从中国口岸运出去的东西就算是中国出口的，和生产那玩意儿的是索尼还是本田没有关系了。

这种现象同时反映在中美贸易和中日贸易的数字上，1985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只有42亿美元，1990年是150亿美元，增幅大于三倍。这种增长趋势在1995年之后表现得特别明显，1995年中国对美出口为485亿美元，而1999年则跃进到了700亿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半。这是因为日本企业真正开始大规模进出中国是在1994年，即日元汇率进入了100之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5年日本的直接投资达到75.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第三大投资方。

同时中日贸易构造开始变化，发生了所谓“逆输入”现象，就是日本企业进口转移到中国的生产据点生产产品的现象。在1996年，日本对中国发生了190亿美元的人超，中国开始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入超国，按照日本贸易振兴会的推定，日中贸易增加额的一半左右是这种“逆输入”。

日本的对美出口和对华出口从一开始就是截然不同的。在日本的对美出口产品中，最终消费产品要占到25%，最终机器设备要占到20%。剩下的55%才是各种原材料以及零部件，而在日本的对华出口中，最终消费产品只占5%，最终工业机器设备占25%，而其余的70%都是各种原材料以及加工组装用零部件。三菱UFJ银行的研究对于日本的对华出口的定义是这样的：“日本对华出口的大部分是原材料、机器设备和零部件，可以说，这反映了日本把中国作为生产基

地，向其出口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帮助中国扩大生产能力”。

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比例构成中，最终消费品、机器设备和其他零部件这三类居然保持了各自大约三分之一的均衡。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的工厂”的原因。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工厂，也没有必要去讳言在不小程度上还是血汗工厂这一个事实，但是中国经济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彤在《谁妨碍我们更加富有》中曾举过一个实际上有点心酸的例子：1979年邓小平率团访美时需要备用金，从全国才调集了5万美元，而现在，虽然中国的人民币在理论上还不是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但任何人都随时可以从银行里兑换出两万美元以下的现钞了。要知道，中国大陆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两万八千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了。

现在有人不屑地说：“所谓外汇也就是一张纸片。”可是仅仅就在二十年前，无数的人为了那张纸片，冒着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钱被没收充公的危险在中国银行门口从小贩手里换几十个美元去参加TOEFL、GRE考试，去缴纳国外大学的申请费用。1987年，笔者所在的单位批来了40万美元引进程控交换机，那可真是一个大工程，从一把手就开始重视，开了无数次的论证会议，和几乎所有的程控交换机厂家在中国的代理处进行了无数次的谈判，就为了这重于泰山的40万美元。现在，倒不是说40万美元轻如鸿毛，但它绝对不是一个能吓唬人的数字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谓外汇绝不是一张简单的纸片！

日本经济从1992年开始就几乎进入了冬眠时期，即使有点上下波动，名目GDP也一直在480万亿日元到500万亿日元这个范围内反复，从1992年的480.7万亿日元变到1999年的470.9万亿日元。同期，中国GDP增长了15倍。

在1985年广场协议的时候，中国虽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

事国，但在经济上还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国家，只有那些最富有想象力或者想通过剑走偏锋来博取注意的人才会在谈论经济时想起中国。现在呢？不管是那些当年G5广场协议的当事者，还是后来参加进来的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而组成的G8，在谈论有关世界经济的任何问题时，都无法绕开中国。

51.不能再来一次了

2011年3月11日，强烈地震再次袭击日本列岛。1995年阪神大地震是7.3级，而这次是9级，要知道，地震烈度每增加一级，释放出来的能量就要增大30倍。

阪神大地震的时候真正受灾的只有神户市，而且神户市的西区和北区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这次地震光5级以上的就有青森、岩手、宫城、秋田、山形、福岛、茨城、枥木、群马、埼玉、千叶、东京都、神奈川和山梨等地，几乎是日本本州岛的四分之一。

这场东日本地震对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受阪神地震影响的神户市本来就不是一个工业城市，受打击的大企业只有神户制钢所。但这次东日本大地震则直接袭击了东京周围的两大工业地区：以千叶县的千叶市为中心，面临东京湾的“京叶工业地域”和从东京到横滨的所谓“京滨工业地带”延伸出来的包括埼玉县、群马县、枥木县和茨城县的“北关东工业地域”，这些地区是日本的钢铁、化工、石化、汽车和半导体产业集中的地带，这些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是日本在国际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那部分。

但这次地震使得日本人在短时间内失去了他们产业界的很大一

部分产能。据统计，在短时间内丧失100%生产能力的有：发电机组、线材、高级单反照相机、高级光学镜头、计算机硬盘铝制底板；几乎100%受损的有：汽车、磁记录媒体；一半以上的生产能力受损的有：半导体硅园、喷墨打印机、汽车轮胎以及其他汽车配件。

和阪神大地震之后一样，这之后立即开始了一轮日元飞速升值。有了阪神地震的榜样在先，这次更多的炒家加入了抢购日元的行列，阪神地震三个月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才创下79.75日元兑换1美元的最高记录，而这次地震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日元已经飙升至81，开始向历史最高纪录逼近，四个营业日之后就上升到了76.25，再创历史最高纪录。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的结果是日本企业纷纷采取了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以抑制成本，维护其价格竞争力的对策，而阪神大震灾之后急速的日元升值，更是将这个对外转移的流向从主要是东南亚各国转到了中国大陆。

从广场协议之后一直到阪神大地震这段时间内，日本企业转移生产基地的行为基本上是出于纯粹经营上的考虑而采取的企业行为，而从中曾根康弘政权开始表现出来的自民党执政能力的下降，也使得日本人没有考虑过这种转移行动会产生改画世界经济地图的后果，而政府基本上对企业的这种行为没有进行过任何干预，几乎是放任自流的。

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这种“不干预民间的企业行为”政策的后果之一是，促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管中国人怎么看待中国在这近二十年内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也不管以上的说法是否有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相信以上说法的西方人很多，几乎可以说，西方人的共识就是这样的。中国由于其社

会制度和人种区别，在西方人眼里成为“异质国家”是很正常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信徒是很多的。

所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日本企业继续向中国大陆转移生产基地是很不合适的，尤其考虑到现在日本本土所剩下来的那些产品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这个事实。所以第二天，G7的财长经过紧急磋商后，开展了共同抛售日元，购入美元以稳定汇率的干预市场行动，把日元的汇率稳定在了81左右。

实际上，认真说来，即使在经济方面，日本也一直是被其他那些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国家认为是“异质”的，不仅是美国，其实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认为日本市场是一个封闭的、排他的市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巨额贸易出超都很不满意，起码对日本一直在抱怨的导致日元升值的压力方面，西方国家没有和日本相同的意见。可以说，西方诸国联合起来保卫日元这还是第一次。

这并不是因为日本遭受了大地震的打击而使得西方各国起了恻隐之心，日本确实遭到了地震的打击，而且很大，但还没有到不能再起的地步。而且单单就汇率本身来说，经过广场协议之后26年的磨炼，日本人在对高汇率的忍耐力方面强了很多。和1995年相比，日本企业已经并不觉得汇率高于80是一个什么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可是，在1995年时，眼看着日元不断升值而袖手旁观的西方各国回想起了阪神大地震之后，亚洲经济地图所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变化。它们认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体是那一系列变化的最后结果。所以，这次的地震之后所发生的日元升值会不会再次重新改画亚洲经济地图，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内容。这才有了这次这样罕见的团结一致的行动，广场协议26年之后，盟国再一次采取了联合行动来保护某一国的通货。

在它们看起来，这次的东日本地震危机比上次阪神地震更加使

得西方世界面临一种危险，因为这次如果再次发生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其结果将会使那部分还在日本国内坚持生产的“only one”的产品以及技术含量高、工艺复杂的部分也转移至中国。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制造业的安全问题除了制造业的环境之外，还有一个制造业本身的安全问题。

这次的日本大地震暴露出了一个全球制造业的环境安全问题：重要零件放在一个过于拥挤的地区之内生产是不安全的，更不要说，这个地区在地质自然条件上本来就不安全。然而，将这个本来就不够稳定的地区内的产业分散转移，又会引出其他的担心：这种转移会不会把一种地质上的不稳定换成了一种国际政治上的不稳定？



52.广场协议的意义

广场协议已经过去了25年，其长期效果或者说最大的历史贡献，应该是对亚洲经济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比如，1985年泰国的人均所得只是850美元，但到了1997年则是3000美元，十年内翻了三倍半。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广场协议使美国确实起到了吸收剂的作用。二次大战之后，虽然美国和苏联都号称是超级大国，但是苏联没有经济能力，因此从经济上来说，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甚至，直到今天，任何国家要“发展经济”，指的还都是在美国市场上出售更多的东西，来换取更多的美元。而里根经济学时代的美国就给亚洲各国，主要是东亚各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市场，美国依靠异常强大的美元，帮助东亚各国实现了出口增长的目标。

但里根经济学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东亚各国的出口增长没有什么切实的能够继续的理由，美国随时可能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来限制进口东亚各国出口主力的纤维、鞋帽和服装制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亚各国的经济形势实际上是很不稳定的。

但是广场协议有效地抑制了美国国会中的保护主义倾向，G5的

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都在声明上明文写上了“抵抗保护主义”的字样，这样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出口市场，使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亚各国能够继续向发达国家进行出口。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急剧升值，使得虽然缺乏政治力量但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日本人摸索出来了对抗日元升值的方法，也就是向国外转移生产基地。而广场协议中有关抵抗保护主义的条款，又使得其他包括美国甚至日本本身在内的发达国家不得不容忍和接受这种方法。

在应付阪神大地震前后的日元升值时，很自然地，习惯了这种方法的日本人把更多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各方面条件都比东盟国家更好的中国。

这样带来的是亚洲和世界经济地图的重新划分。

这种世界经济地图的重新划分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发展的机遇，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借助这个机遇，有了能够容纳由于农村经济改革而富余出来的上亿单位的农村劳动力的场所。而正是这些原来的农民的辛勤劳动，他们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才铸造了一条通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阶梯。

这句话会让人想到“血汗工厂”这句话，笔者不是在这里为“血汗工厂”唱赞歌。经常有人问笔者知不知道什么叫“血汗工厂”，笔者坦然地回答：“知道，甚至比你们知道的更多。”因为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血汗工厂”。

实际上可以说，在华日企以及为日企配套的工厂里没有能够称得上“血汗工厂”的，台资和港资企业中有，坦率地说，所谓“血汗工厂”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自己开的。

笔者之所以在博客和其他地方，不遗余力地反复提过劳动分配率和所得税问题，正是因为笔者曾经看到过，在相当多的中小企业

中，老板和员工的收入差距实在拉得太开。这种收入差距不仅在抽象的道德上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目标，在具体的技术上也成为了阻碍技术进步和产业更新换代的严重问题。整个社会必须重视这个问题，想出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三十几年来的成果有可能会毁于一旦。

但这又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即使是那些真正的血汗工厂，在一开始也不是血汗工厂，现在经常能够听到的："在XX年中，公务员的工资涨了YY倍，而农民工的工资只长了ZZ倍"这句话中，就能够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如果再回到那个YY或者ZZ之前，农民工的工资并不低。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在那些血汗工厂，而在于其他的社会环境，而现在必须立即开始整顿这个社会环境，其任务十分急迫，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了。

这种经济地图重新划分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中国制造业学来了技术。经常能看到有人慷慨陈词，批判“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但笔者可以很不客气地说一句：“那些批判家们，没有一个是搞制造业的”，全是一些连制造业的现场都没去过的职业评论家们。因为笔者从来没有听过制造业的工程师在批判这种说法的，谁懂制造业，是评论家还是工程师？答案不言而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确实能够生产不少东西。但那些批判家们从来不去说明一下那都是什么样的东西。美国人在二次大战时期转让给苏联人的30年代的卡车技术，中国一直使用到了80年代。在外企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些设备、加工技术、测量标准和工艺流程，让制造业大体还停留在50年代苏联水平的中国大开眼界。这三十年下来，中国制造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中国的制造业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有人在发“中国还没有制造业，所有的只有加工业”这样的牢骚，而且这种牢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

事实。但起码我们能说，中国已经知道了制造业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了世界最先进的制造业是怎么回事。中国制造业在不少方面还很落后，但我们已经知道了落后在哪里。

最根本的一条，是中国人知道了制造业的重要性。这些年来，已经听不到“我们能设计出来，但就是造不出来”这种类似于黑色幽默的荒唐话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道理，只有制造出来了之后，才能证明这个设计不是闭门造车。

53.广场协议和中国

广场协议给了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而极具政治智慧的邓小平又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使中国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现在有一个经常在使用的词叫“双赢”，但在实际上双赢的局面出现得很少，起码在外贸上所表现出来的入超和出超就是一个完全的零和关系，一个国家的入超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出超，不会存在什么双赢。像美国那种能够利用美元作为基轴通货的地位吸引美元回流，以填补其预算亏空的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长期的慢性入超都是致命的问题，历史上因为贸易问题而爆发过的战争不在少数。所谓争夺殖民地、争夺市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贸易是入超还是出超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起码在大国之间达成了这种共识。不仅如此，在各盟国集团内部还形成了一种出让一部分主权，采取共同行动来维护共同的利益。广场协议就是这种行动的一个例证，它触及了原来一直被认为是主权核心部分之一的通货合同或政策。

但是人永远只是人，不是全能的神。即使人们确实是在策划阴

谋，这个阴谋能否实现也还得打个问号。更不要说，在阴谋实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无法预料的因素有可能完全把事情的发展导向一个当初根本预想不到的方向，所以，用阴谋论来述说或者解释历史和历史事件只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方法。

广场协议的整个过程及其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里面没有什么阴谋论。实际上，只是几个通货黑手党想要扭转美国巨额国际收支赤字的努力，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一连串不可控事件的发生，加上一连串错误，带来的是一次世界经济地图的重新划分。

广场协议已经过去了25年，在25年后的今天，无论对当事国的美国还是日本去做一个问卷调查的话，可能大家都愿意回到25年之前，甚至打点折扣都可以，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只有一个方向，其方向谁也无法扭转，人们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吸取一些教训，以避免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

有这么一句话："从自己的过失中吸取教训的是聪明人，从别人的过失中吸取教训的是更聪明的人。"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并不只是一个无法搬家的邻居，也不只是曾经打过仗的敌人，甚至都并不仅是现在的竞争对手。日本是一个和中国在文化上极为相像的国家。无论有多少人试图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找出不同点，但最后的结论肯定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太相像了，相像到了这两个民族喊出的所有口号都可以在对方找到同类项的地步。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在中日交往的绝大部分时间中，是日本在学习中国。但进入近代之后，特别是甲午一战联合舰队战胜了北洋水师之后，日本人反过来成了中国的老师。众所周知，像从"政治"、"民主"到"物理"、"化学"这些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根本就无法离开的单词，都来自日本，有时候，甚至连书籍的标题都得向日本人学习，像1981年有两个日本人写了一本《日本可以说"不"》的书，十

年之后有几个中国人也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

但是我们是不是连日本人犯过的错误也要向日本人学习呢？

现在的中国经济和广场协议时候的日本有很多相像之处，都是在国际贸易上拥有巨大的出超，通货受到升值的巨大压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的中国所面临的局势可能比当时的日本更为严峻。1985年的日本是在开始高度经济成长的25年之后，经济发展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而且战后日本开始经济复兴之后，对劳动分配率比较重视，基本上实现了不过分拉开分配差距的经济增长，所以，日本社会是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采取某种调整措施，即使这种调整措施会带来一定的痛苦，也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

在国际经济上，日本有一个以产品出口为主要经济动力的国家形象，但实际上，日本经济中出口所占的份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日本的出口占GDP份额最高的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前的时候，日本的出口占到了GDP的25%。二次大战之后，日本的出口经济所占GDP的份额一直都在20%左右。本世纪初期，日本发生以山一证券破产为代表的金融系统危机的时候，这个比例曾经达到过24%，现在又回到了20%左右。当然，现在统计的这个比例并不能充分反映实际情况，因为有大量的出口额被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额掩盖了起来。

而中国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的统计，中国的出口已经占到了GDP的45%，这个比例实际上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这种巨大的出口造成的巨大出超带来的巨额外汇贮备，不仅在国际上使得中国像80年代的日本那样成为批判的对象，也给人民币带来了巨大的升值压力。

中国在这种压力面前处于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人民币升值会

使央行所拥有的资产缩水，会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价格竞争力。而且，在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时，中国企业都无法使用日本企业的转移生产基地的招数，因为不少中国的出口产品的知识产权并不掌握在中国企业手里，仅仅是在中国国内装配或者生产，中国所得到的只是加工费而已，一旦再次发生转移，连那部分加工费也将失去。但是，如果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话，由于外汇储备所带来的通胀压力也是巨大的。



54.结语

中国需要一个正常的国内市场，那种不是由巨额的公共开支以及国家项目或者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所构成的正常的国内市场，现在那种千军万马做出口生意绝不是正常现象。

实际上，现在的出口热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内的经济环境有关，国内在许多经济法规的立法以及执法方面的力度欠缺，使得企业只要能够做出口就决不做内需，哪怕做内需在名目上比出口更加盈利也没有吸引力。因为做出口从外国企业那里拿来的那点利润虽然是蝇头小利，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国内企业在有关支付方面的信用以及实际操作使得一般的中小企业无法加入内需的生产行列。

东方文化是一种节俭的文化，所以东方国家的储蓄率都比较高，中国人也是这样。储蓄率如果过高是会影响消费的，但如果只是片面单纯地提倡消费将不会有任何效果，中国人的储蓄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现实因素让中国人收紧钱包，不随便花钱。

广场协议二十几年之后，日本人才认识到了其实在当时，除了大搞房地产和政府公共开支之外，日本还有另外一条拉动内需的选

择，那就是充实日本的社会福利。

可能有人以为日本的社会福利不错，实际上不是这样，日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低的，因为日本的税率也最低。这种低社会福利的来历除了日本人有着东方式“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传统思维方式之外，和日本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还很短暂也有关系。但这种制度不管是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为战争服务，还是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期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不存在就业问题。长期的战争，使得人均寿命很短，“老了以后怎么办”似乎是一个遥远的问题，但进入了和平发展期之后，这些问题都显现了出来：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老年人的生活问题，再加上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期，人们还得担心失业问题等等。指望日本人敞开了用钱，首先得加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让日本人没有后顾之忧才行。

在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全国找内需的运动中，没有人想到这实际上是拉动内需的最大障碍，反而在美国人的要求下实行了一系列的减税。一直到泡沫经济崩溃，出现严重的消费不足现象之后才有人发现，如果没有有信用的安全网，无论提出日本人拥有多少金融资产或者平均每户拥有多少储蓄都无济于事——不到万不得已，日本人不敢动用储蓄，“坐吃山空”是东方人共同的祖训。

或许是作为过来人的经验，日本人在2005年左右就对中国提出了“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未雨绸缪，先花钱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事业”的建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相对于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保险方面所做的还很不够。尤其是现在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基本上都是面向所谓“城镇户口”的居民，真正担负着这个国家经济的那些进城的农民工们，完全没有或者只是很少地享受到了社会保险，这首先是个社会公平问题，然后是一个社会取向问题。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的构成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原来的那些城镇户口群体会逐渐减小，取而代之成为城市中最大社会群体的将是这些农民工，他们也将会构成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因此中国消费的未来取决于这些农民工的收入以及他们的消费趋势。

在现在，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广场协议确实引起了日元升值，至于是否引起了日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日元升值、日本泡沫经济是否与广场协议有关这两个问题，现在的学术界一般都是持否定态度。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切的起因都是从广场协议开始的。

因此，在回顾广场协议以及后来事态发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态在中国发生，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要认真整顿国内的商业行为，制定和严肃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打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和流通的金融环境，从而促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参加到和内需有关的生产活动中去。

认真做好调整劳动分配率的工作，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农民工们能够分享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成果。同时加强社会保险网络的建设，使得所有人都能受到适当的良好教育，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从而培养起强有力的国内消费群体，逐步削减出口以及政府开支、公共开支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实现无通货膨胀，靠不断扩大的国内良性需求而引导的持续经济增长。

实际上，“实现无通货膨胀，靠不断扩大的国内良性需求而引导的持续经济增长”就是广场协议声明的主要内容，也是当时G5的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们梦想达到的目标，在广场协议的声明文本中，法国、西德、日本、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分别重复了这段话，也可以说这是所有商品社会都想达成的目标。但是G5在广场协议之后并没有达成这个目标，日本因为出现了泡沫经济和随后的泡沫破

灭，到现在也没有翻过身来，再加上这次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影响，日本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会进一步下降。而美国也没有通过广场协议改善自己的国际收支，反而出现了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倒闭为代表的金融危机。至于法国和英国，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现在它们已经变得更加不引人注目了。

现在是考验中国的时候了。

2011年4月14日 第一稿于神户

2011年6月26日 改于神户

参考资料

Todd G. Buchholz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Penguin Books USA Inc 1989.

船桥洋一 ：《通货烈烈》， 朝日新闻社， 1988年5月1日。

NHKスペシャル：《プラザ合意・円高への決断》，日本放送协会，1996年8月30日。

盐田潮：《金融崩壊・昭和経済恐慌からのメッセージ》，日本经济新闻社，1998年2月24日。

近藤健彦：《プラザ合意の研究》，东洋经济新报社，1999年4月15日。

Charles P.Kindleberger：《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Forth Editions》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Palgrave， 2002.

酒井吉广：《逆プラザ合意》，オーエス出版社，2003年6月30日。

近藤健彦：《小説・プラザ合意》， 彩流社， 2009年2月20日。

松岛令：《実録・日米金融交渉》，株式会社アスキ・メディアワークス，2010年1月10日。

小林正宏 、中林伸一：《通貨で読み解く世界経済》，中央公

论新社，2010年7月25日。

薮中三十二：《国家の命運》，新潮社，2010年10月20日。

近藤健彦：《プラザ合意・グローバルな危機への対処法》，彩流社，2009年2月20日。

竹中平藏：《日米摩擦の経済学》，日本经济新闻社，1991年6月15日。

石川博友：《日米摩擦の政治経済学》，ダイヤモンド社，1995年7月13日。

李彤：《谁妨碍我们更加富有》，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4月1日。



附录一　广场协议声明全文

五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发言

纽　约

1. 法国、西德、日本、英国和美国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于今天，1985年9月22日，就进行有关金融政策的互相监视问题协议的达成，以及将在韩国的汉城举行的会议中讨论的广泛的国际问题中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他们再次检讨了各国的经济和发展政策，对经济前景、对外收支以及外汇汇率的协议进行了评价。

2. 在1985年5月的波恩峰会上，七个发达国家首脑以及欧共体委员长发表了有关持续成长和高雇佣的共同宣言。首脑们在宣言中表示："为了所有国家都能享受的恒久的新的繁荣，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各国以及合作协力、努力追求能够带来持续增长和扩大雇佣的经济政策。"

3. 部长和总裁们认为，已经见到了这些国家在促进沿着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轨道上收敛经济表现的努力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他们得出了他们国家的经济活力以及反应能力正在逐步恢复的结论。这些进展的结果使得部长和总裁们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为了持续的均衡的经济发展筑起了稳固的基础。这种持续成长也符合其他发

达国家的利益，并且为发展中国家确保了出口市场的扩大，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问题做出了贡献。

4. 部长和总裁们相信，他们所在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主导，会进一步影响所期望的经济政策收敛。此外，为了进一步强化这种收敛和促进持续性成长，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决心实施政策措施。

5. 部长和总裁们在决定今后的政策时同时认为，现在的外汇市场并没有充分反映他们国家间基础经济条件的最新变化。

最近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

6. 部长和总裁们预计，这些国家总的经济成长将从1982年-0.7%的负增长转化到今年+3%的增长，这个数字虽然低于1984年，但却是最近四年来最均衡的成长。继1983—1984年度美国的高速成长之后，现在可以期待其他国家更加明显的国内增长，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动力。现在的成长来源于财政的重建，并不依赖于短期的财政刺激。这种成长的构成所发生的变化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实质经济增长在美国的成长钝化之后仍然会强有力地持续下去。

7. 现在的成长中在过去三十年中从未见过先例的现象是低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过去二十年以来最低的，而且也看不到增大的趋势。

8. 最近数年的利率显著低下，这种低利率除了能带来值得欢迎的国内效果之外，对于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也有重要意义。

9. 这种成功的经济表现是减轻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危险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政府支出的持续警戒，强调市场作用和竞争以及

重视慎重的金融政策的直接结果。

10. 除了这些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之外，在对外收支方面依然存在可能带来潜在问题的巨大不均衡现象，这是由于广泛的要因而导致的结果。这些要因分别是，美国从相对极高的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对外收支状态的恶化，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以及调整这些困难的努力对美国国际收支带来的影响，一些市场所存在的贸易困难，以及美元的升值。这些诸如相对成长率、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以及美元升值的要因的相互作用，带来了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巨大的、带有潜在不安定因素的对外收支的不均衡。特别是美国有巨大并且还在继续增大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日本以及程度较轻的西德则有着巨大并且还在继续增大的贸易黑字。

11. 美国的贸易赤字正在和其他的要因一起引起保护主义的压力，如果不对这种压力进行抵抗的话，有可能会引起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损害的相互破坏的报复。将会缩小世界贸易，使得实质成长率为负，增大失业率，而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所必需的出口市场也将无法确保。

政策意图

12. 财政部长和总裁们一致同意，各国作为主要工业国，一定要完成国际责任和义务。他们有确保各国政策相互吻合的责任。部长们同意，更加广泛的无通货膨胀的国内经济成长，以及开放国内市场，是确保现在的经济成长以更为均衡的方式继续的关键因素，并且决心实行符合这一目的的政策。部长们要求，那些财政赤字过大的国家应尽快采取充分削减赤字的措施。

13. 部长和总裁们同意对保护主义的抵抗是必不可少的。

14. 部长们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继续他们自己所不可缺少的调整努力的同时，应将为这些国家提供出口市场的重要性看做回避保护主义的重要追加理由。部长们欢迎预定在9月召开的关贸总协定的准备会议，并希望届时就关贸总协定新回合的讨论事项及方式达成协议。

15. 因此，部长们回顾有关债务问题的波恩宣言，对以下文字予以再次确认："与世界贸易的持续增长，更低的利率，更开放的市场相适应的数量以及条件的资金供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健全发展以及克服其经济财政困难是必不可少的。"

16. 部长们同意监视达成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的进展，强化为达成这一目标所采取的个别以及协调的努力。为此，部长们同意后附的各国的政策意图声明。

结　论

17. 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们同意，最近的经济发展以及政策变化在和附属声明中所记载的各国政策意图结合之后，将成为持续均衡以及低通货膨胀率成长的基础。他们同意为了纠正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巨大并且还在继续增大的不均衡所做的改善的重要性，他们还留意到了市场开放的措施对于抵抗保护主义的重要性。

18. 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们同意，汇率应该在调整外贸不平衡方面发挥作用，所以汇率应比这之前更好地反映经济实况，他们相信应该采取和强化改善经济现状的统一行动。考虑到经济的现状和可能的变化，他们相信主要非美元通货对美元的汇率应该有秩序地上升。在



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做好了紧密合作促进这种发展的准备。

法国政府考虑实行以抑制通货膨胀，钝化所得增长，继续改善以对外收支为目的的经济政策，并且进一步强化尽快调整经济构造使之实现现代化，成为创造出雇佣的经济成长的基础。

因此法国政府决心做到：

1．追求钝化通货膨胀。

2．确保增加通货供给目标值的达成，并使之和钝化通货膨胀的目标相吻合。

3．为了减少政府债务和税收负担，逐步抑制公共开支。

4．根据企业金融状况的改善，促进投资的回复。

5．进一步发挥利率的作用，减少金融中介成本。为了增加金融调节中金融部门的竞争，进一步采取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现代化措施。

6．在教育以及训练领域采取革新的积极政策，并通过促进与工会组织间的建设性对话来促进雇佣的创出。

7．抵抗保护主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注意到，西德经济现正处于基于比重在不断增加着的出于国内需要的主导而成长的经济恢复过程中。西德将继续实施维持和扩大经济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是由在安定的物价以及低利率标准环境中，不断强化实现能够持续、强劲并且扩大雇佣的经济成长所需要的条件来保证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根据以下意图实施政策：

1．财政政策的优先目标为民间主导的生产投资以及安定物价。

2．为此，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抑制支出，逐渐减少经济中公共部门的份额，预定在1986年以及1988年实行的减税为联邦政府

在中期规划中要进行的税制改革和减税的一部分。

3．联邦政府将继续消除阻碍市场效率的僵硬性，并且为了增加经济成长带给雇佣的正面作用，将继续改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法规和习惯。联邦政府和联邦银行将继续为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有效发展提供条件。

4．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联邦银行的金融政策将继续为国内需要的持续增长确保安定的环境。

5．联邦政府将继续抵抗保护主义。

日本政府注意到，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主要由国内需要支撑的成长局面。日本政府将确保无通货膨胀的成长，提供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途径，并继续实行日元国际化以及国内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

日本政府根据以下意图实施政策：

1．抵抗保护主义，切实实施预计在7月30日发表的，对外国制品和服务进一步开放日本国内市场的行动计划。

2．实施强有力的规则缓和措施，以充分利用民间活力。

3．适当注意日元汇率，有弹性地运用金融政策。

4．为了使日元能够充分反映日本的潜在能力，强力实施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

5．财政政策将继续以削减国家财政赤字以及创造能够发挥民间活力的环境这两个目标为重点，在整体规划中，如果地方团体在考虑了实际情况之后，决定在1985年内进行追加投资，将给予适当的许可。

6．刺激内需的努力将结合扩大消费者金融以及住宅金融市场的措施，以增大民间消费及投资。

英国政府认识到，英国经济在最近四年中实现了生产和国内需要的切实增长。英国政府将继续实施以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生产和雇佣的持续成长，削减公共部门的规模，发展更具竞争性、革新性的市场指向的民间部门，减少规制，增加对经济全体的刺激，取消外汇管制，维持以开放的贸易和资本市场为目的的政策。

英国政府根据以下意图实施政策：

1．实行进一步安定物价的金融政策的运营，创造能够增加生产及雇佣的金融环境。此外，维持慎重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2．进一步减少GDP中公共开支的份额，进一步将公共部门企业的重要部门转为民间所有。

3．为了加强对经济的刺激，减轻租税负担，促进在经济上有效利用资源。

4．为了有效地改善劳动市场，采取包括改革工资审议会以及改善青少年训练在内的追加措施，另外，实行为了金融市场自由化，强化竞争的提案。

5．抵抗保护主义。

美国政府决心执行能够确保切实及无通货膨胀的经济成长，最大地发挥民间企业在经济和市场上的作用，减小政府部门规模和作用，维持市场开放的政策。

为了达成这些目的，美国政府将采取以下措施：

1．减少财政赤字，为了将资源交给民间部门活用，继续努力减小对GDP的政府支出的作用。

2．充分实施1986年财政年度的赤字削减计划，已经得到议会通过，总统承认的这个计划不仅在1986年财政年度要削减GNP1%

以上的财政赤字，而且还是在将来财政年份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的基础。

3．促进储蓄，创造新的雇佣刺激，提高经济效率，实施能促进无通货膨胀经济成长的中立于岁入的税制改革。

4．运营能够建立促进持续成长和物价安定的金融环境的金融政策。

5．抵抗保护主义。

（原文为英文，这里根据日本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年报昭和61年版p282－p284的日文翻译）

附录二　广场协议有关大事记

1985年

1月17日　华盛顿G5，在必要时在对市场进行干预上达成一致。

2月15日　美元创80年代最高值，1美元兑换263.65日元，3.477西德马克。

4月11日　舒尔茨国务卿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演，警告保护主义的抬头，并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和扩大内需。

5月2日　第11届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波恩峰会）。

6月19日　马尔福特财政次长和大场智满财务官会谈。

6月21日　贝克财政部长和竹下登大藏大臣会谈。

6月22日　东京G10会议。

7月22日　欧洲通货体系（EMS）调整汇率。

7月23日　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第三工作部门会议（WP-3）在巴黎召开，马尔福特和大场智满讨论对抗美国议会保护主义的宏观经济贸易政策。

8月21日　马尔福特和大场智满在夏威夷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和美国税制改革。

9月15日　伦敦五国财政次长会议（G5D）

9月20日　卢森堡EC财长会议，法国、英国、西德财长央行总裁秘密协商。

9月22日　在纽约广场大酒店召开G5会议，广场协议。

10月6日　国际通货基金IMF，世界银行总会及G5会议在汉城召开，再次确认广场协议。

10月下旬　日本银行向高诱导短期汇率。

11月13日　巴黎G5D。

12月12日　里根总统签署葛兰姆·拉德曼·荷林斯平衡预算法案（Gramm-Rudman-Hollings Balanced Budget Act）。

1986年

1月18日　在伦敦唐宁街11号召开G5。

1月30日　日本银行将银行利率从5%下调至4.5%。

2月20日　BIS10国央行总裁会议，FRB主席沃克和西德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佩尔就降息达成一致。

2月24日　FRB发生"宫廷政变"，沃克主席在降息问题上表决失败。

3月6日　德意志银行将利率从4%降至3.5%，法兰西银行也将利率从8.5%降至8.25%。

3月7日　日本银行将利率从4.5%降至4%，美国FRB也将利率从7.5%降至7%。

4月6日　EMS调整汇率。

4月8日　贝克、竹下登在华盛顿会谈。

4月10日　FRB主席沃克和日本银行总裁澄田智会谈。

4月21日　美日联合降息，日本从4%降至3.5%，美国从7%降

至6.5%。

5月4日　东京峰会。

5月30日　G5D，讨论美国在东京峰会时提出的政策监视用指示器（indicator）问题。

7月10日　FRB将利率从6.5%降至6%。

7月22日　宫泽喜一接任竹下登任日本大藏大臣。

8月21日　FRB再次降息0.5%，利率为5.5%。

9月6日　贝克、宫泽喜一旧金山会谈。

9月21日　西欧财政会议，一致反对美国的口头介入。

9月26日　华盛顿G5，贝克与宫泽喜一会谈。

9月27日　华盛顿G7。

9月29日　IMF，世界银行总会。

10月31日　贝克、宫泽联合声明发表，日银降息至3%。

12月14日　贝克和西德财长斯托尔腾堡在西德基尔会谈。

1987年

1月12日　EMS调整汇率。

1月21日　贝克宫泽华盛顿会谈，发表联合声明。

1月22日　德意志联邦银行将利率从3.5%降至3%。

1月28日　纽约联银在广场协议之后首次进行买入美元干预。

1月29日　苏黎世G5D，讨论卢浮宫协议。

1月30日　美国商务部发表1986年美国贸易赤字1697亿美元，对日本赤字5885亿美元，均为历史最高值。

2月4日　罗马G7D，协商威尼斯峰会以及卢浮宫协议，日银降息至2.5%。

2月21日　卢浮宫G5，采纳了卢浮宫协议，干预基准的中心汇率

为1美元兑换153.5日元和1.8250西德马克。

2月22日　卢浮宫G7，意大利抵制，其实是G6。

4 月 7 日　华盛顿G5，日元的中心汇率变为146。

6 月 9 日　威尼斯峰会。

8月11日　沃克FRB主席辞职，格林斯潘继任。

9月26日　华盛顿G5，G7，再次确认卢浮宫协议。

10月19日　“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暴跌。

10月20日　东京股市暴跌。

12月4日　G7联合声明，“不希望美元继续下跌”。

12月31日　东京市场瞬间值，1美元兑换121日元，收盘为122日元，均为历史新纪录。